

# 日本治臺時期的關稅政策——兼論日法關稅同化政策的異同

## Assimilating Doctrine and Tariff Policy of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許世融\*  
Shih-Rong Hsu

(收件日期 102 年 4 月 24 日；接受日期 102 年 6 月 14 日)

### 摘要

19 世紀末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所採行的關稅政策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將殖民地納入本國關稅圈內，稱為「關稅同化主義」，可以法國為代表；另一種則是在殖民地採取獨立的關稅制度，可名之曰「關稅適應主義」，英國為其典範。日本作為帝國主義的後進，其殖民地關稅政策雖較傾向法國式的關稅同化主義，惟進一步細究，日、法間仍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對比出日、法關稅同化政策間的不同之處，也突顯出日本治臺時期的同化主義，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步調並不完全一致。

關鍵詞：關稅同化主義、關稅適應主義、關稅自主

---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 **Abstract**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imperialists' tariff policies to colonies: one was to include colonies in the national tariff circle which was named as Tariff Assimilating Doctrine and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was France. The other was to establish independent tariff system in colonies which was named as Tariff Adapting Doctrine and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was England. Japan was the follow of the imperialism. Its colony tariff policy was similar to the French Tariff Assimilating Doctrine. However, there is a quite difference between Japan and France. This autho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of tariff assimilating policies between Japan and Franc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the author highlights the inconsistency on the pace of policy and economy during the assimilating doctrine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Key words:** Tariff Assimilating Doctrine, Tariff Adapting Doctrine, Autonomous Tariff.

## 壹、前言

「同化主義」是指將本國文物制度直接施行於殖民地，以本國文化取代殖民地原有文化，全面消弭母國與殖民地間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方面的鴻溝，讓母國與殖民地人民在公、私法的地位皆能完全平等為目的的主義。其理論大要是：由於人類具有共通的理想，如果其所建立的制度具有合理基礎，即便一時受到反抗，若能持續推行，被殖民者終究會了解其真意而樂於仿效，如此一來，便能漸漸導引人類社會向上發展。不過由於人類在許多場合，往往是根據其本能、習慣、環境、傳統、信仰等，而非根據理性來支配，這種傾向在理性批判力最缺乏的未開化種族尤其顯著。因此將同化主義推行到極致時，以新的文物制度取代殖民地人民的風俗習慣，使得殖民地人民甚感痛苦，因而不但不會被解讀為進化的手段，反視之為殖民母國的壓制，以致對其產生恨意。<sup>1</sup>

同化主義是以殖民地文化及社會制度較殖民母國低等為前提，因而將優秀的母國文物制度快速移植，使兩者齊一是身為殖民者的一大使命。<sup>2</sup>然而一旦母國本身的原始政策未必優於殖民地時，所欲執行的同化政策則有向外學習的必要，19世紀末期的日本即為如此。

作為帝國主義後進國家，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多半是參考先進殖民帝國，關稅政策亦不例外。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處境與當時治臺的清帝國頗類似，關稅皆受制於歐美列強。待取得臺灣時，其關稅自主交涉運動仍在進行，因而經營殖民地的關稅政策，唯有參酌先進殖民大國。爰19世紀末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所採行的關稅政策，大致可分兩種：一是將殖民地納入本國關稅圈內，稱為「關稅同化主義」，可以法國為代表；另一則是在殖民地採取獨立的關稅制度，可名之曰「關稅適應主義」，英國為其典範；後者還可以再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殖民地施行各自獨立的關稅政策；一類則是在本國與殖民地間採行一定的「特惠關稅」體制。至於日本所採行的，明顯偏向法國式的「關稅同化主義」。<sup>3</sup>

臺灣既是日本最先取得的殖民地，在此施行的政策對後續佔領的其他殖民地具有甚為重要的指標意義。事實上這種明顯偏向法國式的「關稅同化主義」，除在臺灣施行，其後也旁及其他殖民地。換言之，臺灣可以說是日本殖民帝國關稅同化政策的試煉所。本文的目的，即在探究這種見習於先進殖民帝國的關稅政策在臺推行過程，進而與其仿效對象法國相比較，了解兩國的關稅同化政策相異之處。

由於日本初治臺時，仍受制於列強的不平等條約限制，故本文首先將針對19世紀末日本與列強進行關稅自主交涉的努力加以說明，其次則探究日、臺關稅政策同化的經過，繼則分別敘述日、法兩殖民帝國所採行的關稅同化政策實質內容與異同。

1 小島憲，《植民政策綱要》（東京：章華社，1934年），頁92-93。

2 這樣的前提其實不甚禁得起考驗，不僅沒有理論根據證明母國的文物制度必然全部優於殖民地，現存的任何國家文化也沒有完全完美無暇的，每一個文化體系皆有許多缺陷，以具有瑕疵的文物制度強加於殖民地人民，不僅不道德，也忽視了所謂的「野蠻未開化」人種猶具有依據殖民者不認為正當的方法維持生活之權利。參見小島憲，《植民政策綱要》，頁93-95。

3 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頁77-78。

## 貳、明治維新後的關稅自主交涉運動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朝野積極推動條約改訂，從 1872 年起展開長達 23 年的條約修訂運動，歷任六位外務大臣，前後中斷三次才獲致成果。1894 年陸奧宗光成功與英國締結平等互惠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迄 1898 年最後的「日奧條約」締結為止，陸續與美、義、德、法、荷、俄、祕、西、瑞、葡等國締結新約，努力多年的改訂新約總算初步達成；1911 年再度與各國進行條約修訂協商，逐一簽署互惠平等新約，至此才算獲得完整的關稅自主權，以下略述其經過。

### 一、改稅約書——不平等協定關稅產生的源頭

近代日本與外國所締結條約，以 1854 年和美國間的和親條約最早，惟約中僅有和親修好的一般規定，並無輸出入貿易、關稅等的相關細則；1858 年與美、英、法、俄、荷五國締結修好通商條約，在附屬貿易章程中，規定船舶出入及貨物裝卸的相關手續，同時訂定輸出入稅率，開始對貿易品課稅，這可說是日本關稅制度的濫觴。1860 及 1863 年又分別與葡萄牙、瑞士等國締結修好通商條約，最後則有一附屬稅率表。<sup>4</sup>按此稅表，輸出品除金銀貨幣外，一概課以 5%（從價）的稅率；輸入品稅率最高為 35%、最低為 5%，未登載貨物則課徵從價 20%；至於金銀貨幣、金塊銀塊及自用衣服、家具、書籍為免稅品，而米、麥等主要糧食及以往的重要輸出品銅則限制輸出。

這個稅率規定對日本未必不利，但當時朝廷與幕府意見對立，對外政策莫衷一是，導致條約規定的開港日期受到延宕，為了補償各國損失，不得不在關稅上讓步。由於 1858 年的條約曾規定，俟神奈川開港後五年再議定輸出入稅則，1865 年日本政府即據此與相關國家代表於大阪達成輸出入商品全部課徵關稅 5% 的基本協定。隔年雙方在江戶簽署關稅改正相關條款 12 條，稱為「改稅約書」，其附屬稅目中，不論輸出入品，一概以從價五分為基礎，分為從量稅（89 種）、從價稅（26 種）、免稅品（29 種）、輸入禁制品（鴉片）等。當時日本稱關稅為「運上」，稅關為「運上所」，因而「改稅約書」的附屬稅表遂稱為「運上目錄」。<sup>5</sup>

其後適用「運上目錄」國家與日俱增，1868 年以後與各國締結的條約亦沿用之。但由於稅目採單一低稅，和先前的貿易章程附屬稅目相比，不但對日本顯著不利，且對英國的課稅價格，是採輸出港市價，和輸入港的價格相去甚遠；又「改稅約書」當中，除第二條外，根本沒有關於從量稅率的換算時期之相關規定，從而經過一段時間後，實質稅率已降至從價 1% 左右。<sup>7</sup>無奈受制於條約，非透過協商無法修改，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展開一場漫長的修約努力。<sup>8</sup>

4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東京：財政經濟學會，1938 年），頁 155-56。

5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 158。

6 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の關稅》（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1935 年），頁 30。

7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 169。

8 有關日本從明治時代以來對爭取關稅自主權、撤廢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的努力，在大藏省所編的《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第六編「關稅」中有甚為詳盡的記載，包含當時相關人士的意見書、

## 二、關稅條約改正經過

### (一) 條約修訂運動的第一期 (1872 至 1879 年)

1872 年「安政條約」期滿，日本政府乃在前一年通告締約國欲另訂平等新約，並於 12 月 23 日派遣岩倉具視大使率團前往歐美考察。岩倉徵詢各國修約意見，雖遭英法等國拒絕，惟政府相關部會依舊進行準備工作。

舊約中最令日人詬病為治外法權與關稅自主權二事，主導外交談判的外務省認為欲同時解決並不容易，1875 年 11 月 10 日，外務卿寺島宗建議，鑒於對外貿易日益蓬勃，應先投注全力在關稅權恢復上。內閣接納此提議，命駐外公使告知駐在國；同時大藏省也參考歐美各國課稅方針及標準，並斟酌本國實情而草擬新稅率，輸入品大致分為 16 種，平均稅率 17% 強，較以往提高三倍半。

新稅則起草既畢，外務省首先與較友好的美國展開交涉，1878 年與美國簽署「日本國合眾國間現存條約改訂以及增進兩國通商合約書」，惟美國雖承認日本的沿海貿易統轄權，也聲明放棄前此訂立的「改稅約書」及貿易章程，但前提是日本必須先與他國訂立同等約定後才願付諸施行。其後由於英國公使巴夏禮極力反對，使得與美國的新約無法生效。此外，在野人士認為假使無法撤去治外法權，即便恢復稅權，一旦與通商國發生糾紛，對日本甚為不利，稅權恢復形同具文，因而對政府攻擊甚力。適逢日本稅關查獲英人走私鴉片，卻礙於治外法權而無法加以處分，英國領事竟依據領事裁判權宣告無罪，引起在野法官對政府更嚴厲攻擊，外務卿寺島宗遂於 1879 年 9 月辭職，由工部卿井上馨代之，第一階段修約運動暫時中止。

### (二) 條約修訂運動的第二期 (1880 至 1887 年)

井上馨接任後，決定將稅權與法權恢復同步進行，英國體認到修約無法避免，遂提議在東京召開預備會議，以商議修訂基礎案。最初日本提出的稅目案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最高稅率達 30%，各國紛表反對，會議開始前日本主動將最高稅率降為 25%，且只針對數種奢侈品；其餘商品稅率則介於 5% 至 10% 之間。但各國依舊以本國利害關係要求降低稅率。日本乃提議以收入總額達 400 萬圓為目標，重新編訂細目，且由英、德兩位外國委員協助調查審議課稅方法。預備會議終了時，各國委員在領事裁判權、稅率、貿易及航海各方面達成數項共識，雖然日本的主張並未完全貫徹，卻也有不少提案被列入，惟接受與否，完全取決於各國政府，毫無約束力可言。

受衝擊最大的英、法兩國認為日本的審判制度並不周延，因而對撤除領事裁判權、最惠國條款變更以及締約期限甚有意見。同時日本政府也透過駐外使臣與駐在國政府接觸，研判法權問題要快速解決並不可能，但增稅與定期議定稅則則似有可為，決定在此方針下進行。

改正案皆完整保留，本節以下所論，除另注明出處外，概出於該書。詳見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1-49。

9 呂理州，《明治維新》（臺北：遠流，1994 年），頁 248-249。

1886年4月，日本政府任命外務大臣井上馨、次官青木周藏為全權代表，第一次會議進行後，英、德公使又另提新的談判基礎方案。主要內容包含內地開放、編纂法典、領事裁判權、日本對外國人的裁判權、外國法官的任用、日本對外國人的裁判所組織、法庭用語、條約施行期限等事項。各國公使討論結果，決議以本案為談判基礎，日本政府則聲明放棄異議；其後又歷經近廿回商議，終於在翌年4月22日的第廿六次會議中大致底定。

然而就在外交談判逐漸展現成果之際，內閣卻出現不少反對意見，民間在野法官、政論家對談判內容攻擊之聲四起，外務省不得不在1887年7月18日第廿七次會議中聲明談判中止。在輿論洶湧之下，井上馨於9月去職，將後續談判任務交由大隈重信。

### （三）條約修訂運動的第三期（1888至1891年）

井上去職後，外務大臣暫由伊藤總理大臣兼代，旋以大隈任之。新閣組成後，大隈仍留任，花了近七個月另擬改正案，大體仍採用井上的方案為基本架構，並參酌過去的失敗經驗以及國內情勢稍加修正。主要是將裁判權與通商條約綜合成一個和親通商條約，條約實施五年內，外國人可在居留地持續享有領事裁判權；待五年期滿，領事裁判及附屬特權一概廢除，日本帝國的法權普遍施行全國。

為達成目的，大隈首先強行將最惠國條款擴張解釋，聲明依照正義公平原則，外國間相互許諾的特權亦應及於日本；並且嚴格執行現行條約規定，使外人深感不便，而自覺有修約必要。至於談判方法，他排除井上所採行的合議制，而以各個擊破方式，先從與日本較友善國家開始，漸次及於其他國家，終於獲致成果。不料與德國另訂新約將畢之際，修訂案內容突然出現在倫敦泰晤士報，經由東京日日新聞譯載，引起輿論界的軒然大波。反對者極力主張，修訂案中，高等法院任用外籍法官實屬違憲，大隈無視於這些批評，堅持繼續談判，6月11日終於由西園寺公使與德國締結新約。然而朝野的反對意見日趨沸騰，甚至有暴徒襲擊大隈，導致黑田內閣總辭，條約修訂談判亦宣告中止。

接替的山縣內閣，以外交經驗豐富的青木周藏擔任外務大臣，不過青木在對英談判及廢止現行條約方面似乎束手無策；加上俄國皇太子訪日在大津發生意外，導致青木辭職，條約修訂三度中斷。

## 三、條約修訂的成功

新組成的松方內閣，由於閣員間缺乏協調，1892年8月再度總辭，由伊藤博文組閣，他任命陸奧宗光為外務大臣，1893年7月5日的內閣會議上，議決通過陸奧所提出的對等條約案。

陸奧首先與英、美、德三國展開談判，在1894年7月16日，與英國締結了以平等互利為基礎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該條約規定，兩締盟國相互間擁有通商航海自由，關於通商航海的稅金或徵收金，內國臣民或最惠國臣民皆享有平等待遇；關於生產或製造物品的輸入及其稅金，與列國相同；其他通商航海相關事務，給予最惠國待遇。至於附屬輸

入稅目，主要為從價 10%，最高為 15%，最低為 5%。稅目未登載物品，適用普通國定稅則。其餘諸國亦望風響應；迄 1898 年 9 月最後的「日奧條約」締結為止，日本成功與義大利、德國、法國、荷蘭、俄國、祕魯、西班牙、瑞士、葡萄牙等國締結新條約，努力多年的條約改正獲得初步成果。不過「日英通商航海條約」有締約五年後才開始實施的規定，且此期間，日本尚需完成兩事，即修改法典，並將攸關工業所有權及版權的保護加入各國同盟條約。1899 年 7 月起，終於撤廢了治外法權、恢復關稅自主，廿餘年來的努力終告完成。為此，日本政府特地於 1897 年 3 月制定並公佈第一次國定稅率——「關稅定率法」，宣佈從改正條約實施日期——1899 年 7 月前的六個月，亦即 18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然而，「關稅定率法」的施行，並不意味著日本獲得完全的關稅自主權。由於當時日本與英、法、德、奧等國尚存有頗多協定稅率，不但是片面的，而且依照最惠國條款，其適用範圍頗為廣泛，日本的關稅依然受到拘束，蒙受不少損害。在這些殘存的協定稅則中，與奧國相關部分至 1903 年底終止；其餘諸國則在實施後十二年期滿，於是 1911 年，日本政府再度與各國協商，進行條約修訂，逐一簽訂互惠平等的新條約，至此才算獲得完整的關稅自主權。

## 參、日本治臺時期的關稅政策與日、臺關稅統合過程

在修約談判同時，日本也因馬關條約而獲取臺灣，於是新頒的國定稅率，也逐步在臺施行。不過 1911 年以前，基於特殊財政考量，臺、日關稅仍存有些許差異，1911 年以後才趨於一致。

### 一、從清朝舊稅率到運上目錄

日本完成稅關接收工作後，對臺灣應適用何種關稅，大致有三種不同意見：一是暫時沿用清朝洋關的舊稅率；二是直接採用內地現行稅率；三是另外制定新稅率。<sup>10</sup>其中實際統治臺灣的總督府傾向採第一策，主要考量因素有三：

第一是為安定內外民心。鑒於「領臺之初，一方面兵馬倥傯之際，百般設施尚未就緒；另一方面本島島民及與本島通商往來已久之外國人，早已習於舊慣，突然更改，有所不便」。<sup>11</sup>

第二是考量國際法規定。1895 年 6 月 25 日，美國領事得魯乾巴在函覆樺山總督就職視事通知時，便提醒總督府，依照國際法規定，由於土地之讓與，致新舊政府產生變動時，其土地人民，在新制度頒布以前，仍按舊有慣用之例規來支配。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遵代答時也承諾有關輸出、入兩稅目錄會「暫時採用向來履行之規定」。<sup>12</sup>

10 臺灣總督府稅關，《臺灣稅關十年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淡水稅關，1907 年），頁 38-39。

11 臺灣總督府稅關，《臺灣稅關十年史》，頁 39。

12 「明治廿八年六到八月外事課事務報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四輯），頁 292-293。

第三則為鴉片問題。鴉片原是臺灣進口大宗，據海關統計，從 1868 到 1894 年，鴉片輸入約佔進口值的 60%。<sup>13</sup> 然而按日本律法，鴉片早已列入輸入禁制品，若直接採用內地現行稅率，不但對臺灣嗜吸鴉片的人民影響甚大，更重要的是，鴉片輸入稅及釐金收入甚豐，一旦停收，恐對總督府財政造成更大衝擊。最後由總督府決議：「臺灣既入帝國版圖，將帝國現行關稅率施之臺灣，固屬至當；惟尚未向締約各國發佈統治臺灣宣言，則在臺灣施行帝國政府認為合宜之關稅政策，亦不須有條約上之顧慮；且一仍臺灣舊慣來徵收關稅，各國當無異議。」<sup>14</sup> 所以除少數一、二稅目外，大體沿用清朝舊制，並由稅關長野村才二以口頭通知英、德領事。<sup>15</sup>

迨 1896 年 2 月正式發表統治宣言，運上目錄也隨之施行於臺灣，取代清朝舊稅率。本目錄將輸出入品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採從量課稅（依照從價 5% 稅率換算而得）；第二類為免稅品；第三類為管制輸出入品；第四類為從價課稅（按原價課徵 5%）。<sup>16</sup> 至於鴉片則決定列入禁止輸入品，轉由臺灣總督府壟斷進口，行使專賣權，做為藥用賣給臺人。<sup>17</sup>

## 二、第一次國定稅率的頒布與「臺灣輸出稅及出港稅規則」的施行

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簽署後，英國允諾於 1899 年 7 月 17 日起廢止領事裁判權，並提高關稅率，除協定關稅外，國定稅率可望依照本國法令自由變更。<sup>18</sup> 於是外務省致力於條約修訂時，大藏省也同步進行輸入稅則改訂工作，1897 年 3 月公布首次的國定稅率——「關稅定率法」。惟考慮到改正條約施行日期在 1899 年 7 月以後，因而直到 1898 年 9 月才公佈，並自翌年 1 月 1 日起實施。<sup>19</sup>

第一次國定稅率制定後，也在臺灣同日施行，不過考量到總督府財政上的需求，另外制定「臺灣輸出稅及出港稅規則」，對臺灣出口的產品徵收輸出稅（對外國）及出港稅（對日本）。先進國家除非發生戰亂、飢饉，或為了防止特殊商品輸出，否則幾乎不課徵輸出稅，不過在殖民地則甚為常見。例如非洲內地出產的象牙、駝鳥毛、野生橡膠等，皆課徵高額輸出稅，以防止自然產物的滅絕；馬來聯邦（位於馬來半島中部，由雪蘭莪、森美蘭、霹靂和彭亨四個接受英國保護的馬來王朝所組成）對錫礦課高額稅賦，目的是為了抑制輸出，以圖本地煉製業的發達；又如交趾支那（南圻，越南南部）對生絲徵收輸出稅，是為在當地加工的政策；至於印度及交趾支那對米課徵輸出稅，則是為了調節輸

13 林滿紅，〈清末臺灣與我國大陸之貿易型態比較〉，《師大歷史學報》期 6（民國 67 年 5 月），頁 224。

14 臺灣總督府稅關，《臺灣稅關十年史》，頁 39。

15 「明治廿八年十一月外事課事務報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四輯），頁 323。

16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臺灣の關稅》，頁 30-1；千住精一，《臺灣稅務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報社，1928 年），頁 597。

17 「申民局字第 202 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一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1 年），頁 486。

18 千住精一，《臺灣稅務史》，頁 625-6。

19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 170。



出，為當地人民保留食物<sup>20</sup>。而日本領臺前，為擴張海外銷路、振興輸出，已逐步減少輸出稅的徵課範圍。迄 1894 年 7 月為止，除生絲、茶、銅、椎茸、鮑、乾魷魚、昆布等幾項重要輸出品外，其餘悉加以免除<sup>21</sup>；至 1899 年 7 月第一次關稅定率法實施後，正式宣告廢除。然而臺灣則為確保殖民地經營的充分財源，乃決定對輸移出國外及內地商品分別課徵輸出稅及出港稅。1899 年 7 月，總督府發布「臺灣輸出稅及出港稅規則」，從 7 月 17 日起施行<sup>22</sup>。所課徵的物品限本島所產，稅率最低為每百斤 5 錢（油糟），最高為每百斤 2 圓 31 錢（魚翅），採從價課稅者一律 5%（乾筍等 9 項）。一般物品平均稅額尚屬合理，但是輸出量頗大的茶（每百斤 55 錢至 1 圓 60 錢）、糖（每百斤 15 至 21 錢）、龍眼（每百斤 39 至 54 錢）則明顯偏高，因而從事茶、砂糖交易的外國商人叫苦連天，當時香港外文報紙便常刊載商人抱怨之聲<sup>23</sup>。

此規則制定的主要目的是為增加歲入，施行十餘年後，總督府財政日益堅實，加上臺地產業不斷發展，在擴張製糖銷路與獎勵製茶輸出時，深切感受到其對產業發達的阻礙，總督府亦體認到其存在之不利，終於在 1910 年 11 月 1 日加以廢止<sup>24</sup>。總計從 1896 年至 1910 年的 15 年間，徵收的輸出稅總額達 486 萬 7,520 圓，每年平均稅額約 32、3 萬圓之間<sup>25</sup>。

### 三、第二次「關稅定率法」與「臺灣特別輸入稅」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曾頒布「非常特別稅法」修正案，輸入稅加徵達 191 項之多，除協定關稅商品外，幾乎無一倖免。於是在輸入稅方面，除了本稅外，尚須另外加徵「非常特別稅」，形成一物兩課的現象<sup>26</sup>。同時，這原是因應戰爭的臨時性措施，但因加徵的輸入稅額成績斐然，所以在戰後非但未取消，反削去「臨時」二字，成為常態性稅法<sup>27</sup>。於是輸入稅方面，既有第一次關稅定率法，復加上「非常特別稅法」，疊床架屋，使得稅率雜亂無章；且酒、砂糖、菸草、織物、米、穀、繭等民生用品的負擔過重；加以戰後經濟型態轉變，國內各項工業較前發達，轉而有本國製品輸出國外，於是商人紛紛要求能減免或退還原料品關稅，或提高外國製品稅率。為因應上述要求，大藏省決定重訂關稅定率法，並趁機大幅提高非協定關稅商品稅額。

新法由內閣在 1906 年第 22 次帝國會議中提出，自同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sup>28</sup>。與舊法相

20 稻田周之助，《植民政策通解》（東京：巖松堂書店，1924 年），頁 87-88。

21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臺灣の關稅》，頁 35。

22 《臺灣總督府報》第 576 號，明治 32 年 8 月 5 日，p.15。

23 井出季和太，〈領臺以來的貿易に關する法制〉（上），《臺灣時報》第 135 號，昭和 6 年 2 月，頁 23。

24 「律令第 9 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3087 號，明治 43 年 11 月 1 日，p.1。

25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の關稅》，頁 38。

26 《臺灣總督府報》第 1671 號，明治 38 年 1 月 13 日，頁 39-49；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の關稅》，頁 45-47。

27 《臺灣總督府報》第 1925 號，明治 39 年 3 月 9 日，p.21。

28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の關稅》，頁 47-48；千住精一，《臺灣稅務史》，頁 733；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 247。

比，顯著增加「特惠關稅」、「報復關稅」以及獎勵貿易的政策意涵。先就「特惠關稅」來看，由於日俄戰後，日本取得關東州（大連），卻礙於租借地與自由港的性格，無法將其納入日本關稅圈中，於是為促進與當地間的貿易，新法第3條規定「未能適用『協定稅率』之商品，必要時得以敕令指定地區及產品，於協定關稅範圍內徵稅」。<sup>29</sup>該法通過之後，隨即在同年發佈「關東州生產物品之輸入稅率相關規定」、「韓國生產品及清國生產之銑鐵等之輸入稅相關規定」，讓關東州、韓國、清國部分商品享有特惠關稅。次就「報復關稅」而言，這是為了報復對日本船舶或商品不友善的國家所採取的措施。新法第4條：「對於將本國船舶或產品，以較他國船舶或產品不利的方式來處置之國家，得以敕令指定其國產品，若係應稅品，則課徵與本法所訂稅率同額以下的附加稅；若係免稅品，則課徵從價50%以下的輸入稅」。再者，為避免日本商品受到不公平競爭的待遇，遂採取「相抵關稅」的措施，對於受本國出口補貼的外國商品輸日時，課徵與獎勵金同額的附加稅（第5條）；同時更規定：「以輸入原料所製造的特定商品，當其輸出外國時，得依命令退還輸入稅的全部或一部分」（第9條），積極以退稅的方式獎勵商品出口。<sup>30</sup>不難看出，新法的保護關稅意味較前更濃，目的無非是希望可以對內保護國內產業，對外振興輸出，因而被認為是戰後相當重要的關稅貿易措施。<sup>31</sup>

本法雖同步在臺施行，<sup>32</sup>不過翌年3月鑒於臺灣的人情、習慣、嗜好與內地相異，從而所需物資多仰給於華南地方；且臺島自有特殊輸入品，若與內地一體適用，恐阻礙本島產業經濟發展。所以為因應臺地特殊需求，乃公佈「臺灣特別輸入稅法」，<sup>33</sup>降低魚苗、罐頭、蔬菜、中國麵類、人參、生綿及縲綿、舊黃麻布袋、粗製瓦、陶磁器破片及碎瓦、非書畫用唐紙等10項商品稅率。迨1911年7月第三次關稅定率法制定時，參酌了「臺灣特別輸入稅」的稅率，本法的施行乃告終止。<sup>34</sup>

#### 四、第三次關稅定率法

第二次國定稅率雖已較舊法大幅提高，但對於受條約保障的協定關稅商品仍不得不讓步，使得實質稅率提高相當有限。趁著1899年修約的12年期限將於1911年屆滿，日本政府決定將片面的協定稅率修改為互惠的協定關稅。<sup>35</sup>1905年起，大藏省便著手關稅制度及稅率調查，內閣也成立關稅調查委員會負責此事。1909年12月20日在內閣會議中提出，於翌年送議會通過，從1911年7月17日起，亦即「協定關稅」期滿後開始施行。<sup>36</sup>透

29 《臺灣總督府報》第2166號，明治40年4月9日，p.31，以下所引關稅定率法條文出處同此。

30 《臺灣總督府報》第2055號，明治39年10月6日，p.26-7。

31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247-8。

32 「敕令13號」，《臺灣總督府報》第1670號，明治38年1月12日，p.30。

33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十三編下「明治四十年度分」（《中國方志叢書》第19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74年），頁318。

34 井出季和太，〈領臺以來の貿易に關する法制〉（上），頁23；千住精一，《臺灣稅務史》，頁910。

35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280-281。

36 《臺灣總督府報》第2941號，明治43年4月23日，頁98-99；第3011號，明治43年7月27日，p.65；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310-313。

過此次稅率修訂，日本才真正達到關稅自主。

由於本法是真正達到關稅自主後頒布的新法，所以與舊法有頗多不同，先就本文來看。第一，以往課稅價格算定係採「發送地價格主義」，即以生產或輸入地原價，加計包裝費、運費、保費及其他到達輸入港為止的費用，容易招致申報不實的弊端，故新法改以到達輸入港時的價格課稅，採取「到達地價格主義」。第二，廢止以往常以敕令任意將從價稅變更爲從量稅的規定，重要商品稅率皆以法律明定。第三，舊法雖已有「報復關稅」的處分，但稅率過輕，新法修正爲得在關稅之外，課徵與課稅商品價格同額以下的特別關稅。第四，減低米穀輸入稅的相關規定。第五，免稅品的增加，總計免稅品數目多達 23 種。<sup>37</sup>

其次是關於附屬稅表改正方面。第一，類別減少、稅目細分。新稅表將性質相近類別盡量合併，種類從 19 減爲 17 類；但儘管類別減少，稅目分類則依照商品性質及價格來細分，從舊法的 538 號 819 種（免稅者 47 種）增加爲 647 號 1,566 種（免稅者 86 種），其目的除爲了便於條約締結外，也爲求從量稅公平。第二，從量稅數量增加。以往從價課稅的商品都盡量換算爲從量課稅，其課稅額原則上以近一年平均輸入價格算出，但若因物價騰貴，導致稅率過高，則改以近 3 至 5 年的平均價格爲基礎。第三，新法修正課稅貨物的秤量標準，避免使用英美度量衡，原則上重量使用日本的斤，其他方面則採用公制。第四，稅率標準大體採用舊稅率的編成方針，並參酌課稅品加工程度、內地生產消費狀況來制定。大致說來，未製品、半製品爲輕，全製品較重；預期將來發達的商品給予適當保護，反之則採取輕稅；爲保護農業，對於重要農產品採取保護策略；生活必需品及工業用原料品稅率較輕，奢侈品、嗜好品則課重稅以挹注國庫；至於條約改訂前仍受惠於協定關稅的輸入品，其稅率盡可能不大幅增加，以免引起通商各國反感及造成經濟上的遽變。換算爲平均輸入稅率，若就全部輸入品來看約爲 14%，若純就應稅品輸入額來看則爲 22%，和受制於協定關稅的舊法相比，新法實際平均稅率僅增加 4%，仍較採用保護主義的歐美各國稅率偏低。<sup>38</sup>

要言之，新法最大特點是產業政策與社會政策並重。新稅表雖以增加國庫收入爲主旨，但對於外國商品所課輸入稅，僅止於不阻礙內地產品輸出及不打擊本國商品生產；對於需要保護的產業，若預期將來發達，則採取保護關稅以助長之；且由於盡可能採用從量稅，故爲求課稅公平，稅率訂定除須伴隨物價波動外，尚須考量國內供需狀態、外國品競爭之有無、生產技術難易、需要者的階級與價格關係、是否適合作爲財政關稅等條件，可以說已經融入保護主義、收入主義及社會政策主義。<sup>39</sup>

本次國定稅率頒行前，「臺灣輸出稅及出港稅規則」與「臺灣特別輸入稅」已相繼在 1910、1911 年廢止。所以從第三次關稅定率法頒行起，日、臺真正實現無差別的關稅統一政策。

37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 342-345。

38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 345-350。

39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の關稅》，頁 54-5。

## 五、第四次關稅定率法（1926年3月29日起）

一次戰後世界經濟情勢激變，日本的產業與對外貿易也受到很大影響，1919年7月，內閣成立臨時財政經濟調查會，並於其中設置關稅特別委員會以審議國定稅率改正的根本方針。<sup>40</sup>經過數年討論，於1923年7月18日提交內閣總理大臣加藤友三郎，惟適逢關東地區發生大地震，<sup>41</sup>遲至翌年3月才由新任內閣總理大臣清浦奎吾裁示通過。同年6月，新成立的加藤高明內閣對於關稅定率法的修訂更為積極，8月在內閣設立關稅率改正委員會，進行關稅率修訂相關調查。<sup>42</sup>

委員會首先確立本次修訂並非以增加歲入為主要目的，將重心集中在塑造有利於內地產業的生產條件，同時對重要產業則視外國品的競爭程度加以保護；另一方面也考慮消費者利益，謀求國民生活安定，並對稅率加以適當安排。<sup>43</sup>

方針既定，財政部門即著手修訂新的關稅定率法及附屬輸入稅表。1926年1月，內閣將修正案提交第51次帝國議會，於3月29日公佈施行。<sup>44</sup>新法本文涵蓋課稅標準、報復關稅、相抵關稅、反傾銷關稅、米穀關稅、免除關稅、原料退稅、輸入禁制品等各項相關規定。<sup>45</sup>相對舊法，其改正要點如下：第一，鑒於最近國際貿易趨勢，在報復關稅中增加「對本國輸出品及通過品，較對第三國不利時，則對其國輸出品及通過其國的商品，也在本國課徵報復的附加關稅」之規定；第二，配合國際禮節通例，適用自用品免稅的對象，除外國大使、公使外，加上「相等使節」，並追加兩國互惠的但書；第三，再輸出的免稅品增加製作樣品一項；第四，為獎勵輸出貿易而列入退稅的原料品項目，刪除亞鉛華，增加茶鉛及油<sup>46</sup>改變亞鉛薄板的厚度限制，並將肥料改為油糟。

此次關稅定率法是日本在臺統治期間最後一次頒布的國定稅率，其後再無大規模更動。隨著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各國關稅壁壘日益加深，為保護本國產業，日本也頒布不少特別法以取代之，所以許多輸入商品早已非原本表訂稅率。據統計，迄1935年為止，受制於關稅定率法之外的特別輸入稅法，本表稅率中，大約有60%已經失效。<sup>47</sup>

綜上所述，透過國定稅率的修訂過程，可以具體觀察到日本領臺時期的關稅政策，大約歷經四個階段的演變：

第一階段屬於財政關稅階段，時間介於第一、二次關稅定率法頒布之間。第一次國定稅率關稅定率法訂立於新條約改訂之後，雖標榜以收入及國內產業保護為目的，但因協定稅率仍未廢除，關稅自主遙遙無期，故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此時期日本政府的關稅政

40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449-451。

41 加藤下臺後，1923年9月，山本權兵衛組閣，旋於1924年1月下臺，改由清浦奎吾擔任首相。見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頁263。

42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451-458。

43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の關稅》，頁80-1。

44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461-464。

45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の關稅》，頁83。

46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459-460。

47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の關稅》，頁85。

策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增加稅收。例如藉由日俄戰爭徵收「非常特別稅」變相提高輸入稅；又如 1899 年日本既已廢除輸出稅，卻允許總督府在臺頒布「臺灣輸出稅及出港稅規則」，其著眼點正在增加歲入。

第二階段是在第二、三次關稅定率法頒布之間。日俄戰後，歐洲列強已不敢小覷日本國力，故日本政府趁著整理非常特別稅法之際，頒布第二次關稅定率法，逐步提高一般稅率。尤其對攸關本國工業發展的輸入商品更是如此，故其最大特色是開始具有「保護關稅」色彩，關稅政策的重點置於產業保護。同時獨存於臺灣的輸出稅和出港稅，則在財政獨立後廢止，此後日、臺關稅政策正式合一。

第三階段是從明治末期到大正末期。1911 年第三次關稅定率法的頒布，象徵日本正式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得以自主決定關稅稅率，從而此時期的關稅政策，開始由保護關稅、財政關稅趨向社會政策、產業政策的主張。

大正末期開始，日臺關稅政策進入第四個階段。政策重心從保護關稅、財政關稅進入到落實社會政策、產業政策的階段。其主要關鍵是一次戰後世界經濟情勢丕變，制定於明治末期的政策已無法適應新時代需求。1924 年加藤高明內閣成立後，積極從事稅法修訂，將重心集中在塑造有利於內地產業的生產條件；同時對重要產業，則視外國產品的競爭程度加以保護；另一方面也考慮消費者的利益，謀求國民生活的安定，並對稅率加以適當安排。

## 肆、日本殖民帝國的「關稅同化政策」及日、法間的異同

### 一、臺灣以外的殖民地

臺灣之外，日本尚擁有其他殖民地，以下將分別簡述其關稅政策，以解明日本在殖民地經營上的共同特色。

#### （一）樺太

樺太是日俄戰後取得的庫頁島南半部地區。其統治的最大特徵便是直接以敕令將內地法律公佈施行於此處，所以較其他殖民地更早內地化。關稅制度亦不例外，1909 年 4 月 1 日起，日本的關稅法、關稅定率法、噸稅法全盤在此施行，而且指定開港場大泊港歸函館稅關所管轄，所以關稅制度與內地全然無異。<sup>48</sup>

#### （二）南洋群島

南洋群島是 1914 年日本利用一次大戰爆發出兵佔領，並在 1919 年凡爾賽和約中由國際聯盟委任統治之地。位於西太平洋赤道附近的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之內，包括現在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帛琉、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也稱為南洋諸島或內南洋。戰爭期間，日本曾先後在 1915 年 2 月及 10 月制定「南洋群島稅制」及「南洋群島關稅規則」，原則上輸出入當地貨物仍被視同外國課徵關稅，不過在 1915 年 10 月至 1916 年 10 月間曾

48 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頁 67-68。

免除日本輸入貨物的輸入稅。迨取得委任統治權後，爲了永續支配，乃朝關稅統一的方向思考。1922年5月30日公佈「南洋群島關稅遵行關稅法及關稅定率法」，除少數例外事項外，與內地施行同一關稅制度。<sup>49</sup>

### （三）朝鮮

朝鮮雖然早在併吞之前，日本即處心積慮要將其逐步納入本國關稅圈內，<sup>50</sup>不過到1910年合併時，卻爲了應付列強而發表關稅不變宣言，因此最初十年，仍因襲以原朝鮮政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爲基礎的關稅制度，朝鮮仍無異於關稅上的外國。儘管如此，日本政府還是做了些微變動：首先，原本與日本、臺灣、樺太往來貨物所課徵的輸出入稅改爲移出入稅；其次，1913年頒布「米及穀移入稅廢止相關法律」，對朝鮮生產品輸入日本採取優惠措施，這也是日本對殖民地採特惠關稅制度的一個特例。1920年關稅不變期滿後，日本決定朝著內鮮關稅統一的方向改革，8月26日將日本的關稅法及關稅定率法公佈於朝鮮，自29日起實現了與日本關稅統一。但是相對於臺灣大致未採行特例而實行完全統一，朝鮮則爲了補強朝鮮總督府財政而採取兩項特別措施，形成不完全統一：第一是對於從外國輸入的部分物品，如金、銀、銅、煤的採掘或煉製器具、機械等，給予輸入稅減稅乃至免稅的措施；第二是對於從內地移入物品，仍保留移入稅，直到1941年才完全取消；同時對於部分移出日本的朝鮮商品，仍課徵出港稅以調節兩地物價，凡此都是爲了補強朝鮮總督府財政而採取的措施。<sup>51</sup>

### （四）關東州

關東州也是日本殖民地統一關稅圈的另一個特例。此地是日俄戰役後取得的租借地，依國際法上的地位與自由港宣言的經營政策，並無法納入日本關稅圈內。但是爲圖以日本資本來振興關東州產業，也爲了有利於將來滿洲產品輸入日本，日本乃仿照英國及其殖民地間所採行的特惠稅率。<sup>52</sup>

爲了替日、關之間的特惠關稅鋪路，1906年所頒的第二次關稅定率法即規定：「未能依照條約享受特別協定方便與利益的地區之產品，必要時得以敕令給予不超過該協定限度的減稅或免稅利益」。新稅率實施後，同年9月隨即發布「關東州生產物品輸入稅率相關法令」，規定「關東州生產物品之輸入稅率比照協定稅率，但關稅定率法所定稅率較協定稅率爲低時，則不在此限」。<sup>53</sup>如此一來，關東州產品遂享有較其他無約國家更優惠的待遇。大正末年，日本政府爲了進一步撤去日、關間關稅壁壘，乃決定免除30種關東州產

49 所謂的例外事項，便是1922年5月30日公佈「南洋群島出港稅令」，對輸出日本及其他殖民地的酒類、砂糖課徵出港稅。參見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頁73。

50 如1906年11月以敕令304號公佈「韓國生產品及清國生產之銑鐵等之輸入稅相關規定」，對韓國生產的銑鐵、錫塊及錠、水銀等數種金屬之輸入稅率，給予和協定稅率同樣的優惠。參見《臺灣總督府報》第2094號，明治39年12月11日，p.34。

51 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頁69-73。

52 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頁78。

53 「敕令262號」，《臺灣總督府報》第2055號，明治39年10月6日，p.26。

品關稅，遂在 1925 年 6 月公佈「關東州生產物品輸入稅免除相關法令」，並於 7 月施行於臺灣。<sup>54</sup>繼而滿洲國獨立後，將關東州納入，殖民地特惠關稅便不再適用，但因日本與滿洲國締結關稅協定，故仍可享受來自滿洲國的特惠。

總結上述，排除租借地關東州不論，除了朝鮮外，其餘的樺太、南洋群島，日本所採行的關稅政策都與臺灣一樣，將其與母國的關稅政策完全合而為一。然而，此類型的關稅政策，究竟是日本習自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抑或有其獨特之處？以下將接著討論法國式的關稅同化政策，以明日、法兩國之異同。

## 二、關稅同化主義的原型：法國殖民地的關稅政策

日本所採行的殖民地關稅政策雖與法國較為接近，然而法國本身也非一成不變，故以下擬先對法國殖民地關稅政策加以探討，繼而比較日、法政策，以明瞭日本與先進殖民國家間的差異。

### (一) 早期殖民地關稅政策的確立

法國對殖民地的關稅政策曾經過數度的變遷，迄 1883 年，逐漸朝向關稅統一，終於在 1892 年 1 月 11 日通過的關稅法，確立「關稅統一主義」的政策特徵，這個法律即成為日後殖民地關稅制度的骨幹。

關稅法參酌殖民地的地理、產業及民情，將其大別為兩種：一是「統一殖民地」或「同化殖民地」，原則上與法國施行同一種關稅制度；另一則為「非統一殖民地」或「非同化殖民地」，保留其固有關稅制度，而與法國本國關稅制度相異。<sup>55</sup>其後適用統一關稅制度的地區漸增，1897 年馬達加斯加島合併諾需北、戴哥索雷、聖馬利等地加入「統一殖民地」；20 世紀初期「統一殖民地」對外貿易額達 6 億法郎，而「非統一殖民地」則不過 2 億法郎。<sup>57</sup>以下簡述兩者特徵。

#### 1. 統一殖民地的關稅政策

除了埠頭稅是不問生產地何處，只要輸入法領殖民地的貨物一律課徵外，統一殖民地的關稅可分輸入稅、輸出稅、從殖民地輸入法國本國時的輸入稅三部分來探討：

(1) 輸入稅 統一殖民地的輸入稅課徵分三種情形：第一是法國產品及在法國已付稅的

54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頁 529-531。

55 此部分計有：計有：馬提尼克島 (Martinique 位於西印度群島)、哥德洛普 (Guadeloupe 位於西印度群島)、圭亞那 (Guiana 位於南美)、聖皮耳 (Saint-Pierre 紐芬蘭南方小島)、密克隆 (Miquelon 聖皮耳西方小島)、瑞歐尼 (Reunion 馬達加斯加東方小島)、馬又脫 (Mayotte 馬達加斯加西北小島)、加彭 (Gabon 法領赤道非洲)、法領印度支那 (越南、柬埔寨、寮國)、新喀里多利亞 (New Caledonia 西南太平洋小島)。參見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南支南洋の關稅と內國稅》(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1935 年)，頁 125。

56 此部分計有：非洲海岸的法屬地 (加彭除外)、大溪地 (Tahiti) 及其保護領、印度的法國經營地 (French Establishment of India)、歐柏克 (Obock 非洲阿比西尼亞東海岸)、戴哥索雷 (Diego-Suarez 馬達加斯加北方小島)、諾需北 (Nossi-Be 馬達加斯加西北小島)、聖馬利 (Saint-Marie 馬達加斯加東北小島)。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南支南洋の關稅と內國稅》，頁 125。

57 以下有關法國殖民關稅政策的演變，除文中另有註明出處者外，概請參閱日本商工會議所編，《佛國及佛領印度支那の關稅政策》，(東京：日本商工會議所，1930 年)，頁 96-136。

外國商品，若採取直航，可免稅輸入；第二是由其他殖民地輸入商品，原則上不課稅，起初並無例外，惟從 1904 年 4 月 19 日起，對法領印度支那產品課徵與最惠國相同的輸入稅；第三是外國輸入商品，原本課稅與法國本國相同，但 1893 年發布特別命令，給予數項民生相關商品特惠稅率，如動物、玉米、米、魚、鹽、豆莢等食品採取免稅或低稅率，咖啡、茶、香料比照殖民地降低輸入稅；生產砂糖的殖民地化學肥料免稅；馬達加斯加島煤炭免稅。

(2) 輸出稅 1863 年以後法國本國即撤廢輸出稅，但統一殖民地依舊保留，其輸出稅可分為三種：第一是財政性質的輸出稅，不問發送地何處，所有輸出品皆加以課稅，馬達加斯加、加彭、圭亞那、新喀里多利亞等即屬之；第二是只有在輸出外國時才加以徵收，如印度支那即是。第三是替代性質的輸出稅，亦即代替直接稅的課徵，主要在瑞歐尼施行。

(3) 從殖民地輸入法國本國時的輸入稅 來自殖民地的商品，依殖民地生產及外國生產轉口，其徵稅方式也有所不同。殖民地生產的商品原則上不應課徵任何關稅，但因砂糖、咖啡、可可亞等的消費稅，係法國財政上的重要財源，基於財政觀點考量，在 1881 年及 1892 年的關稅法中，將兩類殖民地生產商品排除在免稅條件之外：第一類是咖啡、可可亞、茶、胡椒、牙買加甜胡椒、小荳蔻、肉桂、山扁豆、肉荳蔻、肉荳蔻華、丁香、香草等商品，課徵法國普通稅率之半，旋因法國調降外國商品輸入稅率，此類商品稅率亦隨之下降；<sup>58</sup> 1900 年 2 月 14 日以後進一步適用最低稅率，1913 年 8 月 5 日再次修改法律，除胡椒外，其餘商品一律改為免稅。第二類是砂糖及其製品、糖蜜、餅乾、蜜餞等商品，課徵與甜菜糖、蔗糖同額的輸入稅，原因是為了保護法國的甜菜糖業與製糖業（以外國產蔗糖為原料），相當於是一種保護關稅，其後亦逐漸降低，1897 年 4 月 7 日起改按距離遠近來調降關稅。至於外國生產的轉口商品，理論上須先在殖民地支付輸入稅，並取得當地國籍，從而其輸入法國時，無須再付稅。然實際上法國政府對於從法領殖民地轉口商品，往往課徵普通稅率（最高稅率），引發商人重複課稅的抱怨，因而 1900 年立法規定：在殖民地已付稅的外國商品輸入法國時，只要支付最高稅率與已付關稅的差額。然而仍較生產國直接輸入法國的關稅為重，因為這些生產國多半與法國訂有關稅協定，可以適用最低稅率；一旦經由法國殖民地輸入，反而要課徵最高稅率。而法國政府之所以如此規定，是為防止外國商品藉由走私進入殖民地後轉輸法國，獲取不當利益。

## 2. 非統一殖民地的關稅政策

非統一殖民地的關稅政策各地並不一致，現在依其情況概述如下：

(1) 法領西非殖民地：西非的法領殖民地介於四個英領、一個荷領、一個德領殖民地之間，各國殖民地各採相異的關稅制度，導致法領西非的關稅制度統一至為困難，不得不保留當地特別關稅制度，不問法國或外國產品，一概在輸入之際，以地方命令課徵消

58 例如外國咖啡的輸入稅最初每百公斤 156 法郎，殖民地咖啡的輸入稅則為 78 法郎（減少 78 法郎）；其後外國咖啡降為每百公斤 136 法郎，殖民地依舊減少 78 法郎，稅率僅為 58 法郎。見日本商工會議所編，《佛國及佛領印度支那の關稅政策》，頁 111。



費稅。直到 1904 年 10 月 18 日成立統一政府，廢除消費稅，轉而對通過西非的商品及船舶，在其輸出之際課徵關稅，以作為法領西非政府的收入，於是漸將當地的關稅制度統一，對於法國品與外國商品一視同仁加以課稅。

(2) 法領赤道非洲：除了加彭係「統一殖民地」外，其他地方於 1885 年 3 月 26 日的柏林會議曾決定對各國船舶及商品採行平等待遇主義；然而由於財政收入的目的，1890 年的布魯塞爾會議宣示得課徵不超過從價 8% 的輸入稅；1892 年法、白、剛果的代表於里斯本簽署議定書，決定輸出入商品應課稅率，以十年為期，其後隨時延長更新。依據 1912 年法國佈告，當地關稅率為：不問原產地何處，對輸入商品課徵從價 10% 關稅；動物、米、水泥、磚、鐵、鋼課徵從價 5%；煤炭、機械、鐵路建設材料課徵從價 3%。

(3) 法領索馬利蘭：當地並未課徵任何輸入稅，惟對若干物品，不問產地為何，在其輸入時課徵消費稅；同時對動物、生皮、蠟、咖啡、象牙等商品課徵輸出稅，成為最主要財源。

(4) 法領印度：除法領印度支那屬「統一殖民地」外，其餘地區並無輸出入相關的關稅制度，僅對火酒（不問產地）課徵消費稅。

(5) 大洋洲：從 1892 年 5 月 9 日起對外國輸入品課徵關稅，其後屢次改正；1906 年 2 月 17 日公告加重輸入稅，輸入品課徵從價 8% 至 15%，甚至少部分高達 30%；輸出稅方面，依據 1899 年 3 月 12 日佈告，對真珠貝課徵每千瓦 15 法郎的稅額；1906 年 6 月 12 日減輕為 6 法郎，不問發送地為何處皆須課徵。此外乾椰子肉、磷酸鹽也需課徵輸出稅。

至於非統一殖民地所產商品輸入法國本國時，原則上適用最低稅率，但有三種例外：第一是砂糖及其製品，課徵與統一殖民地相同的輸入稅；第二是法領印度支那製上等棉布原本免稅，但其後與法國紡織業產生競爭關係，1904 年 4 月 19 日起以法律限制免稅輸入的數量；第三，法領非洲所產棕櫚油、木材、咖啡、香蕉、可可亞、牛等產品，每年僅特定數量得以免稅。

### 3. 特殊屬領地關稅政策

此外，尚有兩個「特別屬領地」，一是新海布里地群島 (New Hebrides)，1906 年的倫敦條約將此地劃為英法共管，最初並無關稅制度，基於前述條約，由英法兩國最高委員對酒精、香料、咖啡等 15 種商品設置輸入稅，一律課徵從價 10%。另一個是突尼斯，依據 1881 年的波羅的海條約成為法國保護領，1897 年獲得關稅自由，1898 年發布兩個命令：第一，對 827 種商品課徵輸入稅，稅率為從量或從價 8%，但多數商品為免稅；也有部分基於衛生或治安的理由，列為禁止輸入商品；同時也徵收輸出稅，惟其後漸次減少。第二，從法國及阿爾及利亞輸入商品，原則上比照前述命令課徵輸入稅，不過動物、砂糖、鐵製品、絲織及紡織品、衣服類、機械類、金屬製品等免稅；生葡萄酒課徵從價 10%；已在法國及阿爾及利亞繳納關稅的外國產品，不得享有免稅或減稅優待。至於突尼斯生產品輸入法國本國時，最初比照外國商品處理，連最惠國待遇也不得享有。經過移居當地的法國人民再三請願，1890 年放寬穀物、橄欖油、家畜類、鳥類、動物得以免稅輸入法國；生葡萄酒稅率則大幅降低，至於其他商品仍未能受惠。

## (二) 殖民地關稅政策的動搖與 1928 年的殖民地新關稅法

1892 年以來所確立的殖民地關稅政策，由於殖民地關稅獨立運動而有所改變。一次戰後激烈的經濟情勢變化，使得各殖民地的關稅獨立運動蓬勃發展。例如法領印度支那，長年反對法國強加的關稅制度，主張採用適合當地現狀的獨立關稅制度，戰後此願望更為強烈。而法國與統一殖民地的單向免稅規定，不但待遇不平等，且將以本國產業的需要與利益而制定的關稅政策強加在情況各異的殖民地上，更妨害了殖民地的開發。因此關稅獨立運動者便以此論點，強力要求允許制定適切的關稅制度。

鑒於各殖民地的反抗，法國在戰後所制定的關稅規則，並未強加在各殖民地上，遂導致殖民地關稅制度更趨複雜。因此，為統一整理殖民地的關稅法規，並回應統一殖民地的部分要求，1928 年 4 月 13 日遂發布殖民地新關稅法。新法變更重點主要有四：第一，以往當作「準本國」處理的統一殖民地，減為六個地區，其餘則編入非統一殖民地。此意味著不再強迫納入本國關稅圈，而是考慮殖民地要求，採用促進當地開發的殖民地特有關稅制度。第二，統一殖民地的關稅與本國齊一。以往統一殖民地的部分商品輸入法國時，須課以輸入關稅，這也成為統一殖民地關稅制度崩壞的導火線，於是本次新法一概撤廢，以圖維持。第三，關稅率相關法令，自發佈日起四個月內，需公佈於統一殖民地。這是鑒於以往關稅率的法律常有延遲公佈，久未施行的情形。第四，允許統一殖民地設定特別關稅率。為了因應殖民地的需要與實況，新法允許統一殖民地的地方議會或經濟代表會等，有權提出申請制定與法國相異的特別關稅率，法國政府在接到申請後，需在三個月裁定同意與否，否則視同採納。此點對統一殖民地而言是最重要的關稅政策變更，其後法領印度支那即以此為依據，對日本商品設定特別稅率，阻止日本商品輸往該地，將殖民地方面的要求具體化。<sup>59</sup>

換言之，新頒布的關稅法雖仍維持關稅統一政策的基調，但也不得不正視殖民地此仆彼起的關稅獨立運動，而允許採取更彈性的關稅政策。

## 三、日、法殖民政策的異同

矢內原忠雄曾經從地理上、財政上、經濟上、政治上及原住民政策五個方面來比較日、法兩國的殖民政策，綜合歸納其意見，兩國殖民政策相同之處如下：

首先從地理上來說，滿洲事變以後日本的大陸政策，是計畫從日本越過日本海到達朝鮮，再從朝鮮延續到滿洲、內蒙、華北，形成一個軍事上、政治上支配的大地理集團；同時將鐵道路線的鋪設當作急務，考量的不僅是物資集散及輸送的經濟條件，毋寧是軍隊輸送的最短距離路線之選擇。這種以地理上的集團觀念來支配殖民地，以及明顯由軍事觀點所指導的計畫，使得日本對滿蒙的進出與法國的非洲大陸政策有著極為顯著的相似之處。尚有一點地理上的巧合是從滿洲西部橫亙蒙古的沙漠地帶，與法國殖民地也有撒哈拉沙漠的存在相類似。沙漠的存在雖僅僅是偶然，但是不論經濟的生產條件如何，面對接壤地區

59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南支南洋の關稅と内國稅》，頁 127-137。

的軍事行動，如果根據以此為背景的政治工作，遂行國境線擴大的事實，絕不可說是偶然的類似。

其次就財政上而言，法國近年在摩洛哥及敘利亞的征服與統治相關軍事費用增加，與日本由於滿洲經營及統治所導致的軍事費用膨脹，是屬於同一性質、同一型態的財政問題，亦即廣義的殖民地相關財政，純軍事費用支出相較於純行政費用支出的總額，是不成比例的巨額；同時不論殖民地征服取得上必須的軍事費用，或統治開始後的軍隊駐紮費用都全由本國負擔。

第三，就經濟上而言，日本的殖民地經濟政策是以本國為中心的集團政策，與法國同樣實施關稅同化政策，而其程度則比法國更加徹底；而日本的對外貿易中，殖民地所佔的比例，輸入從大正 12 (1923) 年的 17% 提高到昭和 5 (1930) 年的 29%，輸出在同一時間則由 14% 增加為 26%。相較於外國貿易雖然不多，但其比重有提高的傾向，這個事實與法國相同，彰顯出帝國主義時代當中殖民地的意義；同時日、法兩國殖民地的重要產品，常與本國呈現競爭態勢（如阿爾及利亞的葡萄酒、朝鮮的米、滿洲的煤炭），且儘管瞭解世界市場的相對重要性在殖民地之上，但仍主張緊密的集團經濟政策，多半是考慮到帝國內軍需品資源的自給自足，因而日本在滿洲事變後高唱入雲的集團經濟論，特別是日鮮滿經濟集團政策，與法國的「開發計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四，在政治上，兩國殖民地行政上的同化政策情形相仿，並未專為殖民地行政而有特別的官吏養成，或者另設國家考試制度，而是以與本國官吏相同的一般性資格來滿足，且承認彼此之間地位的融通性，不認可殖民地特殊的行政制度，自主的政治發展等；同時在強化殖民地行政的中央集權性一事，兩國的情形也極為類似（如滿洲經營的中央行政機關，除了拓務省、外務省之外，另設直屬內閣的對滿事務局）。

最後在原住民政策上，日本和法國相同，都是藉由教育，特別是語言進行同化政策，即藉由教導殖民地人民日（法）語，將其轉化為日本（法國）人。

當然兩者也不乏相異之處，就地理上而言，日本的殖民地是以本國為中心呈輻射狀取得，雖然夾雜著海洋，相較於殖民地散佈五大洲的法國、英國、荷蘭諸國，顯得較為集中。同時在擁有殖民地集團之政治地理學的意義上，兩者之間也有顯著的差異。法國在 1830 年即已征服阿爾及利亞，為的是在此地恢復拿破崙戰爭中所失去的國威、王權、武力，而在普法戰爭後，正好作為亞爾薩斯州農民集團移住殖民的地點；1870 年代以後相繼征服了安南 (1874)、剛果 (1875)、突尼斯 (1881)，一方面固然出於產業資本帝國主義的要求，另一方面則是將普法戰爭戰敗的憤怒發洩在征服殖民地上，基於國家的榮譽心，將歐洲戰場上被打倒的國旗在其他大陸上高高舉起。俾斯麥利用法國人此種心理，對於法國取得殖民地展現友好的態度，將法國人對政治及軍事的關心，轉向殖民地的取得，化解了對德國復仇戰爭的危險。然而近年日本大陸發展的地理方向，是朝著在東洋常年累月的軍事政治對立國俄國與中國的國境前進，其政治地位與受到法國征服時的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等不可同日而語。加上近年中國逐步實現民族國家的統一，國家意識變為強烈，從而日本在此地遂行領土或軍事的膨脹，從政治地理學來看，無法如同法國的情形，

藉由殖民地的發展來消解朝向國際戰爭的危機，相反的，戰爭卻有一觸即發的危機。從誘發國際戰爭的危險性來看，日本比起法國更值得注意。

財政上兩國也有部分的差異，日本的殖民地當中，臺灣和南洋群島分別在明治 38 (1905) 年及昭和 7 (1932) 年以後，不需要本國的補助金支出，不過朝鮮、樺太、關東州則持續從本國接受財政上的補助。矢內原認為日本對朝鮮及其他殖民地持續財政上的補助，除了當地財源基礎相對薄弱、官僚的行政組織費用高昂等原因之外，也包含了以父權保護政策進行經濟及文化開發的意義。因而相較於法國的情況，以對殖民地財政持續補助的事實來推論日本殖民地相對的未開發並不恰當，事實上日本殖民地的經濟發達速度比法國殖民地大概還略勝一籌。

經濟方面，兩國的差異表現在人口問題上，人口自然增加率大的日本與增加率小的法國關於殖民地價值的認識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法國期待殖民地能作為人口供應地，日本則將其視為過剩人口的移住地；同時儘管兩國同是基於本國為中心的軍事觀點，但法國對殖民地原住者施以軍事訓練，以此補強本國的兵力，相對的，日本並未對殖民地原住者實施徵兵法，不給予擁有武器、軍事訓練的機會。

在政治上，日本的殖民地行政，從上級到下級官吏，多半由本國人充當，極少有給予原住者地位的情事，關於殖民地人民參政權的問題，更是屈指可數，僅具象徵意義，不似法國的作法是將殖民地選出的議員加入本國議會中，因而其本國中心的專制性統治性質，毋寧較法國更為明顯。<sup>60</sup>

由上述可知，日本在殖民地經營上所採行方式，有不少是參酌法國經驗，因而回歸到關稅政策上來觀察，其明顯偏向法國式的關稅同化主義便不足為奇。例如：日、法皆廢止本國輸出稅，但在殖民地則部分保留，只不過保留輸出稅的因素各異，法國殖民地徵收輸出稅，具有財政、主權宣示、替代直接稅徵收三種性質，而日本在臺灣徵收輸出稅（含出港稅）則純屬財政性質；又如日本也仿效法國徵收砂糖消費稅，惟法國一開始即由本國徵收，藉以挹注財政，日本起初視為變相輸入稅，任臺灣徵收，待見臺地砂糖業大盛，稅額可觀後，才加以奪取，殖民心態充分流露。

若進一步加以細究，日、法關稅同化主義仍有相當程度差異。首先，法國以特別頒布的殖民地關稅法來執行殖民地關稅政策，但日本並無類似法律，僅以敕令將國內法律同步施行於殖民地。其次，法國將殖民地依關稅差異區分為統一殖民地、非統一殖民地，以及少部分特殊屬領地，後二者固未加以同化，即使統一殖民地的關稅也非與母國全然一致，最顯著的便是法國基於財政與產業考量，針對部分殖民地特產課徵輸入半稅，以致統一並不完整；且 1928 年後，有鑒於殖民地關稅獨立運動此起彼落，乃主動修改殖民地關稅政策，減少統一殖民地數目，甚至允許該地區議會或經濟團體有權訂立適用當地的特殊稅率。換言之，法國式的關稅同化主義，不但非全面實施於所有殖民地，即使在實施地區，同化亦不完全，而且隨著時間不同，也稍稍染上英國關稅適應主義色彩。至於日本畢竟

60 矢內原忠雄，〈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佛植民政政策比較の一論〉，《國家學會雜誌》51：2，頁 172-79。

不如法國「家大業大」，領有的殖民地僅臺灣、樺太、朝鮮、南洋群島，以及租借地關東州，所以其殖民地關稅政策相對單純，同化程度也更為徹底，所有殖民地皆可視為統一殖民地，惟朝鮮稍有例外。

## 伍、結論

殖民政策的兩大趨勢，即是以法國為典型的「同化劃一主義」和以英國為代表的「放任主義」或「適應主義」。英國雖非本文敘述主體，惟其既為十九世紀的殖民大國之一，在此略加贅述。英國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一次大戰之前，對殖民地皆採行「關稅適應主義」，自治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亞聯邦等固然如此，直轄殖民地印度、新加坡、香港等，也各有其獨立的關稅制度，同時本國與殖民地間的特惠制度也加以廢止。然而一次戰後，世界貿易傾向保護主義，終於在 1919 年 7 月，透過財政法第八條的規定，重新恢復帝國境內的特惠待遇；繼而遭逢世界經濟大恐慌，乃藉由 1932 年 3 月的「一般關稅法」及同年夏天的渥太華會議，進一步強化英鎊區 (sterling bloc) 內的「特惠關稅」制度。<sup>61</sup>

而法國原先大致上是採行關稅同化主義，但 1928 年 4 月的法律修正後，除主要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完全納入本國關稅圈外，其餘各殖民地依照其關稅制度及對本國關係可區分為兩種：第一種包含印度支那、馬達加斯加、哥德洛普、馬提尼克島、圭亞那、瑞歐尼等地區，與法國本國採取同樣關稅制度，且與本國（含阿爾及利亞）間的輸出入免稅，但是法國政府藉由殖民地總督府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得以對上述殖民地的特定商品給予特別稅率；第二種殖民地係第一種以外的全部法領殖民地及屬於委任統治的非洲，其與法國本國雖採取相異的關稅制度，但是藉由總統命令，免除由本國輸往殖民地商品的關稅，藉以保護國內生產者。尤有進者，在 1928 年的新殖民地關稅法中，更允許殖民地得以因應當地的需要與實況，經由地方議會或經濟代表會，申請制定與法國相異的特別關稅率，稍稍染上「關稅適應主義」的色彩。就關稅政策的角度來觀察，法國的事例正透顯出，殖民帝國所採行的政策並非一成不變，由於時代不同，其組合方式亦各異，甚難完全加以類型化。

至於後進殖民帝國日本，雖參酌法國模式，卻執行得更為徹底。第一個殖民地臺灣在領有之後，隨即納入其關稅圈中，尤其在 1911 年以後，臺灣的單行稅則皆失效，完全與日本合而為一。且這並非日本帝國統一關稅圈內唯一事例，除了朝鮮稍有不同外，其餘的樺太、南洋群島，莫不如此。就殖民地關稅政策來看，日本所表現出來的「同化主義」似較法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而與英國型的「適應主義」形成「侵略」與「開明」對比。其間的不同，套用山本有造的話來說，不外乎是「在全球構築『海洋型』帝國的最先進帝國主義國家英國，與附著在東亞中國圈，意圖構築『大陸型』帝國的最後進帝國主義國家日本之間所見到的一個差異」。<sup>62</sup>

61 山本有造，《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頁 77-78。

62 山本有造，《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頁 111。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八卷》，東京：財政經濟學會，昭和 13 年。
-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十九卷》，東京：財政經濟學會，昭和 15 年。
- 小島憲，《植民政策綱要》，東京：章華社，1934 年。
- 山本有造，《日本植民地經濟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 年。
- 千住精一，《臺灣稅務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大正 7 年。
- 井出季和太，〈領臺以來的貿易に關する法制（上）〉，《臺灣時報》第 135 號，昭和 6 年 2 月，頁 20-25。
- 井出季和太，〈領臺以來的貿易に關する法制（下）〉，《臺灣時報》第 136 號，昭和 6 年 3 月，頁 40-45。
- 日本商工會議所編，《佛國及佛領印度支那の關稅政策》，東京：日本商工會議所，昭和 5 年。
- 平井廣一，《日本植民地財政史研究》，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7 年。
- 矢內原忠雄，〈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佛植民政策比較の一論〉，《國家學會雜誌》第 51 卷第 2 號，頁 172-79。
- 呂理州，《明治維新》，臺北：遠流，1994 年。
- 林滿紅，〈清末臺灣與我國大陸之貿易型態比較〉，《師大歷史學報》期 6（民國 67 年 5 月），頁 209-243。
-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1996 年。
- 稻田周之助，《植民政策通解》，東京：巖松堂書店，大正 13 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一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1 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四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3 年。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明治 29 至昭和 17 年。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官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昭和 17 至 20 年。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十三編下「明治四十年度分」（《中國方志叢書》第 192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74 年。
-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南支南洋の關稅と內國稅》，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昭和 10 年。
-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臺灣の關稅》，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昭和 10 年。
- 臺灣總督府淡水稅關，《臺灣稅關十年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淡水稅關，明治 40 年。

Title: "Recording the hideous events": The Second Self in James  
Hogg's *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記錄隱晦的心靈思緒」：在詹姆士·哈哥的《一個自辯正  
當罪人的私人回憶錄和告白》中之第二自我

林欣瑩\*

Hsin-Ying Lin

(收件日期 102 年 9 月 30 日；接受日期 102 年 11 月 20 日)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how James Hogg deploys an editor's point-of-view narrative form to ridicule the pretences and prejudices of an essentially political-religious society.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psychological novel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in 1886, James Hogg offers his view of the evil of his age (1770-1835). Hogg's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shows his concern with his society's ideological disintegration with regard to its religious-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The protagonist Robert takes the advice of a strange companion and enters into a life of crime that he considers to be a life of divine service. He rids the world of "ungodly" people such as his brother and the local country minister. Robert disappears from home not long after his brother George inherits the title of Laird, having committed several additional crimes, such as killing his mother.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it is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that motivates Hogg to write the character of Robert in this psychological novel as a hideous demonic fiend, thus revealing the psychic-twist of falling apar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a criminal's motives in committing murders, several questions deserve our close attention: in what ways can the protagonist, Robert, in Hogg's confessional writings, convey his inarticulate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re-build an intimate alliance through competition with his brother George despite his familial and social displacement? More specially, how can he empower himself by reconfiguring his life value, so as to remove his sense of inferiority, (though this is a hallucination resulting from a sense of self-incompleteness), through affectionate bonds with his mother and other mother figures? Most significantly, how can we re-comprehend the imaginings of an individual's implied second self through the lens of one's imaginary individuation through his family and society, and through his battle for an ideal self-image which is a polished version formed in opposition to this second self?

**Key words:** James Hogg; *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doubled selves; the evil; mother figure.

---

\* 國立中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詹姆士·哈哥在《一個自辯正當罪人的私人回憶錄和告白》小說中如何運用自傳小說的寫作文類嘲諷充滿宗教與政治的意識型態之社會中的虛偽與偏見。出版於 1886 年，作者透過此心理小說道盡了他對宗教意識型態文化倡行的社會所俱有的邪惡現象之觀感。小說男主角羅伯聽從一位神秘同伴的建議，犯下了很多罪行，但他卻辯白他無罪，且是為上帝作神聖的服務。他謀殺了他認為「無上帝」信仰的人，如殺了他的兄弟、地方市長、甚至他的母親。本人認為，作者正是基於此宗教的偏激教義，想透過罪犯的自我脫罪之回憶錄和告白，來闡述罪犯心理層面的自我分裂。承然，本論文提出一些思考罪犯殺人動機與自我脫罪的緣由。首要，透過作者運用自傳小說的寫作文類，讀者如何從罪犯的回憶錄和告白中察覺他難以說出的自卑感和他想透過與其假想對手的競爭關係來重新建立親緣關係。更特殊的是，讀者如何透過罪犯與他母親與其他類似母親人物的感情連結狀態，來得知他極慾排除他的自卑感和滿足他的自我成就感，以便重新定位他的生命價值。最重要的是，讀者如何透過罪犯個體在其家庭與社會中假想的獨特化行動，來重新認知罪犯心理層面中第二自我的建構，且重新理解罪犯的心理狀態如何糾結於「理想的」自我意象與第二自我意象之中。

**關鍵詞：**詹姆士·哈哥；《一個自辯正當罪人的私人回憶錄和告白》；雙重自我意象；邪惡；母親和類母親人物



## Rationale

[A] man should be daily tempted by the devil, in the semblance of a fellow-creature; and at length be lured to self-destruction, in the hopes that this same fiend and tormentor was to suffer and fall along with him.... In Short, we must either conceive him not only the greatest fool, but the greatest wretch, on whom was ever stamped the form of humanity; or, that he was a religious maniac... till he arrived at that height of madness, that he believed himself the very object whom he had been all along describing.

--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390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psychological novel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in 1824,<sup>1</sup> James Hogg offers his view of the evil of his age (1770-1835). He does this by adopting the editor's point-of-view narrative form to ridicule the pretences and prejudices of an essentially political-religious Scottish society. The novel offers an account of the ill-fated marriage of the elder George Colwan, the Laird of Dalcastle, whose wife leaves him two days after their wedding. While away, she bears her first son, George. After the Laird drags her back, she bears a second son, Robert, probably by a fanatic minister "the Rev. Mr. Wringhim" (*PMCJS* 17). As he grows up, Robert takes the advice of a strange companion and enters into a life of crime that he considers to be a life of divine service. He rids the world of "ungodly" people such as his brother and the local country minister. Robert disappears from home not long after George inherits the title of Laird, having committed several more crimes, such as killing his mother. The fictional editor's rendition of this story is chronological, although he sometimes refers to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other sources. The editor's portrayal is ironically authentic, and his narrative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Robert's confessional story, which comes next.

While the editor's account includes the participation of Gil-Martin, Robert's favorite but fearful companion, Robert's confession refuses to clarify whether this strange companion is the devil incarnate, or a hallucinatory figure. Throughout his confession, Robert recounts his many wanderings, beginning with his disappearance from Dalcastle up to the moment of his death. Ultimately, the editor describes how a letter signed "James Hogg" (actually published in *Blackwood's Magazine* of August 1823) has urged himself to search for its author. This letter reveals Robert's suicide and his grave, telling the tradition surrounding his death and burial, and

---

1 This novel appeared anonymously in 1824. Many early reviewers of the *Justified Sinner* identified Hogg as the author, and they also saw this novel "as presenting 'an incongruous mixture of the strongest powers with the strongest absurdities'." See Douglas Mack's short introduction entitled "Hogg Rediscovered, A New Edition of a Major Writer", collected in the fictional edition of *Edinburgh UP*, (Edinburgh: 2002), page v. The title of this novel is abbreviated as *PMCJS* henceforth.

the recent reopening of the grave by two young men. In the end, the reader knows that the editor and his friends literally create a text by “unearthing” the truth, whereas Robert’s confession problematizes the authenticity involved in the act of writing autobiography.

Born in Scotland, Hogg understood well that Scotland had never been a homogeneous nation-state, particularly in a social-political respect. Hogg’s national ballads reveal his identity as an Ettrick Shepherd with Scottish nationalist appeal among the Jacobites especially through his Jacobite women in *Three Perils of Women* (1823) and his lyric seer in “A Tale of an Old Highlander” (1832). As his diary, *Shepherd’s Calendar*, reveals, and as Karl Miller suggests in his reading of the same, Hogg “was [later] attached to the Covenanting heritage extant in Ettrick Forest” (Miller 224);

[T]o the Whigs of old,<sup>3</sup> known to the enlightened (and to Episcopalians) as the fanatics of old. His sinner is a Whig and a fanatic of old, and a serial killer: he feels for him, nevertheless. His editor has in modern times suffered the antipathy of critics who have construed him as a specimen of the enlightened upper-class Edinburgh which praised and victimized Hogg, and as something of a Tory,<sup>4</sup> despite the fact the enlightened Edinburgh of that decade was predominantly Whig. Meanwhile, for all these complications, the novel could well be summarized as a bold exposure of ultra-Calvinism’s antinomian excesses, of the conviction that God’s chosen few are infallible, and will not be forsaken by their dualising maker, with his sheep and his goats. (Miller 224-25)

Douglas Gifford also mentions Hogg’s religious childhood background. He maintains that “Hogg was steeped in Presbyterian atmosphere, argument and reading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2 Ettrick Shepherd was Hogg’s nickname, meaning “growing up poor and semi-illiterate in a border country incredibly rich with history and oral tradition” (145). According to Lenman, Jacobites was a term referring to those supporters of the exiled branch of the royal House of Stuart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when James VII of Scotland and II of England was ousted from his thrones by his own eldest daughter Mary and her husband the Dutch prince William of Orange” (162). Scottish Jacobitism reached its peak in a 1715 revolutionary uprising, but was seriously defeated at Culloden in April 1746, losing the basis for any future rebellion (162-63). See Daiches, David, ed. *The New Companion to Scottish Culture*, (Edinburgh: Polygon, 1993).

3 *Ibid.* According to Smith and Sellar, Scots law after 1830 had taken up the English model and “the Court of Session had been reorganized” (180-81). At that time, the political motives of Scottish Whigs and Tories had diverged: to the Whigs, to integrate with or to accept “English institutions seem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ttaining wider political liberties” (181), whereas Tories assumed a more conserv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political reception of English institutions.

4 *Ibid.* Scottish Tories in the 1930s are a Labour party arguing for working-class political rights. The early Tories are those Protestant Scottish immigrants to Ulster in the seven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ccording to Edwards, “Orange lodges made their mark in the central belt of Scotland, often winning support in response to the competition and clannishness of the Irish Catholic work force” (159).

through family and personal inclination and later Edinburgh experience developing into a most moderate, tolerant Christian" (Gifford 21). Edwin Muir particularly reveals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as no "healthy critical awareness" of religious doctrines, only "doctrinaire disagreements" between periodicals of the day: "the Whig *Edinburgh Review* and the Tory *Blackwood's Magazine*" (Gifford 22-23). Hogg's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of Scotland shows his concern over Scotland's ideological disintegration with regard to its religious-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 propose that it is this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that motivates Hogg to write the character of Robert in this psychological novel as a *hideous demonic fiend*, thus revealing the psychic-twist of falling apart.

Before I elaborat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 demonic appropriation of religious discourse of the absolute, it is necessary to survey critical literature about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Current scholarship about Hogg's works has focused primarily on his poetry, *Scottish Pastorals* (1801), and his novels, *The Three Perils of Man* (1822) and *The Three Perils of Women* (1823). Whilst most critic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writer's portrait of a patriotic view of the Scottish Highlands, the subject of the *religious impact upon psychological health* receives less consideration,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ose characters in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Several academic articles have been devoted to analyzing the demonic character Gil-Martin as Robert's *alter ego*. For instance, focusing on the emotional tangle between love and hate, Douglas Gifford suggests that love may be a type of "personific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unfulfilled* desires, and satiation following", but hatred might be the other type of emotion "attached to the same expression" (164; emphasis in original). In his essay, "The Antinomian Devil", Louis Simpson proposes as against Gifford that readers may prefer Gil-Martin "to be explained as a hallucination, but [that] Hogg has no such preference" arguing that this novel instead makes efforts "to make the supernatural evident" (188). This fictional inclination to materialize the supernatural seems to call attention to one fact: that as the evil within is real, so is the devil's body attracted by this evil. While Gifford's insightful view allows my stud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emotional twist between love and hate implicated in Robert's confessions, it fails to explore the ways by which the protagonist builds emotional bonds with the characters surrounding him. Simpson's view certainly provides a detailed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supernatural, but how and wh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ils construct their emotional attachment is rarely explored.

Of all the critical articles on this novel, Susan Levin's essay is most pertinent to my project, because she emphasizes how Hogg's writing deals with the theme of doublings. However, Levin's article tends to stress the typical function of self-presentation as an ironic doubling in the methods of autobiographical self-analysis; therefore, how and why emotional connectivity

is engendered by and between those characters who are potentially demon possessed, male and female alike, gains little attention.

Although these articl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 argument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y do not fully engage with how Robert, oscillating between Colwan's honorable title of the Laird of Dalcastle and the religious vanity of the "select" in predestination discourse preached by Mr. Wringhim, attempts to seek his life value through cultural and emotion affiliation. As such,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empower himself in a dissenting society, Robert gauges the value of his life throughout his everyday practices. Robert asserts the value of his life in his competition with his brother George and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is mother and other likely mother figures.

Psychologist Carl Keppler's concept of twinship ("the second self as twin brother") is pertinent and inspiring for my study of Hogg's psychological text. In his perceptive essay, "The Twin Brother", Keppler explores how twinship forms "the strange mutual attraction of twins even in antipathy, their frequent inseparability and incapacity to act save in conjunction with each other, their profound effect upon each other's lives" (15). According to Keppler, the term "Twin Brother" is "not so much one that describes a circumstance as one that expresses an *attitude*", "each constituting one of a pair or dual unit, the inseparable and also inescapable half of a single whole" (15; emphasis added). Keppler argues that the second self in twinship is "always felt to be more formidable than the familiar foreground personality, and to be gifted with powers of an almost supernatural sort, which enable the second self regularly to dominate the first" (200). In other words, the poi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the first self's adventure and the second self's "serving as the hammer to beat the metal of the first into new shape" (Keppler 200). At the end of his essay, Keppler suggests that the second self serves to reach "the goal of the adventure of self-meeting"; rather, the second self arises "out of a sense of incompleteness, even of self-deception and self-deprivation" (201).

Adopting Keppler's point and probing it further, my study proposes that James Hogg sheds light on how the protagonist empowers himself by seeking social competition with his brother George in order to fill his psychic loop. This results from a feeling of inferiority to his second self and imaginings of a more competent second self.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protagonist Robert attempts to *affirm* the illusionary domination of his second self through emotional affiliation with his mother and other likely mother figures. Focusing on key scenes and moments of the "adventure of self-meeting", I argue that Hogg's protagonist establishes a sort of "self-deception" to negotiate with his identity crisis in the family and society.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above premise, several questions deserve our close attention: in what ways can the protagonist, Robert, in Hogg'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convey his inarticulate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re-build an intimate alliance through competition with

his brother George despite his familial and social displacement? More specially, how can he empower himself by reconfiguring his life value, so as to remove his sense of inferiority, (though this is a hallucination from the sense of self-incompleteness), through affectionate bonds with his mother and other mother figures? Most significantly, how can we re-comprehend the imaginings of the second self (an individual's implied second self) through the lens of one's imaginary individuation through his family and society, and through his battle *for* his ideal self-image which is polished off this second self and *against* this second self ?

In the first section, I will explore how the protagonist's second self is treated as the second self from which he attempts to remain isolated and with whom he tries to remain intimate.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ity of that second self will be defined and discussed. In the second section, I will then investigate how Robert's everyday practices, such as speech and short tours (marked by various forms of self individuation), reveal his ambition to eliminate this second self from existing among his brother George, his mother Lady Dalcastle, and other mother figures such as Arabella and Bell Calvert. In a third part, I will also discuss Robert's passionate fight for and against his own self-image. Three parts of the discussions about his psychological upbringing and the removal of this second self will corroborate my proposal: that for Robert to live a kind of self-deception is to live a kind of self-destruction.

## **I. "My vengeance has been wreaked on its adversaries": Other-ness in Twinship**

At his first meeting with Gil-Martin, Robert writes happily: "I was quite captivated" (*PMCJS* 178). This statement shows his fascination with his new friend, and also foreshadows his will to become *subordinate* to this new friend, physically as well as spiritually. Readers see him literally "led away captive" (*PMCJS* 357) in his private memoirs. Although most critics regard Robert's the second self of double as Gil-Martin due to their physical similarities, however, in my opinion, the real activity of doubling initially takes place in Robert's mind, with the subsequent power of homogeneous attraction occurring outside thereafter. These two homogeneous ill-minded subjects are actually not so much *two sides* of the double, as the same type of men with vengeful psychological states. Rather, I regard both sides of the double as produced by the same protagonist: one side (the first self, in Keppler's terms) undertakes his self-evaluation as a judging subject, always competing with the people surrounding him; the second self, in Keppler's terms, is treated by the first self as an inferior, always incapable and forever impotent in hereditary rank and various social perspectives.

Robert strives for superiority through his passionate commitment to "the might of heaven" (*PMCJS* 145). In his confessional memoirs, he makes an effort to dominate the external world through Calvinist catch-phrases such as "absolute predestination" (*PMCJS* 185) and "the

covenant of promise” (*PMCJS* 153), by emphasizing the select people of God’s salvation through numerous Biblical allusions. Ironically, although he is extremely obsessed with Calvinist dogma, the statements in his memoirs constantly reveal his outward concerns falling back on himself: he begins, “My life has been a life of trouble and turmoil”; “I was born an outcast in the world, in which I was destined to act so conspicuous a part” (*PMCJS* 145-46). The self-image he establishes allows no sense of inferiority. Despite the fact that his illegitimate birth is scorned by the Dalcastle family, his sense of superiority can be found in his mission to fulfill God’s plan by “cut[ting] off the enemies of the Lor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PMCJS* 184-85). Gil-Martin’s enticement with Presbyterian doctrines, as celebrated by his real father Reverend Mr. Wringhim, caters precisely for Robert’s longing to eliminate self-hatred over his illegitimate birth.

Extreme seventeenth-century Presbyterians considered that salvation was a gift sent by God *only* to select citizens—rather than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pursued by individual efforts. This religiously justified mission compels him to eliminate his inferior second self, which he engenders in the initial comparison of his birth with his brother George’s, leading him to murder a moderate clergyman named Reverend Blanchard, and to then continue to commit fratricide. His misfortune is his deep belief in God’s pre-arrangement—a belief that perceives himself as somehow spiritually superior to other people and therefore above judgment for all his sins.

Robert’s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jealousy forge the subsequent adventure of his first self (a self-justified judging subject). According to Keppler, “the shadow, or the mirror image or any of the man-made copies, can *become* a second self” (15; emphasis in original). He considers that the judging subject (the first self) and its unfavorable shadow (the second self) are *both possessed* personalities of one person. He states in terms of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in “any of the primitive superstitions” that:

[T]he conversion of such a physical extension of the self into an independent being that still retains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self it shares with its counterpart. ... these are in the main simply *alternating or possessed personalities*, sometimes one state of mind which moves between two different shapes, sometimes two states of mind which displace each other within the same shape, but never more than a single self. (Keppler 15; emphasis added)

The above claim indicates that once the unfavorable shadowy image (or part) of one’s self has been repelled, this rejected image will not disappear, but will instead alternate within the repelling subject, either in different guises (sometimes revealed via a supernatural body), or in the same virtual body, so as to achieve satiation relative to whatever self-image the judging subject prefers and seeks to consolidate as one major value of his lif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rejected shadowy (inferior) image of self emerges as the repellent

second self which on the one hand fulfills the self's search for its life value, but on the other hand satirically traps the self in many misfortunes after the adventure of self-meeting. Just as self-deception engenders self-deprivation, one's self-illusion entails self-negation and self-injury. The judging subject's mental activity of doubling does not bring about its own sense of self-achievement at all, out of self-deceptive vanity and out of the temporary; instead, misfortune comes with bitter feelings of exclusion. Robert states in his diary:

I know that I have always been looked on by the learned part of the community as an intruder in the paths of literature, and every opprobrium has been thrown on me from that quarter. The truth is, that I am so. The walks of learning are occupied by a powerful aristocracy, who deem that province their own peculiar right; else, what would avail all their dear-bought collegiate honours and degrees? No wonder that they should view an intruder, from the humble and despised ranks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jealous and indignant eye, and impede his progress by every means in their power. (*PMCJS* 122)

Robert's words show his sense of inferiority about his social rank, as well as his quickly-transformed narcissistic passions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his overriding arrogance for his religious mission. Robert's impotent second self is the shadowy part he wants to overlook, and that he even wants to eliminate by re-justifying his new life value using an exclusive Calvinist discourse of salvation and mission.

Hogg is not the first to consider the theme of doubled selves in his psychological novels. The doubled self in literary tradition is first remarkably adopted, in fact, 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in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The phrase "Jekyll and Hyde" has long been a literary expression of the split self, which suggests a sense of a man's double being—one of conscience, the second self of the devil within. Jekyll's confession, like Robert's in Hogg's work, admits the existence of a multiple personality:

[M]an is not truly one, but truly two. I say two, because the state of my own knowledge does not pass beyond that point. Others will follow, others will outstrip me on the same lines; and I hazard the guess that man will be ultimately known for a mere polity of multifarious, incongruous and independent denizens.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50)

Stevenson is critically pointing out the illusion of a unitary self. Nevertheless, what deserves our attention is that unlike Jekyll, Robert, in Hogg's portrait, shows the immoral unconsciousness of religious fanaticism.

After committing fratricide, Robert is constantly accompanied by a figure who appears to be

his murdered brother. The fictional editor states:

Their looks encountered, and there was an unearthly amazement that gleamed from each, which, meeting together, caught real fire, and returned the flame to their heated imaginations, till the two associates became like two statues, with their hands spread, their eyes fixed, and their chops fallen down upon their bosoms. An old woman who kept the lodging-house...chanced to enter at this crisis with some cordial; and, seeing the state of her lodgers, she caught the *infection*, and fell into the same *rigid and statue-like appearance*. (PMCJS 126; emphasis added)

It is not merely Robert's immoral un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devil within that Hogg wants to expose, but also the immoral paralysis of infectious religious enthusiasts that the author decries. Whilst Robert's intentional unconsciousness of his sin results from his excessive passion for eliminating his impotent self, the stubbornness of his pious frenzy derives from his unreflective inhumanity. As the editor announces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sinner's memoir: "We have heard much of the rage of fanaticism in former days, but nothing [compared] to this" (PMCJS 142), readers can easily discern a twiste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discontent that sheathes itself in the trope of a religious antagonism to civil society.

In this light, it is obvious for readers to recognize that when humans attempt to deploy an ethical system as an alternative to regulating civil society, particularly religious discourse, this ethical system then affirms a *new authority over* their morbid illusion of a superior self-image. Robert's monstrous impulse to reject the image of his own shadowy self (a second self departed and also unwan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self's judg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its own social rank and achievement) just reveals a fact: that this second self is both a judging subject's sense of inferiority towards its deficiencies and demerits in the social values of competition, and also satirically, that those features which this judging subject admires but wants to overlook. More importantly, my study in the next section will demonstrate how Hogg's "doubled" protagonist searches for his *preferred* identity via an immoral individuation, by removing the character of those social values that he envies and discarding the image of an inferior self that is incapable of obtaining civically-admired social values.

## II. "Effectual Calling at me": Fight for/against the Self Image

The most intriguing part of this novel is Robert's confessional diary, full of suggestions regarding his internal conversation and recognition. Robert's first-person point of view ironically reveals to the readers his psychological estrangement and his consequent social entanglement. He proposes the question of "ineffectual calling" in a diary entry to his mother:



Ineffectual Calling is, *the outward call of the gospel* without any effect on the hearts of unregenerated and impenitent sinners. Have not all these the same calls, warnings, doctrines, and reproofs, that we have? And is not this Ineffectual Calling? Has not Ardinferry the same? Has not Patrick M'Lure the same? *Has not the Laird of Dalcastle and his reprobate heir* the same? And will any tell me, that *this is not Ineffectual calling?*" (PMCJS 148; emphasis in original)

Obviously, readers know from the above confession that Robert's adoption of the predestination doctrine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concerns about his own position in the Dalcastle family and his feelings about being heir to the family honour.

In other words, the religious righteousness justified by faith covers up his discontentment about holding a secondary family position next to his brother George, the heir to the Dalcastle family, and excuses him to murder one preacher of morality, clergyman Blanchard. It is on this religious ground that Robert persuades himself to murder his own kin, George, along with a symbolic figure, Blanchard, who represents civil morality and order. According to John Bligh, Hogg does not intend to say that Antinomianism "makes a man reckless", regardless of the social moral sense of punishment, but that an Antinomian "may lack the courage of his convictions", and also "continue to fear the sanctions of civil law" (156). In this regard, Robert's still retains fear of the backlash power of the victim in his successive murders.

If the external devil can be taken not so much as a heterogeneous subject as a homogeneous subject who can assist the intimate perceiver to reach his goal, readers may discover that Robert's internal devil actually attracts the external devil, Gil-Martin. Namely, one person's evil motive often attracts another's evil motive. In Robert's case, he attempts to dominate the real world in the name of God's elect. Robert's intention to manipulate reality entails Gil-Martin's purpose to manipulate him in turn. Readers may not wonder at Robert's *familiarization of the strange appearance* of Gil-Martin. For instance, when Robert first sees the stranger in the guise of George, he says:

He cast himself in my way, so that I could not well avoid him; and, more than that, I felt a sort of invisible power that drew me towards him, something like the force of enchantment, which I could not resist. As we approached each other, our eyes met and *I can never describe the strange sensations that thrilled through my whole frame at that impressive moment.* (PMCJS 176-77; emphasis added)

It needs to be mentioned that the editor also perceived such *strange sensations*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tale: "They were looks that cannot be described; but they were felt piercing to the bosom's deepest core" (PMCJS 53).

In this regard, Robert's fear of sin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re-discovery or re-recognition of his motive to kill George, exempt from religious excuse. Readers are informed of George's feelings at his sight of Robert in the editor's introduction: Robert appears "as regularly as the shadow is cast from the substance, or the ray of light from the opposing denser medium" (*PMCJS* 54). After he commits fratricide, Robert likewise says of Gil-martin in the guise of George: "He was constant to me as my shadow" (*PMCJS* 200). Robert's ferocious murder of George and his fear of facing the sin afterwards can be regarded as acts to remove the threat of his ideal self-image (the first self justified by him in terms of religious faith), and as acts to deny this removal of his shadowy self (the second self rejected by him in terms of social values).

In most psychoanalytic cases, the notion of an "internal otherness"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effect of unconscious operations. A renowned psychoanalysis critic Christopher Bollas, in his book *The Shadow of the Object*, indicates that a person's self is "the history of many internal relations", and "once any one part is objectified (in thought or in feeling) it thereupon comes into existence" (9). After researching various types of patients, Bollas particularly affirms that "if we look closely at our patients we would probably all agree that each has his or her own sense of existence but that, by virtue of the persistent pathology of their defences, they live by disowning the self" (63). Bollas's claim points out that most humans live within the realm of their self-illusion, and that this realm offers relevant meaning for the preferred concept of self. Outside this realm, however, all that is incongruous with this concept of the self will be rejected. That is to say, whatever is repressed from human consciousness will be perceived as other, foreign, abject, or even taboo. Confessional language therefore may assume the function, serving to stimulate the speaker to transfer his internal otherness.

From this perspective, Robert's second self is just negative feelings bolstering his own inferior concept of himself. It is not hard for readers to see that after murdering George, Robert constantly attempts to enter George's social circle by parroting their own words back at them. This strategy of parroting is the same strategy that Gil-Martin uses to throw answers back to Robert in their theological discussion:

Everything that I suggested he acquiesced, and, as I thought that day, often carried them to extremes, so that I had a secret dread he was advancing blasphemies. He had such a way with him, and paid such a deference to all my opinions, that I was quite captiva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I stood in a sort of awe of him, which I could not account for, and several times was seized with an involuntary inclination to escape from his presence by making a sudden retreat. (*PMCJS* 177-78)

From the above confessional passag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cts or words that Gil-Martin uses to

seduce Robert are Robert's own unconscious sentiments. In other words, the reason why Robert is so much captivated by the possessive demon can be attributed to a psychological truth: he seeks an empowering subject who can provide theological excuses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his sin.

Additionally, readers may once again confirm this through Gil-Martin's nightly hangings. Robert responds:

I was seized with a strange distemper....I generally conceived myself to be two people. When I lay in bed, I deemed there were two of us in it; when I sat up I always beheld another person....It mattered not how many or how few were present: this *my second self was sure to be present in his place*, and this occasioned a confusion in all my words and ideas that utterly astounded my friends....over the singular delusion that I was two persons my reasoning faculties had no power. The most perverse part of it was that I *rarely conceived myself to be any of the two persons*. I thought for the most part that my companion [Gil-Martin] was one of them, and my brother [George] the other; and I found that, to be obliged to speak and answer in the character of another man, was a most awkward business at the long run. (PMCS 233; emphasis added)

These words explain precisely why Robert gets lost in a blind intimacy with his brother, and why he also feels delighted to destroy this intimacy with monstrous assistance. Readers finally discover that Robert can neither reach the standard of the heterogeneously honored but envied George, nor can he vanquish the homogeneously demonic but insolent Gil-Martin. In other words, Robert is in nature neither of the two selves which he engenders in an illusion of himself.

It is notable that Robert falls victim to his self-disowning. As Gil-Martin skillfully warns via demonic promises: "No human hand shall ever henceforth be able to injure your life" (PMCS 251). Robert learns at the end that the demonic crafty speech always carries with it a double sense; the listener always takes up the sense which accords to his moods and intentions. Namely, when Robert finds himself entangled in the fight for his ideal self-image, endowed by the religious absolute, he believes that no human hand except God's can injure his life. However, after successive torments arising from his fear of sin, the adventure of his self-meeting reveals to him that no human hand except his own can substantially and spiritually destroy his life. In the next section, my study will explore how Robert's concept of self constantly compels him to ascertain his ideal identity by *individualizing* himself in various ways through his famili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 III. “I began once more to value myself on my courage, and springing up, I made at my adversary”: Individuation through the Collective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Robert phenomenally strives for but psychologically resists his self-image, readers must discuss the ways by which he attempts to stress his own uniqueness and by which he tries to show his social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Hogg, born in a working-class family, knows well of a low-class Scottish voice. In the tradition of Scottish literature, writers especially prefer to deploy a low-class Scottish voice to decry socially established ideas, particularly with the aim to questioning those publicly accepted ideas of rationality. In his essay entitled “Fana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in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Ian Duncan particularly mentions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na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David Hume had identified the imagination as the medium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of ourselves and of other people, and sympathy as the mental operation that converts that knowledge into shared experience by the spontaneous transmission of “inclinations and sentiments” from person to person. (57)

Duncan’s emphasis on this clarification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sympathy stresses the cautionary fact that one’s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is mostly subjective and exclusive, and often limit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Robert shall/must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behavioural digression, Whig political efforts to spread religious fanaticism cannot avoid ta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civic mental health. David Groves highlights Hogg’s implication that “rationalism is a mask” when he speaks of Francis Jeffrey as an “Anglicised Scot”, as a man “who rejects his own nationality and community traditions under a pretense of objective reason” (24-25). It is notable that Hogg warns against the collective abuse that can be engendered by hegemonic authority of any type in society.

In Robert’s case, any effort to deny his repellent second self forestalls an effective religious challenge to received ideas of civility and order. Robert treats anyone who disagrees with him as “the wicked and profane” (*PMCJS* 255). For instance, when George refutes the Calvinist discourse of predestination, Robert argues: “But why should I wonder at such abandoned notions and principles? It was fore-ordained that you should cherish them,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the ruin of your soul and body, before the world was framed” (*PMCJS* 66-67). Robert’s reproach comes from his inhuman treatment of people, as well as from a self-interest or prejudice that

---

5 David Groves notes that Hogg’s view about the nature of rationalism is just “prejudice, self-interest”. If the rationalism preached is particularly related to national policy, then it is nothing more than a “tyrannical temperament that seeks to impose uniform standards on everyone” (25). See Hogg, “Epitaphs on Living Characters”, *Scots Magazine*, June 1810, p. 447.

favors his spiritual superiority over those he wants to defy. From the editor's Tory perspective, the "four respectable witnesses" (*PMCJS* 382) at Robert's grave breezily contrast with the "free principles cherished by the [Royalist] court party and with those of "their severe and carping contemporaries" (*PMCJS* 2). His allegory underlines a projection of the darkness within every Whig of the time, but also the evil make-up within a contemporary and competitive society.

In addition, we should consider why Robert's self-righteous reactions towards his mother Lady Dalcastle, and other mother figures, like Mrs. Arsbella Logan and Mrs Bell Calvert, are a projection of his rejection of his second self. First of all, Lady Dalcastle, Rabina Colwan, is the first woman in Robert's life to take pleasure in "complicated arguments about religion" (*PMCJS* 42). She instills the religious thought in Robert "that a justified person can do no wrong" (*PMCJS* 19). Apparently, this motherly admiration for the "special quality" of her son does not in fact win her Robert's appreciation and affection. Rather, Robert feels more and more stifled by this hypocritical familial affection. Namely, it is not hard for readers to discern that the young Robert can never find such *natural* maternal love as his elder brother George receives—as a son deserves. Lady Dalcastle's disputations with his father, Rev. Mr. Wringhim, in their "fiery burning zeal" (*PMCJS* 24) of adulterous passion and religious devotion, are mockeries of sexual (in) fidelity. As a son of parents without a legal marriage, Robert naturally feels debased in his birth.

Editor's personal text report initially affects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Robert's schizophrenic behaviors, but ultimately becomes ironical itself. Apart from his Presbyterian beliefs, Robert is far different from his brother George. The two men inherit the divisions of their parents in different ways. In the editor's view, George is generally socially open and pleasant: if he becomes angered by Robert, then his anger does not remain very long: "since he has the changeableness of a man of impulse and sensation" (*PMCJS* 18). According to the editor's portrait of George, this future laird is as "hero" and "king" of the tennis match, stressing his natural ability to be a laird, but also limiting the scope of his realm (*PMCJS* 30-31). In contrast, as a younger son of his mother, Robert scorns all the sporting pastimes that win social favour and admiration for George; he makes mockery of the "carnal nature" and occupies himself with the spiritual satiation of the elect (*PMCJS* 221). In Robert's mind, righteousness and martyrdom are the fundamental grounds by which he can justify himself to kill his "wicked" brother. His heroism can redress any insignificance found in his mother's *unnatural* familial affection.

Besides this jealousy over maternal love, Robert dismisses his mother's beauty as a sin. Mr. Wringhim tells Robert that the "physical beauty of women is a temptation towards sin" (*PMCJS* 19). In Robert's religious rationality, despite the fact that both his parents are adulterers, it is easier for him to excuse his father by believing that his mother is wicked and that she should be removed from among the elect. It is evident that Robert not only attempts to defy the

paternal authority of the Dalcastle family that despises him, but that he also aims to replace the hypocritical maternal coaching with the hardened zealot which “no reasoning can aught avail” (*PMCJS* 7). In this case, Robert seems to establish a new authority that might render him not only spiritual superior, but that might result in exclusive paternal affirmation without hypocritical maternal love.

The psychologist Erich Neumann, in his book *Depth Psychology and a New Ethic*, offers some insight regarding the murderer’s state of mind. Neumann claims:

the murder of parents or of a brother may remain unavenged because the murderer has, so to speak, made an attack on his own flesh. He and his closest relations are practically identical. The interests of the group are in no way affected—any more than they are in the case of a suicide.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group are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n the same way, the *damages due for the murder of a distant relative will be less than those required for the murder of a stranger*—though the principle of liability is itself recognized. *By virtue of his group identity, the murdered relative is part-property of the murderer.* (60-61; emphasis added)

The above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the murder of blood kin stirs up a lesser sense of guilt than the murder of a stranger. It is obvious to readers that Wringhim’s collective influences and Robert’s individual temperament are here intertwined in a complex play of spiritual affinity and affectionate, authoritative opposition.

In other words, the murder of a relative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murder of oneself. Robert’s murder of his mother does not ultimately create a new and more secure paternal authority, but instead deepens the existence of the unwanted self already caused by his mother in the world. Neumann illustrates this suicidal condition, indicating that through this violent kind of “reduction of the personality, we have cited the case of inundation by the shadow, in which the rejected and repressed contents once more simply have their way” (99). Neumann particularly dismisses this removal of one’s repelled and shadowy contents as one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He explains: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se contents into a greater totality, which is not the given totality of consciousness as it used to be, is the work of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In this process, contents which were previously split-off and autonomous are joined up to form parts of a comprehensive psychic structure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ego and the conscious mind, and so receive a different meaning and value in the hierarchy. (Neumann 99).

In Neumann’s terms of individuation, the individual transforms a negative unconscious content

into a content of the conscious mind. Robert attributes his sense of inferiority over his birth to Lady Dalcastle's adultery, and further *transforms* this *unconscious* internal hatred towards his mother *into* the religious martyrdom aimed at eliminating, in the name of God, the risk of possible seduction by beauty. Namely, Robert compensates himself by redressing his immediate surroundings, getting rid of those negative and suppressed aspect that do harm to his honorable identity.

What is more, Robert's interac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Mrs. Logan and Mrs. Calvert can also reveal to readers certain clues as to the misogynist's mental condition. Mrs. Logan is the laird's house-keeper, having lost her family estates following their confiscation during the Covenanting wars. She devotes herself to George's care and discovers George's murderer after George dies. Comparatively speaking, Mrs. Logan assumes more the duty of a wife and mother than Lady Dalcastle. Although she serves as a more caring companion to the laird than Lady Dalcastle, her sorrow over George's death and her passion towards the Dalcastle family drives her to recognize Robert as the murderer without any definite proof. When she meets Mrs. Calvert, a prostitute imprisoned for theft and swindling, Mrs. Logan feels too proud to talk with her about the murderer. It is clear to readers that Mrs. Logan judges this fellow woman by first appearances, and thus almost loses the key witness to George's murder because of her prejudicial assessment.

It is notable to readers that Mrs. Logan's passion for the case cannot be regarded as upright and honest, namely because her comments on the murder are too subjective. Her unproven judgment derives from her motherly affection towards the obedient George and her dislike of "splitting hairs in debate" Robert (*PMCJS* 110). Mrs. Logan's partial treatment of the two boys causes Robert to repress a "[fear] of women" (*PMCJS* 123). Robert's shadowy memory of himself as the disapproved child makes him particularly receptive to Gil-Martin's flattery in adulthood. Gil-Martin gradually manipulates Robert's moral thought by stressing how he wears the exotic clothes of a "great prince" (*PMCJS* 197).

When the two women seized Robert, they have him secured first: He was in the two women's mercy, but they used it with moderation. They mocked, they tormented, and they threatened him; but, finally, after putting him in great terror, they boun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and his

feet fast with long strips of garters they chanced to have in their baskets, to prevent him from pursuing them till they were out of his reach. As they left him, which they did in the middle of the path, Mrs. Calvert said: "We could easily put an end to thy sinful life, but our hands shall be free of thy blood." (*PMCJS* 136)

Quite differently, Mrs. Calvert's authority is built more on the grounds of humanity. Readers know that Mrs. Calvert is a sympathetic woman from the moment she witnesses Robert

stab George in his back, when she tells Robert that she regrets committing “crimes of utter desperation” (*PMCJS* 92). From this light, it is clear that she understands very well how Robert’s misery actually and regretfully results from his having a vulnerable (sinful) mind like hers. Mrs. Calvert tells Robert that her “crimes have been great but her sufferings greater” (*PMCJS* 80). Her lamentation foreshadows Robert’s misfortune in self-destruction, but also comforts Robert with the motherly understanding that all his violent violation of other lives is of no avail when it comes to redressing the harm in his mind.

One’s repellent self-image is often projected onto those who supposedly give birth to it, though one’s recognition of this is ambiguously subjective. However, this removal has more unhealthy psychological effects upon the remover; that is, any act to stress the individual’s uniqueness comes from his ambition to fill the mental breach. Beyond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the individual obtains nothing from the collective but an unredeemable sense of guilt.

## Conclusion

Speaking on a larger scale, Robert’s shadow represents the collective shadow of Scotland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Hogg’s view, and as a Scottish means to purify the sinner, Robert in the end dreams about a woman dressed in white, who offers him an unsaid revelation:

She regarded me with a severity of look and gesture that appalled me so much, I could not address her; but she waited not for that, but coming close to my side, said, without stopping, “Preposterous wretch! How dare you lift your eyes to heaven with such purposes in your heart? Escape homeward, and save your soul, or farewell for ever!” (*PMCJS* 239-40)

The white woman seems to call for Robert’s conversion to his own conscience. Hogg implies here that Scotland has fallen itself into the confusion of religious moral engagement. Robert’s phantom white woman cannot merely be considered a transitory lightening of his conscience, but must be regarded as Hogg’s profound call for a re-examination of moral measurements in various types of Scottish so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whole.

In sum, both the editor and Robert come up with a narrative, but neither of them is objective. Hogg’s allegory warns that to prevent morbid preconceptions, we must cautiously refrain ourselves from being maniacs of various types; of relig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patriotic rationalism, etc. Since self-definition is impossible, what can Robert’s autobiographical confession achieve? Hogg seems to state that readers can intuitively know a sinner’s sin through his biased views towards reality and towards himself. The editor writes at last: “I dare not



venture a judgment, for I do not understand it" (*PMCJS* 389). Readers learn at the end that when one allows oneself to be unconsciously carried away by a group's collective values, and when one also endures an internal conflict in his acceptance of evil that the group demands, then one's psychic realities will subsequently bring up his unconscious individuation.

## References

- Bligh, John. "The Doctrinal Premises of Hogg's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Studies in Scottish Literature* 19 (1984): 148-164.
- Bollas, Christopher. *The Shadow of the Object: Psychoanalysis of the Unthought Know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7.
- Daiched, David, ed. *The New Companion to Scottish Culture*. Edinburgh: Polygon, 1993.
- Duncan, Ian. "Fana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in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James Hogg and the Literary Marketplace: Scottish Romanticism and the Working-Class Author*. Eds. Sharon Alker and Nelson Holly Faith.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57-69.
- Gifford, Douglas. *James Hogg*. Edinburgh: Macdonald Printers Limited, 1976.
- Groves, David. *James Hogg: The Growth of a Writer*.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88.
- Hogg, James. *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Cambridge: Chadwyck-Healey, 1999 [1824].
- Keppler, C. F. *The Literature of the Second Self*. Tucson, Arizona: Arizona UP, 1972.
- Miller, Karl. *Electric Shepherd: A Likeness of James Hogg*.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5 [2003].
- Neumann, Erich. *Depth Psychology and a New Ethic*. Trans. Eugene Rolfe. Boston and Shaftesbury: Shambhala, 1990.
- Simpson, Louis. *James Hogg: A Critical Study*.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ver & Boyd, 1962.
- Stevenson, Robert Louis.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Anthony's Home Page: <http://www.atkielski.com>, 1998 [1886].

# 咖啡拉花之感性因子、感性語彙與人口變項關係探討

## Discussion the Perceptual Factors of Latte Ar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Vocabularies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林俗吟\*  
Su-Yin Lin

連德仁\*\*  
Te-Jen Lien

(收件日期 101 年 10 月 18 日；接受日期 102 年 5 月 9 日)

### 摘要

感性消費時代來臨，消費者逐漸重視商品帶來的感性層面及情感體驗。隨著時代的發展改變，咖啡工作者結合創意巧思，讓色、香（相）、味俱全的咖啡轉眼間成爲一件藝術作品，爲咖啡帶來更多的附加價值。本文以視覺觀看方式，首先針對感性語彙進行評估。研究結果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得到 4 個感性因子，分別爲 1. 美好因子、2. 情感因子、3. 魅力因子、4. 自在（隨性）因子。其次本研究認爲，人類會因爲生活背景的不同而對感性語彙解讀不一，故亦針對人口統計變項與感性語彙做差異性分析，首先，透過性別檢定後得知，不同性別對於感性語彙「多層次的」、「幸福的」、「獨特的」及「優雅的」感受方面有明顯差異；其次，透過就學背景檢定，亦得到感性語彙「豐富的」、「獨特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經由背景不同，產生顯著差異；再次，教育程度之差異，亦產生感性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質感的」、「豐富的」顯著差異；最後，職業族群的不同，亦造就了感性語彙「創意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顯著的差異性。整體而言，冀望透過本研究探討，賦予咖啡商品之情感價值，以提升商品的競爭力，繼而連結生活美學文化，使其受到重視而持續發展。

關鍵詞：咖啡拉花、感性因子、感性工學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研究生（通訊作者）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教授

### **Abstract**

Perceptual time is coming, consumers are more and more respecting for the goods can be bring what they can get emotion experienc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changed, coffee workers combined the intention and clever, and that made the coffee which with looking good, smelling good and tasting good transfer to an art suddenly, and bring more additional value for coffee. This research was discussed by watching with the vision, at first, to analyze the emotional vocabularie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was got four perceptual factors which was wonderful, emotional, charm and freedom respectively by analyzing factors. Secondly, opinions of this research, people interpret difference in emotional vocabularies because of different from the background of life. So this research also makes difference analysis to statistic demography variables and perceptual vocabulary. At first, through testing of the gender to get that, to men and women, the feeling multi-level, happy, unique and graceful are obvious different. Secondly, through testing of the background of going to school also got that interpreted the perceptual vocabularies which abundant, unique, graceful, design, leisurely was apparently different by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irdly, people interpreted the perceptual vocabularies which art, multi-level, quality, abundant was apparently different by difference from education degrees. Finally, the difference from professional fields also made that people interpreted the perceptual vocabularies which intention, graceful, design, leisurely was apparently different. This research hopes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the commodities, and link aesthetics culture of life, cause it to be respected and keep developing.

**Key words:** Latte Art, Perceptual Factor, Kansei Engineering.

## 壹、前言

近年來，感性消費時代來臨，人們開始注意情感的重要性，消費產生了一種情感上的滿足，一種心理上的認同及精神上的享受。臺灣經濟中小企業因應感性消費時代興起，從情感設計中提出感質設計，於 2010 年開始實施中小企業推動計畫，透過品味、品質結合品牌，觸動消費者內心最深層的情感，為消費者創造「感動價值」。

咖啡除是飲品外，它一直帶給消費者感性的價值體驗，透過網路平臺，關鍵字搜尋會發現，對許多人而言，喝咖啡是一種感覺，消費者透過該平臺，將品嚐物質以外的愉悅資訊分享，不管是理性分析抑或是感性的情緒抒發，終將令它變成一種時尚的流行。咖啡是實質的形體，但其隱含的無形精神，及感性意象卻鏗鏘有力。人類是感性及感官上的動物，就心理層面而言，視覺感官的重要性質就是美感的捕捉（楊裕富，1999）。咖啡館所販售之咖啡拉花即有如此魅力，咖啡工作者運用技巧呈現拉花，吸引消費者目光，並拉近與消費者間的關係，以滿足人們購買商品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及獲得精神上的享受。有鑑於此，本文之研究動機為，探討咖啡視覺藝術帶給消費者的情感體驗，並將咖啡的感性，運用理性分析，讓感性商品訴諸於數據說明。本文之研究目的為：1. 探討咖啡視覺藝術之情感語彙；2. 解析咖啡視覺藝術感性因子；3. 人口統計變項與感性語彙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所探討的咖啡視覺藝術，在銷售市場上普遍稱之為「拉花」，故本文將以拉花敘述之。本研究以一般咖啡工作者較常拉繪的 4 種咖啡拉花（圖 1）為問卷樣本，透過問卷方式來探討，消費者對於咖啡拉花之情感語彙，及統計各人口變項針對感性語彙作差異性分析。由於研究時間、現有資源受限，故產生出研究過程中的相關限制，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咖啡拉花作為統一初步探究內容，而有關該產品呈現的表現技法、口感、風味及杯飾外觀不納入研究；由於咖啡拉花感性工學相關研究文獻目前不多，故本文透過咖啡書籍經由文獻分析法和問卷統計結果整理歸納。



圖1 咖啡的視覺藝術

資料來源：<http://s.dianping.com/topic/714392,2012>; <http://www.weirdomatic.com/coffee-art.html>, 2012; <http://wishfulinspiration.com/tag/enjoy/>, 2012; <http://album.udn.com/crying/photo/3345295?o=new#photoanc>, 2012；本研究整理

##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探討咖啡拉花對消費者情感意象之影響。為釐清咖啡與情感意象的意義，因此文獻資料蒐集採循序漸進方式執行，首先簡述咖啡文化的發展，再來介紹咖啡視覺藝術之起源，最後運用感性工學來探討咖啡拉花之情感意象，故在最後的部分亦探討感性工學的發展與定義。本研究透過相關書籍及研究資料的探討，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如下。

## 一、咖啡視覺藝術的發現

根據史料記載，十七世紀末，一位原本是替土耳其軍隊作翻譯的波蘭人，維也納人口中的咖啡文化使者— Georg Franz Kolschizky 發明了咖啡添加牛奶的飲法，讓拿鐵咖啡 (Caffe Latte) 就此問世（王士文，2004）。拿鐵咖啡的出現，造就了咖啡拉花的誕生。咖啡拉花是以牛奶 (Latte) 拉繪而成的咖啡藝術 (Art)，據說，咖啡拉花是將牛奶倒入濃縮咖啡時，偶然間調製而成的。咖啡拉花始於 1985 年左右。在義大利米蘭的咖啡吧裡首次拉繪出心型圖案，之後遠渡美國為全世界人們所熟知。日本則於 1996 年，在東京·初臺的「Dolce Vita」中初次提供，咖啡拉花在此時於日本國內市場首次登場（王俞惠，2008）。現今世界中，拉繪咖啡拉花的咖啡吧臺師傅日漸增加，世界性大型的拉花競賽亦逐漸嶄露頭角，受到重視。

## 二、咖啡拉花的發展

在市面上，常態性的「咖啡拉花」技法，筆者整合《Latte Art 咖啡拉花—Espresso 與牛奶的完美邂逅》與《咖啡畫布上的藝術 \_ Latte Art 拉花創作教科書》書中的分類方式，將咖啡拉花技法分為 4 個類別，分別為直接倒入成形法、線條式圖案法、篩網圖形法及刺針式具象圖案法，以下將針對各技法分別介紹說明。

技法一，直接倒入成形法：直接倒入成形法（圖 2）所指的是，將牛奶利用蒸氣壓力使之起泡，使用起泡後的牛奶，在牛奶與奶泡尚未產生分離的狀態下，迅速將它直接倒入義式濃縮咖啡之中，並於牛奶、奶泡與義式濃縮咖啡融合至一定的飽和狀態後，根據水紋波動原理，運用手部的晃動技巧，使奶泡浮置於義式濃縮咖啡的表面上，操作者可運用各種不同的晃動控制技巧，讓各式各樣的圖案形成。此技法為全世界咖啡拉花藝術的主流，其中又以心型或 Rosetta 拉花（葉子）的技巧為主。



圖2 直接倒入成形法操作方式及作品完成圖

圖片來源：林東源，2005；<http://s.dianping.com/topic/714392>，2012；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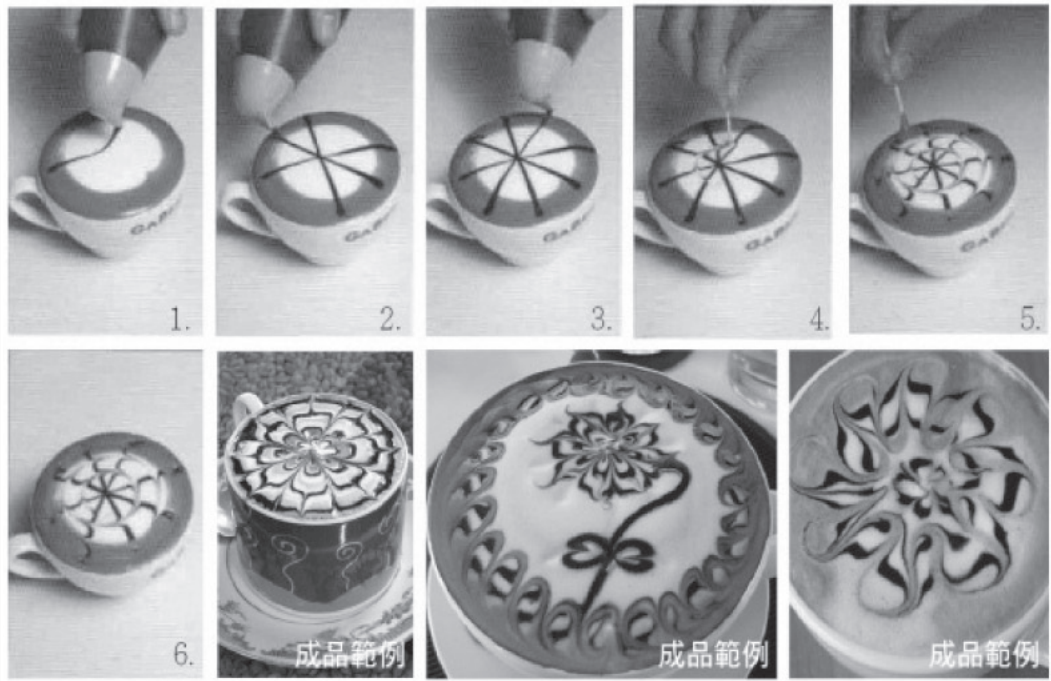


圖3 線條式圖案法操作方式及作品完成圖

圖片來源：林東源，2005； <http://www.weirdomatic.com/coffee-art.html>，2012；本研究整理



圖4 篩網圖形法操作方式及作品完成圖

圖片來源：林東源，2005； [http://www.imgsou.com/photo/CAPPUCCINO\\_9.html](http://www.imgsou.com/photo/CAPPUCCINO_9.html)，2012； <http://wishfulinspiration.com/tag/enjoy/>，2012；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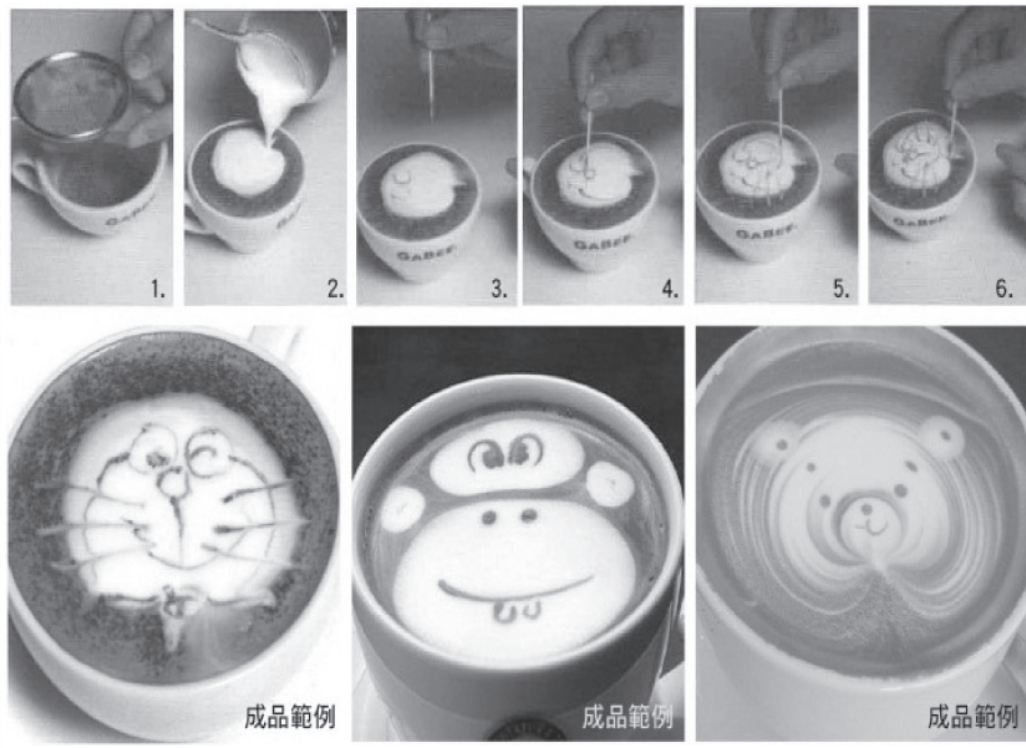


圖5刺針式具象圖案操作方式及作品完成圖

圖片來源：林東源，2005；<http://album.udn.com/crying/photo/3345295?o=new#photoanc>，2012；王俞惠，2008；本研究整理

技法二，線條式圖案法（圖 3）：該技法承襲了直接倒入成形法之操作方式，去除手部晃動的步驟，在已經完成牛奶、奶泡與義式濃縮咖啡融合的咖啡上，使用各種顏色的醬料，在咖啡表面勾畫出各種圖形。此技法活躍於歐洲。

技法三，篩網圖形法：篩網圖形法（圖 4）之操作方式與線條式圖案法最大相異之處，即是將各種液態的添加物，改成粉狀的原料，再配合篩網的運用呈現該作品；一般來說它分為兩種表示方式，第一種方式，首先在牛奶完成起泡動作之後，先靜置約 30 秒左右，讓牛奶與奶泡產生一定程度的分離效果，將起泡後的牛奶倒入義式濃縮咖啡中，倒入時首先注意，需利用湯匙先擋住部分的奶泡，讓牛奶與義式濃縮咖啡先行融合，再使用湯匙將奶泡覆蓋在咖啡表層形成雪白狀的表面，之後利用刻有各種圖形或字樣的網版及篩網，放置於距離咖啡表面約 1 公分處，灑上可可粉、肉桂粉或其它欲添加之粉狀物在各式網版及篩網上，使咖啡呈現該圖形或字樣。第二種方式與第一種做法相似，不同之處在於，牛奶完成起泡後，省略靜置 30 秒的動作，直接讓牛奶奶泡與義式濃縮咖啡進行融合，最後再利用刻有各種圖形或字樣的網版及篩網，放置於距離咖啡表面約 1 公分處，隔著各式網版及篩網灑上白糖粉，使咖啡呈現該圖形或字樣。

技法四，刺針式具象圖案法（圖 5）：簡單來說，即是在直接倒入成形法完成初期，運用針狀物勾畫出具像圖案；首先，大部分的操作者都是先於義式濃縮咖啡表面上灑上可可粉，接著再倒入牛奶、奶泡與咖啡融合，並在融合當下輕微晃動手腕，使咖啡的表面上形成圓形狀的波紋圖形，然後再以圓形狀波紋圖形為底，利用牙籤或針狀物，於咖啡

表面勾畫出各種具象圖形；其次部分操作者會利用義式濃縮咖啡與牛奶、奶泡融合當下所產生的白色圓點或不規則圖形，使用牙籤或針狀物，於融合完成的咖啡表面上，勾畫出各種圖形，例如：人像、貓、狗、貓熊…等動物圖形。此技法於日本相當盛行（林東源，2005）。

咖啡拉花是一種由「優良技術」擔任介紹人，促使「美味的濃縮咖啡」和「美味的牛奶」結合而成的婚姻關係。因為婚姻美滿，所以產生出「美好」、「快樂」、「滿足感」的「愛的結晶」（王俞惠，2008）。在咖啡文化根深蒂固的義大利，咖啡拉花已成為用來進行日常生活問候的道具之一。咖啡拉花不只是一種流行，亦是一種企圖傳達正統咖啡及美學生活的過程。

### 三、感性工學之發展與定義

感性工學 (Kansei Engineering) 一詞，源於 1986 年日本東洋工業 KK 集團（今馬自達 Mazda 汽車公司），該公司社長，山本建一 (Kenichi Yamamoto) 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參與世界汽車技術會議、美國汽車產業經營者研討會之演講，於發表文章「汽車文化論」中首次提出。黃崇彬記載，前日本廣島大學教授長町三生 (Mituo Nagamachi) 於 1988 年「雪梨國際人因工程學會」論文發表會場，稱其先前所主張之「情緒工學」更名為「感性工學」（黃崇彬、原田昭，1998）。

感性工學相較於其他國家，在日本起步得相當早，並且廣泛運用於日本產業界。1990 年至 1998 年間，日本通產省於感性工學投入 200 億日幣之研究發展經費後，日本越來越重視感性工學在各方面之應用；在 2007 年 5 月日本通產省又宣佈將投入 300 億日幣，作為發展感性工學之用，通產省發佈商品開發之「第四價值軸提案」（圖 6）（林育材，2007）。商品開發之第一價值（最低階）為性能、第二價值為信賴、第三價值為價格、第四價值為感性；而發展感性商品之最重要科學方法：感性工學，其重要性不可言喻。

「感性」(Kansei) 一詞在日文的用語中代表著「感知」、「感覺」、「印象」以及某種情緒的呈現。「感性工學」最早被稱為情緒工學，是一種人因探討的技術，主要是針對人類心理感知層次因素的探究，是一種轉換人性需要和感覺，成為產品設計元素的技術，亦即將心中的形象表現成產品的技術（林育材，2007）。利用此技術，進行消費者之感性分析，將可以讓人們的感性需求及意象，具體轉化為細部設計的元素，從而導入至商品設計中。「感性工學」即是利用工學之技術，將人們所具有之感性加以量化呈現，並由其中探？設計定案符合人們？麼樣的感性需求。感性工學中之「感性」可以詮釋為：人對物所持有之感覺或意象，是對物之心理上的期待感受（王肇儀，2008）。

日本學者長町三生 (Mituo Nagamachi)，對感性工學有大同小異的定義，列舉如下



圖6 第四價值軸提案

（資料來源：林育材，2007，本研究改繪製）



(王肇儀, 2008)：

1. 將人對感性、意象上之期望，翻譯為物理性設計要素，以具體設計之技術；
2. 為了實現將人之意象翻譯為物理性設計要素的技術；
3. 為了將人所具有之感性或是意象，翻譯為設計層面以具體的實現為物之技術；
4. 是一種將感性與工學做連結之技術。利用工學觀點進行人之感性分析，並帶入商品設計之手段，以製造可給予人類喜悅、滿足感商品之工學範疇。

整合以上內容，簡言之「感性工學」便是將「消費者之感性反應」，透過「人類工程學」(ergonomics)之系統分析方式，將其應用在新產品的設計與研發上，以生產符合「消費者需求」之產品(吳政峰, 2010)。即指運用量化的方式來呈現人們的感性，並藉由該方法找出人們的感性元素進而融入設計之中。

本文將「感性工學」之「感性」詮釋為：消費者對產品所產生之感覺或意象，亦指心裡上對產品所產生的期待與感受。本研究將其應用於消費者對咖啡拉花所產生之感覺或意象，即是探討消費者視覺體驗後心裡上的期待與感受。亦即為視覺體驗後之情感意象。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消費者在品嚐咖啡的同時，咖啡拉花所呈現之視覺藝術對消費者產生感性因子為何？其次欲透過人口統計變項檢定，將感性語彙做差異性分析。本研究運用文獻分析法及感性工學，依據相關書籍文獻記載及研究資料，彙整攸關咖啡拉花之感性語彙，其次，透過視覺以觀看圖片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該調查使用 Likert 五段式量表評估咖啡拉花呈現對受測者情感意象為何？最後，將問卷所蒐集的數據經由因素分析，整理歸納出咖啡拉花的情感構面。

### 一、研究設計

首先，本研究調查對象擬訂為臺中市有品嚐咖啡經驗的咖啡族群，初次問卷調查內容，透過書籍文獻記載，彙整 60 個咖啡拉花之感性語彙，讓受測者挑選對於咖啡拉花的感性評價形容詞。首先採用問卷方式進行第一次的調查，初次調查，將受測者選出的 10 個，足以代表咖啡拉花意象的形容詞語彙，進行統計後，挑選出問卷中形容詞共同度都大於 0.8 (表 1)，進行第二次問卷調查。

表 1 感性語彙的共同度

形容詞	共同性	形容詞	共同性	形容詞	共同性
藝術的	0.893	多層次的	0.820	幸福的	0.887
創意的	0.904	質感的	0.888	豐富的	0.841
獨特的	0.913	優雅的	0.816	設計感的	0.857
悠閒的	0.875				

第二次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共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為人口統計變項（包括性別、學歷、畢業科系、及職業），第二部分則為咖啡拉花對消費者的情感意象探討，其中第二部分問卷以視覺圖片觀看方式進行測試；此次調查對象亦鎖定為咖啡族群，總共人數 350 名。問卷設計同第一次問卷方式，採用 Likert 五段式量表作為計測方式，即是將各語彙分別製作成五段態度量表，即非常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量表由左至右分別給予 5 到 1 分評價，數值 5 則表示該樣本非常具有該形容語彙之感受，數值 3 代表著無意見，數值 1 代表該樣本非常不具有該形容語彙之感受。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圖 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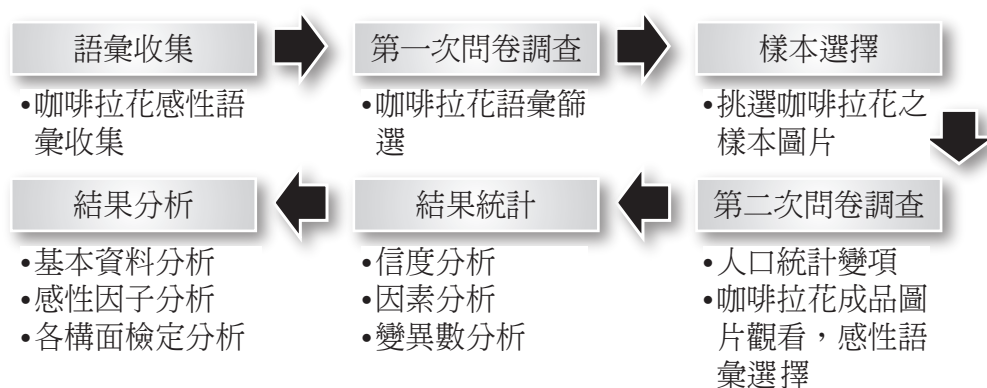


圖7 研究步驟

## 二、研究蒐集

本文研究對象擬訂為有品嚐咖啡經驗的咖啡族群，以便利問卷進行。問卷調查時間，分別於 101 年 07 月份第一週與第三週進行，二次問卷發放地點，皆以臺中市咖啡館及咖啡連鎖店為主。本研究初次問卷共發出 350 份，回收問卷 342 份，剔除填答不實及資料不齊之無效樣本後，實得有效樣本計 333 份；該次有效問卷率為 95.1%。第二次問卷一樣發出 350 份，回收問卷 336 份，剔除填答不實及資料不齊之無效樣本後，實得有效樣本計 320 份。本次有效問卷率為 91.4%。

## 三、研究分析方法

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來進行量化資料蒐集，首先將蒐集資料進行人工審查，此次審查為淘汰資料填寫不齊全及規律性作答之間卷；本文運用統計軟體 PASW18 版將有效問卷進行建檔，及進行信度分析、因素分析與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 肆、研究結果

## 一、研究對象統計及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就學背景、最高學歷及職業等四項（表 2），首先性別方面以女性 60.6% 大於男性 39.4%；最高學歷以大專院校受訪者佔多數，該比例為

46.3%；就學背景則以理工學最高，佔 32.5%；其他佔 20%；職業類別以學生 34.7% 比例較其他類別高，其次為 21.3% 的商業類別。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基本資料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126	39.4	女性	194	60.6	
最高 學歷	研究所	95	29.7	高中職	43	13.4	
	大專院校	148	46.3	國中以下	34	10.6	
就 學 背 景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	
	藝術設計	56	17.5	公教	29	9.1	
	社會人文	12	3.8	商	68	21.3	
	商學	19	5.9	職 業	工	37	11.6
	管理系	62	19.4		軍警	11	3.4
	理工學	104	32.5	農	8	2.5	
	醫學	3	0.9	學生	111	34.7	
	其他	64	20.0	其他	56	17.5	

## 二、研究信度分析

信度 (reliability) 是一種程度上的概念，即指測量的可靠性，係指測量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當測量誤差越大，測量的信度越低；信度係數是一個介於 0 與 + 1 之間的分數，數值越大，信度越高 (邱皓政, 2011)。本文使用 Cronbach's Alpha 值檢測該問卷結果的可靠性。根據 Guilford (1965) 研究指出 Cronbach's Alpha 值大於 0.7 屬於高信度，介於 0.7 ~ 0.35 屬尚可，低於 0.35 則表示信度低，拒絕使用 (Guilford, J.P., 1965)。本研究所得問卷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53，大於 Guilford (1965) 研究指出的 0.7，屬高信度，證明本問卷結果擁有一定的信度與效度。

## 三、因素分析感性因子萃取

首先本研究運用 KMO 量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以及 Bartlett 球型檢定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執行問卷因素分析的適合性。Kaiser (1974) 指出，KMO 統計量 0.90 以上，因素分析適合性是極佳的；0.80 以上則屬良好；0.70 以上屬中度；0.60 以上屬平庸；0.50 以上是可悲的；0.50 以下則無法接受，即指不宜採用因素分析 (邱皓政, 2011)。而 Bartlett 球型檢定其變數的  $p$  值小則呈現顯著，檢定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該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檢定結果 KMO 值為 0.640，達 0.60 以上屬平庸，雖屬平庸但依 Kaiser (1974) 文獻記載，此問卷測試結果仍是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問卷之 Bartlett 球型檢定值為 194.437，顯著性為 0.000，達顯著水準，故可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母體相關矩陣中有共同因素存在，故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表 3）。

表 3 本研究問卷 KMO 與 Bartlett 檢定結果

KMO 值	Bartlett 球型檢定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0.640	194.437	45	0.000***

\*\*\* 表示  $p$  值小於 0.001

本研究針對咖啡拉花所呈現之視覺藝術對消費者產生情感意象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為了讓萃取之共同因素能擁有更完整的解釋語彙，將因素空間以最大變異法進行轉軸。觀察陡坡圖（圖 8）與轉軸後之因素成分矩陣（表 4），以特徵值大於 1 為原則進行萃取，萃取結果實得出四個因素，分別為美好的、情感的、魅力的、自在（隨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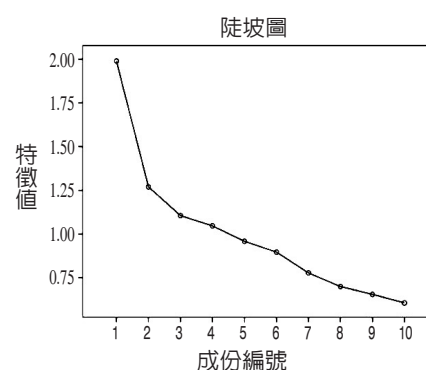


圖 8 因子特徵值陡坡圖

表 4 轉軸後之因子成分矩陣

因子名稱	感性語彙	因子負荷量	共同性
美好的	豐富的	0.644	0.479
	設計感的	0.610	0.437
	質感的	0.603	0.461
	藝術的	0.572	0.381
	多層次的	0.493	0.293
情感的	幸福的	0.826	0.714
	優雅的	0.719	0.622
魅力的	創意的	0.812	0.683
自在（隨性）的	悠閒的	0.745	0.661
	獨特的	0.648	0.679

各因子貢獻度（解釋的變異量）分別為 18.504%、13.173%、11.477% 及 10.948%，累計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54.102%（表 5）。各形容詞在各因子的因子負荷量越大表示該語彙與因子間有較高之關聯性存在。

表 5 因子貢獻度

因子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變異量 %
美好因子	1.850	18.504	18.504
情感因子	1.317	13.173	31.677
魅力因子	1.148	11.477	43.154
自在(隨性)因子	1.095	10.948	54.102

#### 四、人口統計變項之感性語彙差異性分析

在統計資料分析裡，比較性的行為是一般較常見的使用方式，即是討論不同兩群體的某種特性是否一致，或對某問題的觀點是否一致。這種兩群體特性一致性與否，往往可由兩群體特性的期望值來判斷。Z 檢定或 T 檢定是用以檢定兩群體特性之常用的方法之一，在資料分析之際，其中多以 T 檢定進行單樣本的平均數考驗或平均數差異。而當樣本超過兩組時，即採用變異數分析 (ANOVA)。變異數分析通常在檢定二個或三個以上的獨立樣本，透過該分析可以觀察比較各組平均數是否相等，或了解不同樣本是否具有顯著性的差異。本研究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及變異數分析來檢測性別（男性、女性）、學歷（研究所、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以下）、就學背景及職業等，各族群感性語彙間之差異性。

##### （一）性別之感性語彙檢定

經獨立樣本 T 檢定檢測後，得知男女雙方 10 個感性語彙各平均數如下：(1) 藝術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3.78 與 3.96；(2) 多層次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3.48 與 3.79；(3) 幸福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2.52 與 3.65；(4) 創意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2.90 與 3.03；(5) 質感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3.79 與 3.90；(6) 豐富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3.67 與 3.77；(7) 獨特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2.25 與 2.52；(8) 優雅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3.15 與 3.88；(9) 設計感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3.82 與 3.86；(10) 悠閒的男、女平均數各為 3.12 與 3.13（表 6）。

表 6 組別統計量與獨立樣本檢定

感性語彙	男平均數	女平均數	變異數相等 Levene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顯著性（雙尾）
藝術的	3.78	3.96	12.099	0.001**	0.064
多層次的	3.48	3.79	6.884	0.009**	0.006**
幸福的	2.52	3.65	2.891	0.090	0.000***
創意的	2.90	3.03	0.757	0.385	0.256
質感的	3.79	3.90	4.366	0.037*	0.216
豐富的	3.67	3.77	1.208	0.273	0.307
獨特的	2.25	2.52	1.196	0.275	0.005**
優雅的	3.15	3.88	2.770	0.097	0.000***
設計感的	3.82	3.86	2.905	0.089	0.678
悠閒的	3.12	3.13	0.755	0.386	0.890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0$

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 (表 6)，除感性語彙－藝術的 ( $F = 12.099$ ,  $0.001 < 0.05$ )、多層次的 ( $F = 6.884$ ,  $0.009 < 0.05$ ) 及質感的 ( $F = 4.366$ ,  $0.037 < 0.05$ ) 達顯著外，其他感性語彙均未達顯著 ( $p > 0.05$ )，表示除藝術的、多層次的及質感的感性語彙外，其他感性語彙在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並無明顯差異。而在「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中，感性語彙－多層次的、幸福的、獨特的、優雅的顯著性均小於 0.05，呈現出考驗結果達顯著。表示性別不同，在咖啡拉花各感性語彙體驗上除多層次的、幸福的、獨特的、優雅的，男、女感受程度不一外，其他並無顯著差異。

## (二) 就學背景之感性語彙檢定

首先，經由「多變量的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可知 Box's M 值為 516.653，轉換成的 F 統計量為 1.568，顯著性考驗的  $p$  值等於 0.000 小於 0.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各組間的組內變異數矩陣不相等。

表 7 就學背景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來源	依變數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和	事後比較
就學背景	藝術的	9.793	6	1.632	2.417	.026*	.044	
	多層次的	22.144	6	3.691	4.402	.000***	.078	
	幸福的	26.547	6	4.425	3.182	.005**	.057	
	創意的	24.565	6	4.094	4.655	.000***	.082	
	質感的	7.577	6	1.263	2.537	.021*	.046	
	豐富的	29.810	6	4.968	8.985	.000***	.147	3, 4, 5 > 1 3 > 4, 5 4 > 5
	獨特的	28.941	6	4.823	8.005	.000***	.133	2 > 1, 2 > 4
	優雅的	25.624	6	4.271	6.978	.000***	.118	4 > 1
	設計感的	57.105	6	9.518	14.386	.000***	.216	3, 4, 5, 7 > 1 3 > 4, 5, 7 4 > 5, 7 5 > 7
	悠閒的	44.025	6	7.337	9.580	.000***	.155	3, 7 > 1 3, 7 > 4 3 > 7

1. 藝術設計、2. 社會人文、3. 商學、4. 管理系、5. 理工系、6. 醫學、7. 其他。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0$

\* $P_j = \alpha \div 10 = .005$

其次透過「就學背景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表 7)，也就是不同就學背景變項在十個依變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受試者在十個依變項上單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之 F 值分別為藝術的 2.417 ( $p = .026 < .05$ )、多層次的 4.402 ( $p = .000 < .05$ )、幸福的 3.182 ( $p = .005 < .05$ )、創意的 4.655 ( $p = .000 < .05$ )、質感的 2.537 ( $p = .021 < .05$ )、豐富的 8.985 ( $p = .000 < .05$ )、獨特的 8.005 ( $p = .000 < .05$ )、優雅的 6.978 ( $p = .000 < .05$ )、設計感的 14.386 ( $p = .000 < .05$ )、悠閒的 9.580 ( $p = .000 < .05$ )。

.05)、設計感的 14.386 ( $p = .000 < .05$ )、悠閒的 9.580 ( $p = .000 < .05$ )；根據以上數據得知，不同的就學背景在感性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幸福的」、「創意的」、「質感的」、「豐富的」、「獨特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感受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

最後，從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可以得知：就學背景變項在 10 個感性語彙之多變量檢定統計量  $\Lambda$  值為 .374，達到 0.5 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設，表示 10 個母群體的平均向量有顯著的不同，即就學背景變項在 10 個感性語彙中，至少有一個感性語彙達到顯著水準。進一步經單變量檢定結果發現：就學背景變項在「豐富的」、「獨特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差異均達顯著水準，F 值分別為 8.985、8.005、6.978、14.386、9.580，顯著性均於  $p_j (= .005)$ ，經事後比較發現：在「豐富的」感性語彙上，就學背景「商學」( $M = 4.11$ )、「管理系」( $M = 4.00$ )及「理工學」( $M = 3.89$ )均顯著的高於「藝術設計科系」( $M = 3.16$ )，而「商學」族群顯著高於「管理系」及「理工學」，「管理系」顯著性亦高於「理工學」族群；在「獨特的」感性語彙上，就學背景「社會人文科系」( $M = 3.33$ )均顯著的高於「藝術設計科系」( $M = 2.11$ )及「管理系」族群 ( $M = 2.08$ )；在「優雅的」感性語彙上，就學背景「管理系」族群 ( $M = 3.94$ ) 顯著的高於「藝術設計科系」( $M = 3.09$ )；在「設計感的」感性語彙上，就學背景「商學」( $M = 4.37$ )、「管理系」( $M = 4.15$ )、「理工學」( $M = 3.96$ )及「其他」族群 ( $M = 3.95$ )均顯著高於「藝術設計科系」( $M = 2.96$ )，而「商學」顯著性又高於「管理系」、「理工學」及「其他」族群，「管理系」族群亦高於「理工學」及「其他」族群，最後「理工學」顯著性又高於「其他」族群；在「悠閒的」感性語彙上，就學背景「商學」( $M = 3.95$ )與「其他」族群 ( $M = 3.50$ )均顯著的高於「藝術設計」( $M = 2.82$ )和「管理系」( $M = 2.63$ )，而「商學」又顯著高於「其他」族群。

本研究發現在就學背景上之感性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幸福的」、「創意的」、「質感的」、「豐富的」、「獨特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其  $p$  值都小於 .05，皆呈顯著差異，但經由 Scheffe 多重比較後發現僅有「豐富的」、「獨特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有顯著差異外，其他另外 5 個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幸福的」、「創意的」、「質感的」皆無明顯的差異。即表示就學背景差異，在咖啡拉花各感性語彙體驗上，除「豐富的」、「獨特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感受程度不一樣外，其它並無顯著差異。

### (三) 教育程度之感性語彙檢定

首先，經由「多變量的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可知 Box's M 值為 248.939，轉換成的 F 統計量為 1.384，顯著性考驗的  $p$  值等於 0.000 小於 0.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各組間的組內變異數矩陣不相等。

其次透過「教育程度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表 8)，也就是不同教育程度變項在十個依變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受試者在十個依變項上單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之 F 值分別為藝術的 16.133 ( $p = .000 < .05$ )、多層次的 9.022 ( $p = .000 < .05$ )、幸福的 1.305 ( $p = .273 > .05$ )、創意的 1.274 ( $p = .283 > .05$ )、質感的 11.342 ( $p = .000 < .05$ )、

= .000 < .05)、豐富的 10.792 ( $p = .000 < .05$ )、獨特的 3.075 ( $p = .028 < .05$ )、優雅的 .921 ( $p = .431 > .05$ )、設計感的 5.005 ( $p = .002 < .05$ )、悠閒的 2.441 ( $p = .064 > .05$ )；根據以上數據得知，不同的教育程度在感性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質感的」、「豐富的」、「獨特的」、「設計感的」感受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而「幸福的」、「創意的」、「優雅的」、「悠閒的」這四個感性語彙則沒有明顯的不同。

表 8 教育程度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來源	依變數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和	事後比較
教育程度	藝術的	29.375	3	9.792	16.133	.000***	.133	2, 4 > 1、4 > 2
	多層次的	22.449	3	7.483	9.022	.000***	.079	2, 4 > 1、4 > 2
	幸福的	5.650	3	1.883	1.305	.273	.012	
	創意的	3.584	3	1.195	1.274	.283	.012	
	質感的	15.883	3	5.294	11.342	.000***	.097	2, 4 > 1、4 > 2
	豐富的	18.855	3	6.258	10.792	.000***	.093	2, 3, 4 > 1 4 > 2, 3, 2 > 3
	獨特的	6.172	3	2.057	3.075	.028*	.028	
	優雅的	1.882	3	.627	.921	.431	.009	
	設計感的	11.985	3	3.995	5.005	.002**	.045	
	悠閒的	6.426	3	2.142	2.441	.064	.023	

1. 研究所、2. 大專院校、3. 高中職、4. 國中以下。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0$

\* $P_j = \alpha \div 10 = .005$

最後，從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可以得知：教育變項在 10 個感性語彙之多變量檢定統計量  $\Lambda$  值為 .687，達到 0.5 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設，表示 10 個母群體的平均向量有顯著的不同，即教育變項在 10 個感性語彙中，至少有一個感性語彙達到顯著水準。進一步經單變量檢定結果發現：教育變項在「藝術的」、「多層次的」、「質感的」、「豐富的」差異均達顯著水準，F 值分別為 16.133、9.022、11.342、10.792，顯著性均於  $p_j (= .005)$ ，經事後比較發現：在「藝術的」感性語彙上，教育程度大專院校 ( $M = 4.02$ ) 及國中以下 ( $M = 4.44$ ) 均顯著的高於「研究所」( $M = 3.47$ )，而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又顯著高於「大專院校」；「多層次的」感性語彙上，教育程度大專院校 ( $M = 3.81$ ) 及國中以下 ( $M = 4.06$ ) 均顯著的高於研究所 ( $M = 3.28$ )，而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又顯著高於「大專院校」；在「質感的」感性語彙上，教育程度大專院校 ( $M = 4.03$ ) 及國中以下 ( $M = 4.12$ ) 均顯著的高於研究所 ( $M = 3.56$ )，而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又顯著高於「大專院校」；「豐富的」感性語彙上，教育程度大專院校 ( $M = 3.89$ )、高中職 ( $M = 3.88$ ) 及國中以下 ( $M = 3.91$ ) 均顯著的高於「研究所」( $M = 3.36$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又顯著高於「大專院校」及「高中職」，而



「大專院校」又高於「高中職」。

本研究發現在教育程度上之感性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質感的」、「豐富的」、「獨特的」、「設計感的」其  $p$  值都小於 .05，皆呈顯著差異，但經由 Scheffe 多重比較後發現僅有「藝術的」、「多層次的」、「質感的」、「豐富的」有顯著差異外，其他另外 2 個語彙「獨特的」、「設計感的」皆無明顯的差異。即表示教育程度差異，在咖啡拉花各感性語彙體驗上，除「藝術的」、「多層次的」、「質感的」、「豐富的」感受程度不一樣外，其它並無顯著差異。

#### (四) 職業類別之感性語彙檢定

經由 Box 多變量變異數共變數矩陣同質性檢定結果統計量，可知 Box's M 值等於 473.341，轉換成的 F 統計量為 1.435，顯著性考驗的  $p$  值等於  $.000 < .05$ ，達到顯著水準。

透過「職業類別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表 9)，即是不同職業類別變項在十個依變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受試者在十個依變項上單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之 F 值分別為藝術的 4.685 ( $p = .000 < .05$ )、多層次的 4.102 ( $p = .001 < .05$ )、幸福的 .788 ( $p = .579 > .05$ )、創意的 18.607 ( $p = .000 < .05$ )、質感的 2.100 ( $p = .053 > .05$ )、豐富的 3.734 ( $p = .001 < .05$ )、獨特的 3.164 ( $p = .005 < .05$ )、優雅的 6.544 ( $p = .000 < .05$ )、設計感的 6.949 ( $p = .000 < .05$ )、悠閒的 6.700 ( $p = .000 < .05$ )；根據以上數據得知，不同的職業類別在感性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創意的」、「豐富的」、「獨特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感受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而「幸福的」、「質感的」、這二個感性語彙則沒有明顯的不同。

表 9 職業類別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來源	依變數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和	事後比較
職業類別	藝術的	18.227	6	3.038	4.685	.000***	.082	
	多層次的	20.742	6	3.457	4.102	.001**	.073	
	幸福的	6.876	6	1.146	.788	.579	.015	
	創意的	78.842	6	13.140	18.607	.000***	.263	3, 1, 2 > 6 3 > 1、2, 1 > 2
	質感的	6.322	6	1.054	2.100	.053	.039	
	豐富的	13.553	6	2.259	3.734	.001**	.067	
	獨特的	12.439	6	2.073	3.164	.005**	.057	
	優雅的	24.207	6	4.034	6.544	.000***	.111	3 > 1
	設計感的	31.056	6	5.176	6.949	.000***	.118	3, 2 > 1、3 > 2
	悠閒的	32.297	6	5.383	6.700	.000***	.114	1, 2 > 3、1 > 2

1. 公教、2. 商、3. 工、4. 軍警、5. 農、6. 學生、7. 其他。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0$

\* $P_j = \alpha \div 10 = .005$

最後，從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可以得知：職業變項在 10 個感性語彙之多變量檢定統計量  $\Lambda$  值為 .414，達到 0.5 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設，表示 10 個母群體的平均向量有顯著的不同，即職業變項在 10 個感性語彙中，至少有一個感性語彙達到顯著水準。進一步經單變量檢定結果發現：職業變項在「創意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差異均達顯著水準，F 值分別為 18.607、6.544、6.949、6.700，顯著性均於  $p_j (= .005)$ ，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創意的」感性語彙上，職業類別工 (M=4.03)、公教 (M=3.34)、及商 (M=3.13) 族群均顯著的高於「學生」(M=2.48) 族群，職業類別「工」族群顯著高於「公教」及「商」族群，而「公教」族群顯著亦高於「商」族群；在「優雅的」感性語彙上，職業類別「工」(M=4.11) 族群顯著高於「公教」(M=2.93) 族群，其他族群則無顯著的變化；在「設計感的」感性語彙上，職業類別「工」(M=4.27)、「商」(M=4.18) 族群均顯著高於「公教」(M=3.21) 族群，而「工」族群又顯著高於「商」族群；在「悠閒的」感性語彙上，職業類別「公教」(M=3.59)、「商」(M=3.44) 族群均顯著高於「工」(M=2.62) 族群，而「公教」族群又顯著高於「商」族群。

本研究發現在職業類別的感性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創意的」、「豐富的」、「獨特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其  $p$  值都小於 .05，皆呈顯著差異，但經由 Scheffe 多重比較後發現僅有「創意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有顯著差異外，其他的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幸福的」、「質感的」、「豐富的」及「獨特的」皆無明顯的差異。即表示職業類別不同，在咖啡拉花各感性語彙體驗上，除「創意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感受程度不一樣外，其它並無顯著差異。

## 伍、結論與建議

感性消費時代來臨，情感漸漸地影響了人們的消費決策，在這樣的環境中研究者認為咖啡拉花成爲一種生活藝術，它連接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拉近了消費者與咖啡工作者間的距離，爲人們帶來了開心與感動，滿足了人們在感性消費中的情感需求。岩康孝曾說：「咖啡是一種與他人溝通的手段，我認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相當重要。」(侯咏馨譯，2011) 當咖啡拉花確認能滿足消費者情感需求後，本研究希望從消費者對咖啡拉花的視覺感受了解該產品的情感意象，及探討感性語彙與人口變項之關係 (表 10)，故本研究依據研究問題與研究結果，具體提出研究發現，希冀可以爲咖啡業者提供多元的行銷資訊，以提升咖啡的市場競爭力。

表 10 人口統計變項之感性語彙差異性顯著一覽表

研究問題	研究說明	感性語彙	研究結果			
			性別	就學背景	教育程度	職業類別
咖啡視覺 藝術感性 語彙與人 口變項差 異性分析	透過問卷收 集將數據 資料經由 統計軟體 PASW18 分 析	藝術的			*	
		多層次的	*		*	
		幸福的	*			
		創意的				*
		質感的			*	
		豐富的		*	*	
		獨特的	*	*		
		優雅的	*	*		*
		設計感的		*		*
		悠閒的		*		*

\* 代表研究結果顯著

## 一、咖啡拉花感性語彙及感性因子解析

透過感性語彙的收集、彙整與因素分析，本研究得到 10 個感性語彙，分別有：1. 藝術的。2. 創意的。3. 設計感的。4. 多層次的。5. 獨特的。6. 豐富的。7. 質感的。8. 優雅的。9. 幸福的。10. 悠閒的；及 4 個感性因子，分別為 1. 美好因子。2. 情感因子。3. 魅力因子。4. 自在（隨性）因子。其中感性語彙，美好的含括：豐富的、設計感的、質感的、藝術的、多層次的。情感的含括：幸福的、優雅的。魅力的含括：創意的。自在（隨性）的含括：悠閒的、獨特的感性語彙。本研究透過研究結果得以推論，咖啡拉花對於人們的主要情感反應可以歸納為四種類型：1 美好的。2. 情感的。3. 魅力的。4. 自在（隨性）的。亦即當人們在欣賞咖啡拉花、品嚐咖啡的同時，可以感受到上述提出的 4 個因子的其中之一因子。

## 二、人口統計變項與感性語彙之關係

首先，研究發現在性別方面，男、女性對於咖啡拉花感性語彙的感受程度就平均數而言，女性皆大於男性，其中又以多層次的、幸福的、獨特的、優雅的具顯著性；故本研究推論男性普遍較女性理性，而女性較男性感性，所以在咖啡拉花感性語彙的感受程度上，女性大於男性。

其次，在就學背景方面，研究發現不同的就學背景對於感性語彙的感受程度皆有顯著影響，透過 Scheffe 事後比較，表明感性語彙「豐富的」、「獨特的」、「優雅的」、「設計感的」、「悠閒的」，各就學背景均顯著高於藝術設計科系；本研究推論藝術設計科系的受測者，接觸「美」的視覺、事物較一般科系高，故在審視美學事物時所訂定的標準亦較其他

科系嚴苛，所以在咖啡拉花的感受上，感性語彙的認同度亦較其他科系低。

在教育程度方面，透過研究發現感性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質感的」、「豐富的」均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國中以下顯著性，及感性語彙的認同度皆高於其他的教育程度，而研究生的顯著性及感性語彙認同度皆低於其他教育程度；根據洪佩芬、陳殿禮與林振陽 (2008) 針對〈人口統計變數對家具消費價值觀之探討〉的研究中發現「學歷愈高，在美感取向重視程度愈高」，該研究的結果與本研究相符，本研究推論由於受高教育的影響，視野較其他教育程度寬廣，相對的對美學事物的要求也較高，所以與國中以下學歷相較而言，國中以下學歷對美學事物的容許度較高，故對感性語彙的認同度相對較為寬廣。

最後，在職業類別方面，研究發現不同的職業類別，透過感性語彙的檢定得到 10 個感性語彙裡，僅有「幸福的」、「質感的」這二個感性語彙沒有顯著差異，但透過 Scheffe 事後比較，表明達顯著差異僅有 4 個感性語彙，而其他語彙「藝術的」、「多層次的」、「幸福的」、「質感的」、「豐富的」、「獨特的」並無顯著差異，但本研究認為卻有因人而異的實用性；經由研究結果發現，職業類別「工」普遍的認同度皆高於其他職業類別，本研究推論「工」族群對於美學事物的接受度，容許度亦高於其他族群。

最終統合人口變項之感性語彙後發現「幸福的」一詞，於就學背景、教育程度、職業類別等各人口變項差異性分析中均未達顯著，就平均數而言，本研究問卷設計評分最高分為 5 分，故最高平均數應屬 5，該語彙於人口變項數據皆大於 3，故本研究推論，咖啡拉花呈現出的「幸福感」是一般大眾消費者所肯定的，是普遍被認同與接受的，所以該語彙並不受本研究所列舉之就學背景、教育程度、職業類別等 3 項人口統計變項影響。

### 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咖啡拉花進行統一性的統計，透過因素、信度、變異數等分析方法探討驗證本研究議題，本研究確定，咖啡拉花能帶給消費者美好的、情感的等感受，咖啡拉花呈現出的幸福感更是一般大眾所接受的，故提出建議，咖啡業者針對一般性消費者，於推廣咖啡之際，適時搭配咖啡拉花的呈現，將有助於咖啡飲用文化的普及，並提高商品接受度。

礙於時間限制未能夠針對咖啡拉花各技法進行更細部的研究分析，因此本研究後續將會持續進行。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王士文 (2004)。咖啡精神。臺灣、臺北：果實出版。

王俞惠 (2008)。咖啡畫布上的藝術：Latte Art 拉花創作教科書。臺北：臺灣東販。

王肇儀 (2008)。感性工學為基礎之人工表情分析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桃園。

- 吳政峰 (2010)。「感性工學」對服務品質提升之啓發。中華民國品質學會，46 卷 (11)，42-46。
- 周麗蘭 (2003)。古坑，偶然相遇。雲林：雲林縣文化局。
- 林東源 (2005)。Latte Art 咖啡拉花 -Espresso 與牛奶的完美邂逅。臺北：大境文化。
- 林育材 (2007)。整合支援向量機與感性工學應用于產品造型設計專家系統之開發（未出版碩士論文）嶺東科技大學，臺中。
- 侯咏馨（譯）(2011)。最具人氣的花式咖啡。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永瀨正人，2008）。
- 洪佩芬、陳殿禮、林振陽 (2008)。人口統計變數對家具消費價值觀之探討。應用藝術與設計學報，(3)，67-82。
- 黃崇彬、原田昭 (1998)。日本感性工學發展近況與其在遠隔控制介面設計上應用的可能性〔電子版〕。1998 中日設計教育研討會論文集，17-26。
- 邱皓政 (2011)。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SPSS (PASW) 資料分析範例解析。臺北市：五南。
- 楊裕富 (1999)。創意思境：視傳設計概念與方法。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二、英文部分

- Guilford, J. P.(1965).*Fundamental statistics i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4th ed.)*.Mc Graw,Hill : New York.

## 德園子《道德經證》以佛說證成之《老》學、金丹思想

### The Buddhist Proof of Laoism and Golden Elixir Thoughts in *Deyuanzi's Verification of Tao De Ching*

黃佳駿\*

Chia-Chun Huang

(收件日期 102 年 4 月 17 日；接受日期 102 年 10 月 4 日)

#### 摘要

德園子為晚清時人，其人雖不為當世的顯要學者，然其著作《道德經證》實寄寓豐富的義理思想，是為楊文會《道德經發隱》、《南華經發隱》與章太炎《齊物論釋》之外，佛學與道家思想會通的另一著作。而其論述金丹之術，也繼承道教內丹一脈的修養工夫，該書對於晚清《老》學、佛學、道教之思想會通是有其特殊意義。

大體上德園子論「道」以道、佛合流為主要，故大乘佛學的真空、假有乃能比附道家的無為、有為，而其對於佛性與道家之「道」亦有同質異名的辨證。再次，德園子之「道」論更強調為「道」工夫的進程，其論證虛心養性、真空虛無之意境也與佛學的法空、空性有所干涉；而其運用道家、佛學、金丹進行詮說，也凸顯其判定諸家思想殊途同歸之意趣。其論證金丹、心性的關係與西方榮格有相似處，故本文亦參考之。

從晚清的《老》學思想而論，該書著重道教、金丹哲理之闡發，而融通三家、金丹之學的識見亦有本體心性與工夫論上之思想價值，故頗有諸多可留意處。

關鍵詞：德園子、晚清思想、佛學、《老子》、金丹、玄佛會通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Abstract**

Deyuanzi is a late Qing poet. Although he was not a particularly outstanding scholar, his work *Verification of Tao De Ching* has actually encompassed rich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is is another work that integrates the Buddhist and Taoist thoughts other than Yang Wenhui's *Interpretation of Tao De Ching (Tao De Ching Fa Yin)* and *Interpretation of Nan Hua Ching (Nan Hua Ching Fa Yin)*, as well as Zhang Taiyan's *Annotation of The Uniformity of All Things (Qiwulun)*. Moreover, his discussion on the golden elixir alchemy inherited the self-cultivation knack of the Taoist school of internal alchemy. The book has a special implication on the intellectual integration of Lao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Generally speaking, Deyuanzi's discussion of "the way" is a fusion of Taoism and Buddhism. Thus, the concepts of "genuine emptiness" and "fake existence" in Mahayana Buddhism are compared to "wu-wei" (doing nothing) and "you-wei" (doing something) in Taoism. He also argues that the Buddhist and Taoist "ways" are the same in essence with different names. Besides, Deyuanzi's discussion of "the way" focuses more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way", and his argumentation about the concepts of "being modest for cultivation of one's temperament" and "genuine emptiness and nothingness"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Buddhist concepts of "dharma-sunyata" (emptiness of the way) and "sunyata" (nature of emptiness). His interpretation by applying the Taoist, Buddhist and elixir alchemy thoughts manifests his judgment that all philosophers' thoughts arrive at the same end. His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olden elixir and temperament is to some extent similar to the Western psychologist Carl Gustav Jung's theory, whose work is also taken as a reference of this ess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oist thoughts in late Qing, this book emphasizes the elaboration of the Taoist and golden elixir philosophy, with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thoughts as well as the golden elixir alchemy. His discussion on the temperament ontology and the work of cultivation is also worth further thoughts.

**Key words:** Deyuanzi, late Qing thoughts, Buddhism, Lao Tzu, golden elixir, integration of Taoism and Buddhism.

## 壹、前言

從道家思想的發展而論，道、佛思想的相互比附有其重要之學術意義，受到六朝玄佛會通的渲染，以佛學理解《老》、《莊》，或以道家理論解釋佛學，乃成爲魏晉以降重要之詮解方法。近人蒙文通以爲：「羅什、圖澄皆注《老子》，其信否未知，而惠琳、惠觀、惠嚴皆有《老子注》，〈陸序〉稱爲『宋世沙門』，則釋氏注《老》，先有其事，故《老》家亦沿而用釋。」<sup>1</sup>羅什、圖澄皆以沙門的身份注解《老子》，可知魏晉時期，佛經之譯經與注經已頗有《老》學影響，南北朝「格義」思想之特色，不外乎是以中國固有思想之文字、辭彙、哲理，進以結合印度佛學之教義與理論爲梗概，可知道佛思想之相互比附在當時可謂趨勢；明代的釋德清、方以智亦有會通佛、《莊》之作，如釋德清說「佛、老以無我爲宗」<sup>2</sup>又說：「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即《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sup>3</sup>佛、老皆抱持「無我」之意，以無爲本乃能成爲二家學說之共同識見，故佛、老皆據「無」的意境有其近似處，此亦說明魏晉以降，道、佛哲理之會通並無隔閡。總言之，姑且不論佛學與道家於語言、哲理仍有根本上之歧見，或者工夫論與境界觀的迥異，此種學術會通大抵成爲魏晉以降道家思想之特色。

晚清時期，諸子學復興，學者重新審視諸子研究的意義，魏晉以降玄佛會通的詮解脈絡也旋爲學者所重視，在這種著重義理的趨勢下，也間接提高佛學的價值，梁啟超說：「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學』。……晚清所謂新學家，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經典流通既廣，求習較易，研究者日衆。就中亦分爲兩派，則哲學的研究與宗教的信仰也。」<sup>4</sup>佛學以豐富的義理思想著稱，其高度的邏輯、辨證思維爲學者所援用，乃成爲學者鑽研哲學思想的重要理路。

晚清德園子著有《道德經證》二卷，該書以諸家思想之合流爲要旨，以爲道家、佛學之虛心、真如有所干涉，其採取「以佛解老」的方法，來處理《老子》的問題，此即欲由哲理思想之融會，探討《老子》「道」的理論與修「道」之工夫方法。<sup>5</sup>再次，德園子論說體「道」的工夫與境界，亦不諱言道教的「金丹」修仙之術，以爲經由丹術修煉之法亦能上溯「道」本體之玄妙與佛理之正覺，故其融道、佛學說與道教金丹之術，試圖以學術會通之方式論述《老》學「道」論，此爲其成書特色。該書可觀處有二，一在於能融會佛、道、儒家思想以論「道」，此可由哲理之層面析論；一在於經道丹術思想以求「道」，此著重修「道」之工夫方法，而以道家、佛學、金丹思想爲詮解，故有集諸家工夫方法求「道」的用意在。近代西方心理學家榮格 (Carl Jung A.D 1875-1961) 亦有整合佛學、易

1 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359。

2 釋德清：《道德經解》（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頁45。

3 《道德經解》，頁40。

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2002年），頁84。

5 德園子屢次有提到心法問題，故在理念上頗近禪宗，如其以爲「根宗涅槃，妙心拈花，便了少林大意」，此說也符合禪學的源流。因此本文以爲其援用佛學以禪宗爲主，而以其他大乘教派，如中觀、真常一系之說爲輔，故亦有對有、無、佛性思想之詮釋。見德園子：《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卷一，頁2。



學、金丹之術與道家思想的著作問世，其探析清人蔣元庭整理的《太乙金華宗旨》，把金丹之理論運用於心性修養的形上層面，與《道德經證》有相近的思路，故可為本文所參酌。大體上德園子之「道」論更強調為「道」工夫之修持，其論證修心、虛無與道家「道」論有所干涉，而其以佛學、金丹進行詮說，也凸顯佛道同源的意趣。

《道德經證》可視為晚清時期以佛理、禪理解老的代表作，該書有「佛老會通」的思想價值，今人邱敏捷以為：「他們多重應用了著名的禪宗語錄，分別將禪宗的重要思想引入《老子》篇章的詮釋之中，進行另類的學術創造，這對於學術思想的多元發展，當有其正價意義。」<sup>6</sup>故從晚清的《老》學思想而論，該書著重「道」思想之闡發與道、佛之會通，實有特殊意義。

本文則以《道德經證》之「佛道會通」為研究要點，並探討其以佛解老、以佛學詮解「金丹」之用意。<sup>7</sup>該書以佛、道所析辨之「道」說，並旁及其本體論與工夫論為論述要點，此大體有哲理、義理詮釋的價值，亦是晚清楊文會《道德經發隱》、《南華經發隱》與章太炎《齊物論釋》以外，佛學與道家思想會通的另一著作，對於晚清《老》學、佛學思想之擴充實有可觀處，可為晚清民初之諸子學研究所留意，論述如下。

## 貳、《道德經證》之思想意涵探析

德園子為晚清時人，其生平與生卒年皆不詳，或說其身份為道士一流，然經考察其言論，則是否為道士仍有可探討的空間。<sup>8</sup>德園子今唯有《道德經證》一書傳世，據嚴靈峰之考證，《道德經證》大致刊刻於清代光緒年間。<sup>9</sup>德園子亦自言：「余昔見泰西書所言耶蘇降世，……夫道，本也；藝，末也；曆算機器出乎道者也。」<sup>10</sup>由此說可知，德園子應是身處鴉片戰爭以降，才能大量接觸西方的曆算、機器等知識，西洋的《聖經》亦經由傳教士傳播於中國各行省，晚清以降西學東漸風氣逐漸成熟，故《道德經證》可考證為清末民國前之作品。

6 邱敏捷：〈以「禪」解老析論〉，收入《玄奘佛學學報》第三期（新竹，2005年7月），頁55。

7 本文以為，德園子論述《老子》，其用意乃在於調解「三家之合」的問題，此由〈道德經證·序〉大致可看出。而德園子所論述的核心要點在於《老子》原文，其學說大抵由《老》學而漫延，在方法上，其所採取的「以佛解老」則為所指。故其目的或在於道釋會通，但在方法上以佛家理論解釋應為合理。

8 據《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目錄》載，《道德經證》係「光緒間刊本」。嚴靈峰：《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第一函，第一冊，頁2。

9 邱敏捷〈以「禪」解老析論〉一文認為德園子為「道士」，其說：「綜上所見，宋·邵若愚、元·李道純，……以及清·德園子等都是道士身份。」可知文中把羅列的諸位思想家都視為道士。見邱敏捷：〈以「禪」解老析論〉，收入《玄奘佛學學報》第三期，頁79-80。不過此說或可再作探討，蓋德園子於《道德經證·自序》言「僕業風鼓慮，欲浪漂形，忽忽生愆，因循負道，驚心馬齒，五十年餘矣。……竟忘一介塵凡。」可知其五十多歲前皆無有涉及為道之事，故有「忽忽生愆，因循負道」之說，其語末則以「一介塵凡」自居，似乎也無法證實德園子身份為「道士」之流。據嚴靈峰所編《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亦無指出其道士身份，故本文乃對德園子身份採取保留說法。見德園子：《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2。

10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44-47。

《道德經證》係德園子論證「道」說的著作，該書以唐代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碑本為底本，景龍碑屬河上公本的流派，大抵為舊版本中文字較可信者，但德園子絕少採用古注古疏，亦少有針對音韻、訓詁考校，其論證《老子》全然著重哲理的論述。近人蕭天石先生分判歷來詮解《老子》有九派，曰：「歷代解老子者，除河、王二大系統外，餘亦多以其所得為宗。……玄學派，又稱重玄派。……儒林派，又稱學人派。……道教派，又稱道士派。……丹道派，又稱修真派。佛學派，又稱禪理派。」<sup>11</sup>德園子之書並不重視集解、考據，大體匯集玄學、儒林、佛學、丹道之特長，融通諸家之哲理，以探討「道」思想為學說旨趣。其思想內涵大抵有二，一者強調儒佛、道佛思想之合流；二是借重「丹道派」之理論，欲經修煉「金丹」工夫，以達到養性正心之緣「道」，述略如下。

## 一、強調三家思想之合同

德園子之參同三家意趣，大致是由心性的範疇入手，如德園子在《道德經證·序》便一再點出三家之論「心」，曰：

盡心者聖，具道者心。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自昧焉者，……未會三家之合，徒爭三教之分，故門戶別而血脈鮮通，根源明而末流斯契，是不可不證其同也。<sup>12</sup>

蓋先聖、後聖皆以心性而證道的，雖然各家工夫有異，然其思意是一致的。從此說則諸家聖人之「道」的範疇實一致同理，而儒家之聖人、道家之神人、至人與佛的地位、層次便可能趨於統一。此說以為諸家學說有異然殊途同歸，亦說明了三家思想的究極理趣或可能進一步會通合流。至於三家思想既然有合同處，但為何三家的學說理論迥異，德園子則先由其道、儒會通論說，其云：「師持一說，家守一傳，……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苗根，要知些子元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是不可不證其異也。」<sup>13</sup>聖人開出其學說後，諸家後學則各擅其論，終形成師說家派，故為道方法多歧以至於有「三千六百門」之異。可知德園子把此「道」提高至上古思想的層面，上古之時「道」本為一，上古以降才形成百家之歧，故其析論《老子》「竊以闡唐虞之心法，即以證儒道之同源」。<sup>14</sup>也就是欲藉《老》學的耑門，而得以窺探上古學心法，由此亦可進一步證明「儒道同源」，而導出儒道會通的結論。再次，德園子採取佛學的原因，其以為佛學亦合於上古道說，因此「顯示見前面目，單提向上，根宗涅槃，妙心拈花，便了少林大意，結果自然，固已同瞻水月之容，盡掃波旬之說矣。」<sup>15</sup>欲追溯上古道說，則援引佛學妙說亦為一途徑，所謂「同瞻水月之容」，也說明德園子認同佛學證「道」與道儒學說是有相近的。德園子舉《老子》「江

11 蕭天石：《諸子概說與書目提問》收入《中國子學名著集成》（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委員會，1978年），第一冊，頁411-414。

12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1。

13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1。

14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2。

15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2。

海所能為百谷王」為喻，指出聖人體「道」虛懷若谷故能包容天下學問，所以「在乎上下前後四字，蓋取上下前後，并作一條命脈，隱示真空妙有，真人游息藏修之境。參此一條命脈，即可悟三教同歸之大本，達萬殊一貫之真宗。」<sup>16</sup>因此不論佛學的真真空妙有、道家的虛無、儒學的仁義皆可經由「心」的印證而契合為一，此因「道」能含蘊一切萬有，開出萬殊一理。晚清嚴復之探討《老》學，亦有此種「殊途同歸」指向，其《評點老子道德經》言「《老》謂之道，《周易》謂之太極，佛謂之自在，西哲謂之第一因，佛又謂之不二法門。萬化所由起訖，而學問之歸墟也。」<sup>17</sup>故「道」係萬有之開始，亦是學問欲探究的終極奧旨，此說與《道德經證》相近。故知晚清思想之論道儒佛會通者，德園子並非是獨一的，學者大抵由哲理的觀點而判斷，以論證三家學說之殊途同歸。

不過，比較《道德經證》說法與《老子》原文內容，德園子之三家會通亦有諸多曲解。如前所述，《道德經證》採道、佛、儒學會通以詮解《老子》，是乃德園子架構「道」論的方法，但畢竟《老子》文中仍有多處批評儒學德觀與仁義禮說，亦有諸多與佛學無關之思想。有鑑於此，則德園子為了附會其中理論，則開出一套詮解說法，以契合三家之脈絡，如解《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一段，則曰：

是必於尋常日用，……息息反觀，心心內照，……此聖人教人以禮制心之本意。……中成之功德為上義。義也者，太極一動所生之陽也。道家謂之真汞，世尊喻為曇花是也。此陽非陰中之陽，乃陽中之陽，此義非禮中之義，乃義中之義，故曰上義。即孟子所謂集義所生者也。<sup>18</sup>

誠如河上公注，則「上德」是一上古「大無上」、「無名號」之君德。其下則有「上仁」、「上義」、「上禮」，此三種德行依序遞減，故河上公說「言德衰而仁愛見也。言仁衰而分義明也。」<sup>19</sup>實呼應了《老子》以「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的論說，因此上仁上義上禮相對於「道」是含有貶義的。<sup>20</sup>道家之「道」以虛損為處世的姿態，故以無為消化一切有為。不過德園子為了對三家思想進行會通，則忽視了「道」、「德」遞減之義，反而認為「上仁」、「上義」、「上禮」是進道的「三成功程」，其以為「上禮」是「小成之功德」，能盡上禮即符合《禮經》的「毋不敬」，也同於先聖「以禮制心」之意。「上義」則如同太極生動的一「陽」、道家的「真汞」，亦符合佛千年降世的曇花祥瑞。德園子以《孟子》的「四端之心」應和之，也可見其提高《老子》所謂「上義」的形而上層次，認為是可以與無上之「道」相銜接。《道德經證》解《老子》「絕聖棄智」一段亦然，其曰「聖智者，大成之用。仁義者，中成之用巧利者。……言此三者，皆道之

16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31。

17 嚴復：《評點老子道德經》（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頁23。

18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1-2。

19 河上公：《老子道德經注》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第八冊，卷下，頁1。

20 《老子道德經注》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第八冊，卷下，頁12。

文，尙非盡善。……三成功畢，前此巧利仁義聖智之用，皆可棄矣。」<sup>21</sup>此說以爲聖智仁義是成聖的中間過程，雖仍不完美，但卻是證「道」的必須途徑，故爲「道之文」，之後功畢此三種過程便可忘棄。不過按《老子》原意，對於聖智、仁義雖偶有褒辭，但大體是採取否定態度，而非視爲「道」圓融下的德性，畢竟道以「沖虛」爲用，而「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下德」係有爲之作爲。<sup>22</sup>從此說上仁上義之說固然爲人爲德行的極致，但與虛、損無涉，故德園子欲結合道、儒家思想，而刻意抬高屬於儒學的聖、智、仁、義於道說地位是顯明的。總而言之，德園子的三家會通學說固然是消弭了道、釋、儒學的部份思想歧異，但所折衷之內容是否能盡合《老子》原意，此實有待更多之論證了。

## 二、著重金丹道術之修煉旨趣

再次，《道德經證》亦大量援用丹術方法論證「道」說。據蕭天石先生對於《老》學「丹道派」的解釋，其曰：「此派以煉養身心，雙修性命，溷合陰陽，混一人天，而極於聖功神話，羽化登真爲本旨。」<sup>23</sup>「丹道派」是採取道家哲理作爲其丹術之內容旨要，不過其中所論述的服食、修持之術實近於神仙之術，也就是欲藉丹藥之效用而大化、登仙，《史記》載有秦代方士說秦皇以求仙藥，謂：「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然后不死之藥殆可得也。」<sup>24</sup>此論「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實出於《莊子》，也可見秦漢方士的服食求仙說法，其接引道家思想是其來有自的。蓋《莊子》文中所謂「真人」、「神人」等範疇，也因有不可思議神通成爲後世神仙術所論述的對象。

所謂「金丹」又有「內丹」、「外丹」之分。「外丹」爲實質藥物，須以高溫爐火結合諸多金屬調配，古代道士以爲外服丹藥亦可成仙，與天地同度。宋代道教著作《雲笈七籤》云：「寒山子至訣云：『但悟鉛真，藥必自神；但記汞正，藥如自聖。修之合聖，天地同慶。得因師傳，爲道之經。』」所以古之聖人，不直言之愚，容易託之《周易》，寄之五行，合之符契，真仙之理，莫若大丹之神歟！大凡人間之大丹。」<sup>25</sup>故「外丹」之結構乃鉛、汞等金屬物質，再輔以石灰、石礬、水、火以鍛煉，亦必須契合於陰陽、五行的理論，故能成仙便是與天地齊等。《雲笈七籤》專立「金丹」一部，以十一卷的內容論述其中思想要旨、修持方法，可知「金丹」一物乃爲古之方士重視，《雲笈七籤》作爲一闡述道教思想之著作有濃厚之宗教色彩，後被收入於《道藏》之中爲道教奉爲經典，故所立「金丹」之論也大概爲道教所承認。

所謂「內丹」是以自我身心爲丹藥的修持方法，葛洪於《抱朴子·辨問》說：「惟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得合一藥，知守一養神之要，則長生。」<sup>26</sup>古人以

21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 22-23。

22 王弼注：《老子道德經》收入《新編諸子集成》（臺北，世界書局，1991 年），第三冊，頁 23。

23 《諸子概說與書目提問》收入《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第一冊，頁 413。

24 司馬遷：《史記》收入《百納本二十五史》（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一冊，頁 29。

25 張君房編：《雲笈七籤》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七十三，頁 11-12。

26 葛洪：《抱朴子》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四冊，頁 14。

爲服食外丹便能成仙，而以身心之修養亦可能達到與外丹同樣的效果，故「內丹」以提升精神境界爲主，以人身脾肺五臟相副，故外內丹理論上雖有物我的不同，其運用或可假借。總言之，「內丹」之學實與心性修養相干涉，誠如〈悟真篇原序〉所言：「追二氣于黃道，會三性于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sup>27</sup>陰陽、五行、四象之意象可能是一種借托隱喻，如何以心性冥契天地萬物之種種才爲要點，嚴遵演譯《道德經》也說「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體於神明，動作倫於太和，取捨合乎天心，神無所思，志無所慮，聰明玄遠，寂泊空虛，動若無形，靜若未生。」<sup>28</sup>所謂「性命同於自然」，也就是心性之修養可與萬物齊一，道家倡導自然無爲與天地併生，故內丹的心性鍛煉之論，亦合乎於道家之修養工夫。

德園子之解《老》學亦採取此內丹的修煉觀點，以爲修「道」與心性修養相關，修煉「金丹」的工夫方法亦可融入道家思想，則「丹」成「道」亦成，德園子解釋《老子》第九章「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便說：

道法之要，有以運行為用者。有以挹注爲用者，有以覺照爲用者。……有挹注，故有鼎爐器皿之喻焉。有覺照，故有元關神室之喻焉。器之體有形，器之用無形。<sup>29</sup>

體「道」的工夫各異，或運行著手，或從挹注添加著手，或覺悟觀照著手，但實殊途同歸。故不論器物與心性皆是以無爲體，以有爲用，故以修養工夫言，則人的身心便有如鼎爐器皿，是可以經水火悶煮澆淋而鍛煉，故人身心之功用與器鼎無異，外物既能煉成大羅仙丹，則身心與外物不二，經修煉後亦可達於同樣理境，故德園子的外丹理論方法確實可與內丹統一，此觀點也導出人的身心同於煉丹的器物。德園子解釋《老子》「持而盈之，不若其已」一段，便舉出宋代張伯端《悟真篇》的說法，以爲：

〈悟真篇〉詩云「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持盈宜已，謂水滿之易覆也。銳不可保，謂煉金之宜純也。金玉四句，總言工夫到此，金精充滿，水性周章，易蹈驕淫，難持久遠。<sup>30</sup>

張伯端其人具有神仙色彩，而《悟真篇》則爲煉丹專書，《四庫提要》言：「是書專明金丹之要，與魏伯陽《參同契》，道家並推爲正宗。」<sup>31</sup>故該書專明金丹之旨要是明確的，該書與《周易參同契》同調，大抵爲後世的方士皆奉爲金丹圭臬。而德園子論述其識見，以爲鍊丹如同盤水不能盈滿，一滿便會溢出而不能保久，此也合乎《老子》以沖虛爲用之說法。德園子曾爲修「道」與金丹之會通作一註解，其言：「昔孫教鸞師，以性功習靜歲餘，瑩澈幾先，自知非陽神沖舉之道。……如邵子之究心象數，程子則有所不屑。……蓋陰神技

27 張伯端撰、翁葆光注：《悟真篇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一千零六十一冊，子部，頁3。

28 嚴遵：《道德指歸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一千零五十五冊，頁3。

29 德園子：《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15。

30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11-12。

31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頁784。

兩，雖有靈通，未離鬼趣。即敲爻歌所謂『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sup>32</sup>以爲諸家體「道」之方法未必有效用，故如不能體現丹術之法，則不能入非常之道，因此德園子乃以「道之華，愚之始」貶斥歷來的修持之術。此也可見德園子之刻意抬高丹術理論的企圖，以爲非經煉丹而不能悟入正果。

又如其解《老子》「含德之厚，比之赤子」一段，也提出「金液」、「玉液」之詮說，其云：「上章言玉液，此章言金液。玉液者，復性之功，金液者，延命之術，金液視玉液，德厚加矣。」<sup>33</sup>此以爲「玉液」乃是返原心性本真的作用，「金液」則指修身養命之術，二者皆有所得，便如同內含深厚德性的真人，是內外不侵的，蓋德園子乃以老子思想的「知常」、「益生」比附此二觀念可證。「金液」、「玉液」爲丹術之書所常用的詞語，德園子此說大體是由外丹嫁接內丹的一種說法，也就是把外服丹藥的作用引譬至心性的涵養。所謂「玉液」實有其物，如《本草綱目》之詮解「白玉髓」一味便以爲是「玉液」，李時珍云：「別錄曰：『生藍田玉石間。』時珍曰，此即玉膏也。別本以爲玉泉者是矣。……《山海經》云『密山上多丹木，……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剛天地鬼神是食、是嚮。君子服之，以禦不祥。』」<sup>34</sup>故「玉液」本指晶石一類，外形淺白透光，爲礦物物質，從《本草綱目》、《山海經》的線索可知，古人用以服食或饗祭神明，以爲服食這種玉石可以長生不死，甚至成仙。「成仙」之說爲古代修道之士所認同，如《太上虛無自然本起經》：「和合天地日月陰陽，雌雄魂魄之精炁以養真人。……夫真人者，有形景，屬天爲吏，壽歲有萬數。……天上壽盡，便或上補神人。」<sup>35</sup>此也把成仙的途徑與「修煉」、「真人」、「神人」作一聯繫，也可說經由服食丹藥與修煉或能達到神仙意境。故德園子謂玉液有「復性之功」，這種結合內在心性與外在金丹的理論，也可證明其欲調和心性與丹術的學說企圖。

### 參、《道德經證》以佛解老的唯心道論

如前所說，《道德經證》乃大量援用佛學、金丹的識見，此即德園子爲詮說《老子》之「道」，所開出道釋、金丹會通的義理方法。而德園子以大乘佛學、禪宗思想來解釋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之同源亦爲明確，此也處理了《老子》書中以「無爲」消弭一切「有爲」的特殊意義，故其運用道佛會通的詮解，也成爲該書重要理論。德園子承認一至高無上之「道」，而天地萬有皆爲「道」所出，屬於天地萬有一隅的「人」，亦可經過修養工夫，契合「道」化，同歸大通，此即道心人心同歸之說，蓋德園子的《老》學思想可由此開出三個方向，第一是爲論說「道」本體之狀態與規模，再次則論述天地萬有歸屬問題，此兩種範疇德園子大抵運用道佛會通、道儒會通之理念論說之，如《老》學之「物」、「大」、「道」、天地，《易》的太極、陰陽，佛學之真空妙有、頑空皆有干涉；第三是爲詮

32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3。

33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20。

34 李時珍：《本草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七百七十二冊，卷八，頁51-52。

35 佚名：《老君太上虛無自然本起經》收入《道藏精華》（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冊，頁4-5。

解人之心性論與修養工夫的問題，德園子釋《老子》二十三章言：「無形先有形，故曰先天地生。……返者，返諸吾身之虛，以合太虛之虛也。」<sup>36</sup>故以為心性如經過涵養，亦能超越形氣之拘，返諸「太虛」之真。本文以為，《道德經證》之論說「道」之本體、「道」之象狀、為「道」之工夫，皆有滲入佛學思維，其雖旁以金丹之法辨證，但藉佛學所析論的唯心觀點，可視為其學說的重要樞紐，如下。

## 一、攝入大乘空、有法門的無為、有為論說

《老子》首章即開出「有」、「無」之問題，「有」係天地之母，是萬物化生之規則，所謂「無」則為天地之本始，「有」、「無」同出異名，是為《老子》本體「道」思想的重要範疇。德園子則採取道、佛合流的理路欲消化《老子》有、無之說。從《老子》原文可知，其大抵有數說以「有」、「無」的組合方式辨證「道」與「道」規範下的現象世界，如《老子》第二章「有無相生」、第十一章「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皆然，不過固然「有」、「無」之觀念在文字上形成對比，然《老》學實以無為本，故有與無之概念並非相對，而是相反相成，王弼《老子注》也以「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為論說。<sup>37</sup>「有」是「徼」是規則，「無」是純粹虛空之本質，此直以「無」而規範「有」，故一切「有」的根本仍不違於「無」（規則或萬物皆然），「無」既是本源，故無、無為的範疇也能通達上溯於「道」。

道無所不在，道生萬物且規範萬物，故以其「虛」、「無為」的作用來說，「無為」仍是規範「有為」，乃至一切經驗事物，故《老子》說「為無為，而無不治」，此也說明「道」之作用變現於萬有之中，實能以「無為」規定之，故無所不為。<sup>38</sup>勞思光先生視「無為」係《老子》對「道」的反證，一切萬有「悉在變逝之中；每一事物皆無實性」。<sup>39</sup>因此如何尋求萬有之外的真實性，則經過「無為」以至於「道」的論證，便是對萬物「有」的檢視，《老子》第三十七章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蓋「無為」的作用大矣，亦對應於天地萬物之「有為」。勞先生又說：「何以謂『無為而無不為』，蓋言自覺心駐於無為，乃成主宰；而如此之主宰將可在經驗界中發揮支配力量，而獲致經驗效果。」<sup>40</sup>「無為」而「無不為」，其中以損、虛工夫而通貫於「道」的層次，故「無為」乃有超越之意義可知。蓋「無為」係「道」所變現的姿態，因此由「有為→無為→無不為」的架構論證，即充份說明《老子》道化的作用之廣大，蓋《老》學對於超越義之「有」、「無」，乃落於經驗界之「有為」，與超驗之「無為」範疇。故基於此採取「相反相成」的觀照，此即《老》學「返」、「逝」學說之用義。<sup>41</sup>

36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 29-30。

37 《老子道德經注》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頁 25。

38 《老子道德經注》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頁 2。

39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9 年），第一冊，頁 241。

40 《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頁 244。

41 「相反相成」係勞思光所提出對超驗之「道」與經驗「天地」如何統合的辨證觀點，也就是說「反」，「反」即「返」，係形而上的「道」所賦予經驗世界的循環交變的規律，故「道」超越了經驗，但又不遠離於經驗。見《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頁 239-240。

德園子亦由「以佛解老」詮解《老》學之道說，其論析《老子》的有無、有為無為，並且尋求中觀之教法來說明一切出世間法的常與世間法的不真，此也處理了《老》學形而上的「無」與經驗層次的「有為」。德園子認為天地萬物所衍生與化生皆在「有為」，「有為」的層次既非終極了義，故可援用佛學之妙意來窺探其真實。如《老子》第二章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sup>42</sup>此以有無、美惡、難易等相對觀念理解天下之事，故有、無之意境實屬經驗層次之「有為」可知。《老子》該說有二義可留意，正面而言，以「無為」治世的態度則體現了聖人因循「道」的「常德」，故聖人立身處事並不違「道」。而另一層意義，則述說了天地間充斥諸多「不常」的相對事物，故美惡、是非、難易、有無兩相對比，萬物參贊其中而有損益得失，故並非為一圓滿的完美世界。準此，德園子則以道、佛會通來破斥此「有為」世界的虛妄：

陽乃往和，性情自然，則前後相隨之旨也。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總一真陰陽真父母而已。至夢幻泡影露電，乃是西來大意。今既引佛證道，並附皮解，與同志參之。《洞古經》云「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夫夢幻為無中之覺，……若夫如電者，則有為之終，無為之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頓法也。<sup>43</sup>

蓋德園子此說乃以「總一真陰陽真父母」，來闡釋現象界的種種相對矛盾，而所謂陰陽、父母之上，仍有高於一切現象的太極與道，此實採取《周易》形上、形下之觀點，因此「先儒所謂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中妙」<sup>44</sup>超越動、靜者，才是妙中之妙，而落於動、靜者，係天地之範圍也。此也說明天地所體現的剛柔動靜高卑貴賤，乃是「道」作用於現象界所衍生的諸多相對狀態，〈繫辭〉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sup>45</sup>有柔剛之作用，則衍生出吉凶之相對，故在乾坤陰陽之上仍需有一消弭萬物損益得失之「太極」。德園子於此以金剛四句偈來理解此虛幻，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概即有為之法，而擬其形容，與經所言有無相生，難易相成等語，非有二義」<sup>46</sup>故其「引佛證道」之用意不異是欲理解氣化陰陽的現象是不真實的，而唯有使「有為」遁入「無為」的矩矱，視虛幻為空才能凸顯出真常之「道」，故其視「無為之始」為「涅槃妙心」正是此理。從此說，則德園子所認同這種有為、無為之意涵可與禪宗的教法作銜接。如《六祖壇經》論禪性之非有無住，以為：「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

42 《老子道德經注》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頁1-2。

43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4。

44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8。

45 孔穎達正義：《周義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第一冊，頁143。

46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3-4。



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sup>47</sup>以爲六塵非有實象，故五蘊本空，是以禪悟的精神也指向不拘執，這種初步把「無住」銜接「禪性」的作法，也表明禪宗的無所有（無住）意境是可直達最終極之哲理。

再次，中觀之學對於「無爲」亦有慎密論說。龍樹《中論》破斥萬有之非，故特意羅列俗、空二諦，以爲萬有皆「因緣」生，故爲假有虛幻，假有非真則有空義，因此從認識上便可與有爲、無爲相溝通，龍樹《中論·觀因緣品第一》言：「有爲、無爲等諸法相，入於法性，一切皆空。」<sup>48</sup>此也導出一切有爲法、無爲法之法相，皆是因緣流轉所派生的空，遂不真實。不過這邊的「無爲法」仍可再作進一步解釋，吉藏《中觀論疏·觀六種品第五》言：「一切處無有者，此中明無，是體相無。……有二法攝一切法，一有爲法，二無爲法。有爲法以生住滅爲相，無爲法以無生住滅爲相。此二既各有相，是故有法。虛空若無相，則非有爲，亦非無爲，即無有法。」<sup>49</sup>吉藏認爲在有爲法與無爲法之外，又有一「無有法」，「無有法」不執於任何法相，故能超越有爲法與無爲法，而能達到「無有法」即是涅槃的層次。或說「無爲法」有所謂六無爲，而其中「眞如無爲」適爲達到「無有」之境。此「無有法」與「眞如無爲」大抵即是德園子道佛會通意義下所辨證的「無爲」。簡言之，德園子對於有、無之論雖沒有禪宗與龍樹解釋來得精密明確，然以一無爲法爲指向，大致上是合乎道家與大乘佛學的思路。

而《老》學之「有爲」終由「無爲」所規定，此蓋老子以爲萬有皆不能離於「道」，德園子亦云：「此恐學者不知有爲之事，仍屬無爲，而有所造作執著也。故復言此，作者，興起也。謂興起萬物而不辭勞也。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成功不居，皆無爲之實際。言其相生相成相形，……亦自然而然。……言其合體太虛，能後天地而存也。」<sup>50</sup>認同天地諸多「有爲」之事，其本質上仍是不違離「無爲」，故天地萬物乃能合體太虛，以是「道」功能的廣大精微，萬有事物無不含括。從禪學而說，這種把萬法之有歸於「無」，即表明一切唯心的意趣，如《六祖壇經》曰：「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sup>51</sup>此實把萬有一切皆歸於無住之本心了。總言之，大乘佛學雖然判一切諸法現象爲虛妄，但也認爲其背後有一實質的眞如存在，故禪宗以如如之心作爲萬法根本，而華嚴法界能收攝一切有、無亦是此義。至於德園子如何建構萬有世界之外的常「道」，且如何闡述道心與人心之別，此與佛學亦有干涉，見下節。

## 二、以佛性爲詮說的唯心「道」論

《老子》之論述「心」唯有數言，大抵有五個章節嘗提及，不過依其原文可知，《老子》所論說的「心」義，實偏於意識認知的範疇，亦可說是一種「氣心」。誠如《老子》

47 法海集：《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4年），第四十八冊，諸宗部五，頁357。

48 龍樹：《中論》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十冊，中觀部，頁3。

49 吉藏：《中觀論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4年），頁160。

50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4-5。

5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八冊，諸宗部五，頁350。

第五十五章所言「心使氣曰強」<sup>52</sup>「心」以知覺使運氣勢，而造成外在形式的強弱，故此「心」實不能理解為一形而上的自覺心性，《老子》固然也認同主體沖虛為萬有減損後之應對，確不突出字面上「心」的定義，可知這種對氣心的驅使並非是《老》學的核心思想。

德園子《道德經證》則採取以佛解老為詮說「道」之方法，且為了契合其金丹修煉的架構，故著重對「心」的析論，其參考孟子的心性思想，亦援取佛學的佛性與禪宗之說，強調通過主觀心性的修持，可使得「道」與人心有一聯繫管道，故說「道心」與「人心」契合。其解《老子》「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云：

虛心者，養性之事。實復者，立命之事。……契云：內以養己，安靜虛無，虛心也。三光陸沈，溫養子孫，實腹也。虛心之至為真空，實腹之至為妙有，非真空無妙有，……此性命雙修之道，聖人治心之學也。<sup>53</sup>

《老子》此段蓋論述治民之法，故其詮說對象應為人民，而非是專論「治心」，案後文有「常使民無知、無欲」可知。不過德園子為了開展其心性工夫方法則視該說為治心之學，把老子的「虛心」、「實腹」視為「真空妙有」，而虛心的說法也成為證道的工夫。又德園子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一段，又說「不仁，猶云無心。……天地以生理為心，生物而不私於物。聖人以道心為心」<sup>54</sup>無心不仁此蓋天地效法自然與道的態度，因此天地萬物依據道的作用而有道心，聖人順此無為之心以治民，則聖人之心便能等同道心，亦可以無為的姿態觀照有為，則《道德經證》所論說的「心」乃指向一唯心的意境，德園子引《悟真篇》言「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十方通塞中，真心無不徧。若生知識解，卻成顛倒見，睹境能無心，始見菩提面」<sup>55</sup>見物是為見心，以無心冥契萬有之無，則能凸顯真理的實相，故始見菩提心，因此上溯心性以至於無所有，終可得理解無上正覺。此說也把《老子》的涵養工夫論，與先秦儒學的心性論、佛學的心法做一聯結。

事實上，德園子這種闡述有、無相生之「道」，而終收歸一心的學說亦有其前例。佛學之大乘空宗以證「空」為第一，此「空」論所破斥的有、無，則導向一真如實相，或說此實相亦可由「真如心」所舍括。牟宗三先生以為龍樹的《中論》唯說「性起緣空」，但經由「法空」之辨證而說，「唯心」亦有成立之可能，云：

龍樹《中論》總之以「緣起性空」，法就是緣起法，法空就是緣起法之無自性，以空為性。「緣起性空」而說諸法不生不滅，……此即是其實相一相所謂無相，亦不立唯心。但通過唯識，進而說唯心—唯一真心，亦無不可。……此平常心亦即是一種般若智心也。實相般若即是心真如也。<sup>56</sup>

52 《老子道德經注》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頁34。

53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5。

54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7。

55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7。

56 牟宗三：《般若與佛性》（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77年），上冊，頁456。

「實相」與「唯心」並非無涉，因此由破斥因緣、虛妄言，則「法空→唯心」始可成立。至於其方法之關鍵便是這種對有、無的論證，屬於萬有之法落入非有真空，此為般若實相的凸顯，而法的空如無性可繫於真如心，故牟先生說那是「心法不二」或「色心不二」。<sup>57</sup> 德園子《道德經證》所援用佛學解老的要義亦大抵在於此心法合，其解《老子》第十八章採取《清靜經》言：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又云：真常應物，真常得性，此云得性，佛云見性。<sup>58</sup>

有形之破斥而見無形，有物的消弭而至於無「物」，「空」之實相即通達於「道」，雖老子以為「道」可為「物」，而「物」混成而先天地生，然德園子則進一步使「道」與心性合，故道心可由人心顯，此與佛性之說亦無別。德園子採取儒學「格物」的說法以為：「〈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聖人之道，盡一性字，故孔子言性道。……格物之物，蓋指性言也。」<sup>59</sup> 此即儒學盡心知性知天之說，由格物盡性，則人心乃可進一步契合天道，故道心與人心合。從三家會通的意趣言，則道心能同於人心，終亦與佛性無別，故「道」的範疇乃能由佛學的一切唯心通貫。從此說，《道德經證》「見物便見心」的觀點，與大乘佛學的脈絡也是相近的。

屬於大乘初階的中觀之學大抵是以法空為要，然其破斥有、無之論也使得真常唯心的觀點得以開展，從大乘空宗乃至後來的法華、華嚴與《大乘起信論》，皆承認一心的功能。真常一系乃中國佛學重要之發展，部份學說也影響稍後流行的禪宗，真常一系專立一如來佛性用以詮解真如心，該說亦闡述有、無兩相不違離，可由一心總攝。而禪宗也承認一「心」的功用，唐代弘忍以為：「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sup>60</sup> 此認同一切有為法、無為法都由一心所收攝，因此「如如之心，即是真實」，既然真如本心為一切法的源起，當以本心的映證為真實。《大乘起信論》的「一心開二門」則以生滅門、真如門闡述一切有為法、無為法，故真常之教與《老》學之有、無或有契合處，吳怡在《新譯老子解義》言：「『無』是稱呼向上對本源的探索，而『有』乃是向前在事物上的開展。如果用《大乘起信論》的一心開二門來借譬，『無』相當於真如門，『有』相當於生滅門。不過老子的『有』比生滅門更為積極，應該稱為『生化門』。」<sup>61</sup> 此說有二要點，一者，《大乘起信論》的真常之心或可視為道心；第二，「道」能含攝有、無，正如真常心可開二種門，故屬於主觀的真如佛性系統，亦可與客觀的「道」統一，或說佛性與道心為一。蓋真常心能總攝、生起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其「真如門」所開在於破斥雜染所體現的無有，是為恆常不變的真如實相，「生滅

57 《般若與佛性》，上冊，頁 456。

58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 24。

59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 30。

60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十五冊，諸宗部五，頁 348。

61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臺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5。

門」則指向一「阿賴耶識」的造作，故從「有」的趨向而說，則一切萬法皆是心識的功用所致了。《大乘起信論》云「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賴耶識。此識有兩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sup>62</sup>「阿賴耶識」為生起一切淨染的根源，一切有為、無為需經此心識而「有」，「阿賴耶識」於《大乘起信論》需歸屬於真常心，牟先生說：「所以阿賴耶必須統屬於如來藏，……如來真心並不直接緣起生死流轉，直接緣起的是阿賴耶。」<sup>63</sup>「阿賴耶識」乃為如來佛性所藏，是以「阿賴耶識」可視為聯絡真常心與一切法的樞紐，既然此阿賴耶識（生滅心）能生起一切萬有，包含一切雜染，則如何泯除一切有為亦在於「心」。德園子以「元神」、「識神」論說心境修養，此與《大乘起信論》近切，其言：

《悟真篇》云「一物含聞見覺知，蓋諸塵境顯其機。」……聞見覺知，指識神。靈常一物，指元神。境者，識神之境。機者，元神之機。<sup>64</sup>言當識神境滅，元神機顯，尤必煉神化虛，則識神無所憑依，而不復施其技倆矣。<sup>64</sup>

據《悟真篇》可知，諸塵境的種種須有賴一物（識神）而能開展。而「識神」的功能在於聞見覺知，或說包含了心識之認知與功能，能緣起一切法，故與阿賴耶識有相近之處。而為了體現此「元神」本來面貌，則必須經由修煉以至於一切感知認識境滅才有可能，也就是「煉神化虛」，「煉神化虛」為通貫「識神→元神」，此即是體「道」過程，此「元神」或說是近真常心。總上而論，則德園子《老》學的「道」，乃可由一唯心脈絡論說，則道心與佛性實不違離。至於德園子如何析論此「煉神化虛」的修養，則可從其融通道、佛與金丹的工夫論說，見下節。

### 三、融通道、佛、金丹的修養工夫

認同金丹與道家思想相契者，歷來的金丹之著作論如《抱朴子》、《雲笈七籤》、《悟真篇》皆有提及，且受到道教思想影響，其金丹修煉的最高理境則指向無為、無欲甚至能長生不死，有駕馭鬼神的超凡能力，此乃直能比擬於得道的真人、神人，故不論位入仙班的大羅金仙或今古上仙，大抵亦有道家思想的渲染。《悟真篇》云「道德靈文止五千，今古上仙無限數，盡從此處達真詮。」<sup>65</sup>此也可映證《道德經》係金丹思想所著重的重要典籍。晚清黃裳著《道德經講義》也以金丹法術比附於道家之學，其以為內丹的修養氣度與修道無異，言：

學人到得真玄真牝，一升一降，此間之氣，凝而為性，發而為情。……其曰綿綿若存者，明調養必久，而胎息乃能發動也。……人能順天地自然之道，則金丹得矣。<sup>66</sup>

62 馬鳴著、真諦譯：《大乘起信論》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十二冊，論集部，頁 585。

63 《般若與佛性》，上冊，頁 460。

64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 35。

65 《悟真篇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零六十一冊，子部，卷中，頁 61。

66 黃裳：《道德經講義》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第九函，卷一，頁 10。

由吐納調氣轉以涵養性情，內丹的矩矱便是在於養氣、致虛之事。因此人能「順天地自然之道」與萬物齊同，此與老子的守「一」為天下式異曲同工，故融通金丹與道家思想為一，則得服金丹亦同於「道」。從此來看，以金丹之學會通道家者，其大體有幾個方向可注意，第一，會通金丹與道家的修煉工夫，較接近內丹的法門，與外丹的外服金液還丹仍有不同；第二，內丹著重心性修養工夫，其吐納養氣是以道家的守靜、致虛為界說，故其心性修養工夫可與道家思想作一聯繫。

同樣的，德園子所認同的金丹之學也近於內丹，故能以心性修養的範疇論述之。而德園子之調和先秦《老》學與的虛損與內丹的靜心、養氣工夫，亦能從佛學的概念加以開出，其對於道家、佛學工夫與金丹的貫通，嘗理出「守靜」、「致虛」的概念，言：

《悟真篇》云：「調和鉛汞要成丹，大小無傷兩國全。」烹鮮者，調和之謂，鬼以喻陰，人以喻陽。神者，陰中之陽。聖人者，陽中之陽，言陰陽調和，不相傷而相交也。……以靜為下者，言此陰陽交感之道，貴乎守雌，守雌而陽自歸之，故常須用靜而居下也。<sup>67</sup>

老子以為萬物抱陽負陰，以沖氣為和協，而致虛、守靜則能達到對萬物運作的「觀」，以至於歸根、復命同於道化。德園子此說也採取《老》學的趨向，其以金丹的鉛汞為譬（鉛汞為材料），以為這種調和陰陽之說應「用靜而居下」，主「靜」便能以靜致動而達到「觀」的層次，也就是由清靜心觀陰、陽交感，以至於萬物平衡的狀態，天地陰陽範疇能與心性統一，此也把心靈之沖虛無為提高至萬物無礙的層次。因此，德園子以為金丹之煉成其關鍵在於能不能當下由心致「虛」，故又說「屈子所謂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也。……直指大丹火候，……皆當為之於未有。」<sup>68</sup>致「虛」、無為的態度在於能涵養精神，此可直比於煉丹之火候，故心性的沖、虛工夫與金丹之功便可一致，德園子又引佛學解釋說：

肖者，想像之謂。非比擬之謂。大不可肖者，謂虛空之不可以想像窮也。以修為次第言之。始則自細而大，繼則自大而細，終則細而又細，以至於無。則太極而非想像之所能窮矣。佛說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是此章之了義也。<sup>69</sup>

萬象由細小而無限大，此為天地間萬物層層累進的現象無庸置疑。然心性修為則以無限大而減損之，小之又小，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如以「火候」喻之，誠是一種涵養心性而致「虛」的作用。以佛學而論，則同於排遣空、有二執之修為，故德園子以為這種心靈層次的「虛空」也如同佛學所言「微空」一般，終以對因緣的破斥而由「無有」所收攝，也就是「金木交而妙用入微也。……五行全而萬法統於無法，世尊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67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 24。

68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 28-29。

69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 30。

也。至此，則常清靜。」<sup>70</sup>此全然把現象界之有，歸攝於心性之無、虛空，蓋「無法可說」故由一心所總結，以是能常清靜故。因此，不論致虛或清靜皆與心性干涉，佛以證空、心寂靜、身寂靜而遠離貪嗔癡諸煩惱，此與金丹「火候」的思路是近切的。《雲笈七籤》第六十六卷所云鉛汞之說，亦可為此種心性工夫作一註腳，曰「神仙妙難測，鉛汞人不識，鉛汞天地精，陰陽天地力，……心靈藥自靈，心迷藥難測，至道至心虛，玄中妙難悉，智者得宗源，他年致雲翼。」<sup>71</sup>還丹之成在於心靈的透澈，不迷不執以至於空靈心虛，便可與天地之精參贊。由心性契悟天地陰陽之精要，再進一步上溯於至虛妙道，此乃金丹結合道、佛心性思想之梗概。

西方心理學家榮格也以佛學之曼荼羅解釋煉丹術的思想內涵，其所著《金花的秘密》則以中國的煉丹書《太乙金華宗旨》為範本，論說「性」（心性）、「命」（生命之整體）的一體關係，故該書實表達了丹術、佛學、道家與潛意識之思想本質與其工夫方法的融通。《金花的秘密》言：

我們寫《金花的秘密》一書，就是要揭示《太乙金華宗旨》中的奧秘。金華是光，而天光是道。金華是一個曼荼羅，……萬物起源於潛意識海底的黑暗之中，那時萬物還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竅裡，意識與生命（性命）本是一個整體，「似爐火中之火種」。夫「竅裡內有君火」，「凡聖由此而起」。請注意火的比喻，……火燄穿透種子助其成長，形成一朵碩大的金花。<sup>72</sup>

榮格亦強調「火」的作用，其以為在煉金術（所煉為金花）的過程中，「火」能夠作為輔助的功能幫助「種子」成長，而這種「火」可視為一種鍛煉的條件，其目的在於能契悟「金花」，也就是曼荼羅圖所呈現的整體，曼荼羅圖所凸顯的種種名相如同天地間的淨法與染法，而其整體又是一種被曼荼羅花所含蓋的圓融，因此真空與假有不二，佛學所理解的中道觀亦可由此析論。德園子嘗說「種子」之意義，言：「有情來下種，以情為種也。因地果還生，以性為果也。無情無種。」<sup>73</sup>有情之種生成有情之果，故所種為種善其果也善，德園子以為成道之「明心見性」，所依據也在於原「種子」之保有，而此種子能否成就「金丹」，則須通過工夫的提煉，故「種子」之意象乃為心性本質存在之證明，「火」的意象係此工夫論之提煉要點。

榮格也指出金花是曼荼羅是光亦是「道」，可知其所謂「火」的範疇實同於金丹術的「火候」，「火」有烹蒸與照亮的功能，在鍛煉的過程中可以凸顯金花的本然真性，其功用與德園子所掌握以爐火鍛煉鉛汞的指向是為一不二的，德園子言提煉「金液大丹」功夫：「挫銳者，以火煉金之時；解紛者，止火留金之候。而修命之功亦完矣。」<sup>74</sup>此亦視「火」

70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10。

71 張君房編：《雲笈七籤》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零六十冊，子部，卷六十六，頁12。

72 衛禮賢、榮格：《金花的秘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頁40。

73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41。

74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21。

有催化輔助「金丹」之功能，「火」之動靜也成爲「金丹」熟成與否的重要指標，又以爲「符火抽添」，有「運行調停之妙」，此也論說了「火」作用之溫烈決定了「金丹」的實質。<sup>75</sup>榮格又說明這種「火」照耀金花的意象內涵，曰：「這種象徵指的是一種提煉和升華的煉金術過程。黑暗給了光明生命，在『水鄉鉛』中生長出高貴的金子；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那些潛意識的東西變成意識的。通過這種方式，性與命聯結成爲一個整體。」<sup>76</sup>「火」作爲照耀功用，此即《太乙金華宗旨》所說的「回光」。「火」能反轉「黑暗」的種種趨勢而成就真實的「金華」，在此鍛煉的過程中，性與命如同鉛汞的調和而能圓融爲一體，並呈現出「道」的情微，故「性」與「命」的實質即是「道」，「道」之所以顯明亦是必須經過淬鍊的，如同爐火下的金丹一般。

再次，德園子之詮解《老子》「上德不德」一章，又以三家思想、金丹舉出成道的三成功程與佛學有所聯繫。其解釋「大成功程」的「上仁」，在於復歸心性之虛、無，故由「上仁」進「道」的過程，如同「牟尼寶珠」，是能薰習清淨佛法，曰：

大成之工程爲上仁。仁也者，太極渾全之體也。道家謂之黍米之珠，佛家謂之牟尼寶珠是也。斯時也。有無俱不立，色空兩無倚煉，虛之境也。故曰上仁。虛而曰煉，故曰爲之，煉而曰虛，故無以爲也。復聖心齋坐忘，初祖九年而壁，殆其候歟。由是可進於上德之無爲。<sup>77</sup>

所謂三成功程係老子所提出上禮、上義、上仁的範疇，德園子認爲這三個階段是一種遞損的結果，也是進德修道工夫所在，而之所以能減損，則在於有爲、無爲趨向之間的轉化。德園子大體把上仁解釋爲佛家的牟尼寶珠，《法華經》云：「又見具戒，威儀無缺，淨如寶珠，以求佛道。」<sup>78</sup>此視「寶珠」爲清淨法的展現，在修持過程之中，需以淨法（佛法）加諸於身心，進以尋求佛道的映證。以其過程而言，在層層的減損、破斥之下，則遮詮出無、色空兩相不對立，因此其在修煉的進路上乃能得聞究極的「上德之無爲」。《大寶積經》說此「寶珠」且「千金剛破終不可壞」，言：「忽然值遇如意寶珠。彼人得珠，執已所造如意，即得稱成樓觀池臺，……皆悉如心自然化作。」<sup>79</sup>所造如意且自然化作故能金剛不壞，如意寶珠之喻也極近切「金丹」提煉，皆指向一超越的不壞不滅之果。德園子嘗援用佛典解釋此「果」，其引《六祖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sup>80</sup>此把「明心見性」比喻爲善「果」，蓋由心地的開悟所得清淨心，此果亦合於終極的理趣。

從此說，德園子乃認同「虛」、「無」爲近道之理境，由「煉」而「虛」，故是一無以爲的工夫，也就是「無爲」，這種集鍛煉、清淨、空虛的概念，其以爲實呼應佛學、金

75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46。

76 《金花的秘密》，頁40-41。

77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二，頁2。

78 鳩羅摩什譯：《妙法蓮華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九冊，法華部，卷一，頁3。

79 《大寶積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一冊，寶積部，卷一百一十，頁620。

80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41。

丹之術的修養工夫，也就是如佛學所言的「常在」、「無垢」、「不老」、「不死」，此也論證《道德經證》所採取的解《老》方法。

## 肆、小結

綜上而論，德園子其人雖不名顯於當世，然其《道德經證》著作實寄寓豐富的義理思想，而融通道釋、金丹之學的識見也開出晚清諸子學之新意，其說法或未必盡能完善，或有曲解道、釋工夫論之嫌疑，其對於道釋之會通，與金丹之析辨則全然以己意論說，不過其觀點於晚清思想自成一家，故仍有諸多可留意處。本文以為德園子之論說有詮解方法、本體心性與工夫論說上之價值意義。

詮解方法上，德園子採取儒佛、道佛會通之方式，其重新詮釋道、佛哲理之意義，此凸顯出諸家思想可合流的觀點，也就是「其話經也。意在衷諸淺近，道文學皆可會通」的學術視野。<sup>81</sup>故在這種道、釋、金丹會通的意趣下，其論說對於《老》學本體思想與工夫方法皆有新說。在本體論上，《道德經證》以為道家之「道」、《周易》的「太極」、佛學的真如有近切的論說，故是可進一步貫通，此對於《老》學哲理的闡發是有所創新的。而受到佛道思想會通的影響，歷來學者以為《老》學有、無、清、虛的範疇，是可與佛學意境作一比附，德園子則從唯心道論的觀點進一步論說《老》學的道心與佛學「真如心」的聯繫，因此道佛的清虛無為與真空妙有皆為「道」的狀態，此把一切萬法都視為道心的體現，也開出了道佛思想皆可由一心所收攝的思路。

再次，在宗教學意義上，德園子也以為道家之真人、神人，與道教神仙，佛學宗教意義上的佛、菩薩也有溝通可能，此也呼應晚清部份佛學研究者的識見，如王闈運《莊子內篇注》、楊文會著《老子發隱》、《南華經發隱》，黃裳著《道德經講義》皆有此論說，固然譚嗣同不喜道家之老莊，然其《仁學》乃以佛、孔為「能為仁之元而神於無者」<sup>82</sup>又說「極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經諸子百家，……無不異量而兼容，殊條而共貫」<sup>83</sup>也可知譚氏是有兼容諸佛聖賢諸子學說的觀點，而以孔教之大同為依歸。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亦云：「僧者何？凡以求學佛者也。道者何？凡以求學仙者也。……功德圓滿乃能成佛，未易悉數也。仙之宗旨，大同小異，亦有頓漸之分，三乘之別」<sup>84</sup>或以為成佛與求仙有密切脈絡，兩者之的鵠皆在於「絕欲離塵」且「長生不老」，而求得一超越世俗的意境，此即成「道」。修道與成佛、成聖為同一境界，此也導出三家思想殊途同歸，修養境界不二的概念，因此德園子這種欲融通聖人神人佛仙為一爐，是有其義理學與宗教學之意義也。

在工夫論上，德園子又以道、釋、金丹原理作一會通。以丹術攝入老學者，德園子於晚清時期亦並非首創，晚清四川道士黃裳著《道德經講義》，其內容亦結合道家的虛無工

81 《道德經證》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卷一，頁2。

82 譚嗣同：《仁學》（臺北，學生書局，1998年），頁1。

83 《仁學》，頁77。

84 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七十六輯，第七百五十一冊，卷二十七，頁439。



夫與金丹的修身養性之要。而德園子於本體思想之外，更強調佛學對於道家與金丹修煉工夫的調和，由道家之虛無沖靜與佛學之證空、金丹之修煉統而論之，其說大抵能為晚清的佛老會通、丹術研究提供一途徑，也體現了晚清老學「佛學派」、「丹道派」的思想特色。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部份

- 老子道德經注（西漢）河上公 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65  
史記（西漢）司馬遷撰 百納本二十五史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道德指歸論（西漢）嚴遵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  
中論 龍樹 大正新修大藏經 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 1994  
大乘起信論 馬鳴 大正新修大藏經 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 1994  
老子道德經（魏）王弼 新編諸子集成 臺北 世界書局 1991  
抱朴子（晉）葛洪 新編諸子集成 臺北 世界書局 1991  
妙法蓮華經（晉）鳩羅摩什譯 大正新修大藏經 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 1994  
中觀論疏（唐）吉藏 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 1994  
周義正義（唐）孔穎達正義 十三經注疏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7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唐）法海集 大正新修大藏經 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 1994  
雲笈七籤（北宋）張君房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  
悟真篇注疏（南宋）張博端撰、翁葆光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  
道德經解（明）釋德清撰 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2004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景 臺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  
老君太上虛無自然本起經（明）佚名 道藏精華錄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9  
四庫全書總目（清）紀昀等 臺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  
評點老子道德經（清）嚴復 臺北 廣文書局 1979  
道德經證（清）德園子撰 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70  
道德經講義（清）黃裳 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70  
金花的秘密 衛禮賢、榮格撰 合肥 黃山書社 2011  
皇朝經世文三編（清）陳忠倚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臺北 文海出版社 1972  
仁學（清）譚嗣同 臺北 學生書局 1998  
清代學術概論（民國）梁啟超 臺北 里仁書局 2002

### 二、今人著作

#### （一）專書

- 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 嚴靈峰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70  
般若與佛性 牟宗三 臺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77

諸子概說與書目提問 蕭天石編撰 中國子學名著集成 臺北 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委員會  
1978

新譯老子解義 吳怡 臺北 三民書局 1998

新編中國哲學史 勞思光 臺北 三民書局 1999

道書輯校十種 蒙文通撰 成都 巴蜀書社 2001

## (二) 期刊論文

以「禪」解老析論 邱敏捷 玄奘佛學學報 新竹 2005 年 7 月第三期